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

——前景和政策展望

王一鸣 (005)

美联储“预防性降息”与“紧急降息”能否力挽狂澜

谷源洋 (011)

关于金融战的理解

黄志凌 (023)

· 国际经济 ·

世界经济同步放缓 衰退风险不容忽视

释经组 (040)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思考

李金波 窦 勇 (053)

新形势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美基建领域的比较研究

王维伟 盛思鑫 (067)

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现状、动力与挑战

——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

任玉娜 (079)

· 产业发展 ·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现状及态势

李 蕊 (091)

· 名人观察 ·

扩大有效投资是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韩永文（102）

把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企业降负相关配套安排

贾 康（106）

关于新冠疫情的四点思考

高尚全（111）

· 智库言论 ·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变局、挑战与应对

——中改院专家网络座谈会观点综述 胡 雷 陈 薇 匡贤明（115）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



CONTENTS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Outlook of Prospects and Policy

Wang Yiming (005)

Ca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 “Preventive Rate Cut” and “Emergency Rate Cut”

Save the Tide

Gu Yuanyang (01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inancial War

Huang Zhiling (023)

World Economic Slowdown and Recession Risks Should Not be Ignored

Shi Jingzu (040)

Thinking of Building High Quality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Jinbo , Dou Yong (053)

Several Speculations on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Wang Weiwei , Sheng Sixin (067)

China-ASE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ilk Road: Status, Motivation and

Challeng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Ren Yuna (079)

China’ 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Li Rui (091)

Expanding Effective Investment is a Key Way to Hedge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and Stabilize Economic Growth

Han Yongwen (102)

To Incorporat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Reform into Supporting Arrangements

for Enterprises Burden Reduction

Jia Kang (106)

Four thought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Gao Shangquan (111)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Situation: Change,

Challenge and Resolution—A Summary of the Opinions of the Expert Network

Seminar of China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IRD)

Hu Lei , Chen Wei , Kuang Xianming (115)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冲击^{*}

——前景和政策展望

王一鸣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两波冲击，第一波主要冲击中国经济；全球大流行后，对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第二波冲击。疫情不仅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冲击中国和世界经济，而且带来全球生产体系停摆，要素流动阻断，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经济活动休克，全球经济将大概率陷入衰退，并对中国经济形成负反馈影响。我国应利用好两波冲击的时间差，将应对疫情的短期政策调整为中期的一揽子方案，政策重心也要从复工复产等供给端为主转向促进扩大国内需求等需求端政策为主。

关键词：疫情冲击 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政策展望

作者简介：王一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百年一遇的大冲击，其影响堪比 1918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外部冲击，疫情不仅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冲击中国和世界经济，而且带来全球生产体系的停摆、要素流动的阻断、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经济活动的休克，甚至还会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负反馈循环。从全球范围看，疫情的第一波主要冲击中国经济，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大概率出现改革开放后从未有过的负增长，后续影响还将持续到第二季度。随着 2020 年 3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疫情迅速向全球扩散，形成第二波冲击，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未能幸免，并将反馈影响到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第一波冲

^{*} 本文为作者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中国发展基金会网络视频会上的发言，发表时略有修改。

击向第二波冲击转换过程中，全球经济在 2020 年上半年将大概率陷入衰退，全年能否保持正增长，将取决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否携手共同应对。应对这场大冲击，需要超常规手段和政策工具，需要将短期政策与中期方案结合起来，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合作。

一、疫情的第一波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疫情始于 2019 年 12 月初，随后迅速扩散到全国。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开始封城，2 月中旬中国新冠疫情开始从高峰回落，3 月后得到控制。可以说，中国用 3 个月时间控制住疫情，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和代价。这次疫情相比较于 2003 年的“非典”疫情，传染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采取管控措施力度更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不仅大于 2003 年“非典”，也要大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

疫情对我国的需求和供给都造成巨大冲击。从需求端看，2020 年前 2 个月份消费、投资均下降 20% 以上，出口按美元计价下降 17.2%，货物贸易由 2019 年同期顺差 414.5 亿美元转为逆差 70.9 亿美元。从供给端看，2020 年前 2 个月工业增加值下降 13.5%，服务生产指数均下降 13%，相对于需求端，供给端短期所受冲击相对较小，但中期因供应链紊乱面临的挑战更大。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超过预期。企业复工复产后，员工到岗率逐步回升，但上下游企业复工参差不齐，加之货物运输不畅等原因，劳务链、产业链、供应链还在恢复之中，经济循环仍然不畅，复工不达产的现象还较为普遍。与此同时，国际航空客运萎缩造成客机腹舱货运大幅下降，已经影响到我国产品出口和国际供应链的正常运转。疫情在全球扩散后，国际上疫情最严重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断或产业链断裂，对我国制造业和经济将造成新的冲击。

疫情对其他领域的后续影响也需要高度关注。一是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情况下，企业减员压力增大，加之部分小微企业停产或倒闭的风险上升，就业形势更为严峻。2020 年 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 6.2%、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分别比 2019 年 12 月份上升 1 个和 0.5 个百分点。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将使低收入人群面临更多困难。二是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收缩，地方政府收入锐减，而应对疫情的支出大幅增加，收支缺口将迅速扩大，而且难以随着疫情结束而迅速弥合。三是金融体系风险上升。债务违约增多，银行体系不良率上升，中小银行风险加剧，股市下跌可能再次引发股票质押融资风险，资本外流压力增大。

现在，几乎所有研究团队都在大幅修正对中国经济 2020 年一季度和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原先的预测大都基于疫情主要冲击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不会构成系统性影响。

随着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和蔓延，考虑到欧美主要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甚至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对中国经济形成负反馈影响，对中国经济一季度和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都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这也是疫情在全球扩散后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根据2020年前2个月的统计数据推算，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大约在 $-5\% \sim -10\%$ 之间。由此推算，全年经济增长大致在 $3\% \sim 3.5\%$ ，增长曲线大致是一个“不对称的U型”。但经济反弹出现在什么时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疫情能否在二季度得到控制。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并负反馈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全年增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疫情的第二波冲击：世界经济大概率陷入衰退

目前，疫情在全球呈现指数型扩散蔓延，欧美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模式，有的国家已经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和封城封国举动。这必将造成生产体系的停摆，对全球经济产生系统性影响。

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看法仍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疫情对经济影响是短期冲击，更类似于一场“自然灾害”，而不是经济萧条。主要发达国家将出现两个季度负增长，全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低于2%，比2019年降低1个多百分点，世界经济会出现衰退，但现在还难言将发生大萧条和经济危机。这是因为相比较于大萧条时期，现在有更充足的政策空间，更迅速有力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更温和的全球贸易环境，更完备的监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为避免疫情向金融和经济危机蔓延提供了条件。

另一种意见认为，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幅度将大于国际金融危机。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负增长。2020年3月23日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负增长1.5%，明显低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负增长0.1%。在全球经济处于低增长、高债务、高风险的背景下，伴随着疫情向全球扩展，金融市场的动荡将向纵深延伸，引发主权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快速衰退，并导致家庭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全面资产负债表衰退，形成全球性的传递链条，演化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相互强化。若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可能导致类似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重现。

从主要经济体情况看，美国已陆续出台一系列强力刺激政策，特别是美国参议院已通过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宽政策，股市急剧下挫可能会暂时得到遏制，但企业债市场的风险依然没有解除，特别是超过2万亿美元的高收益债信用风险正在快速聚集，违约风险仍在上升。即便采取大力度刺激后，美国经济二季度出现严重衰退仍是大概率事件。

欧洲现在仍是国际疫情的“震中”。德法等核心国家自身医疗资源不足，救援外围国家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意愿。欧洲经济远较美国疲弱，经济衰退使欧洲高风险金融机构破产风险上升，大规模救助计划进一步推升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债务风险，主权债务问题是否会重新浮出水面仍有待观察。

疫情还可能带来次生风险。一是粮食供应风险。随着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国际粮食市场出现了粮食抢购、粮价上涨、限制出口等信号，引发市场恐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告称，除非迅速采取措施减轻大流行对整个食品系统的影响，否则疫情的负面影响将导致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二是部分石油输出国可能出现财政危机。由于前期价格回调后产油国不愿合作控制产量，疫情蔓延又导致原油需求大幅萎缩，若油价持续低位运行，部分石油输出国债务风险会大幅攀升并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对中国经济形成第二波冲击，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有可能要超过第一波冲击。全球生产体系停摆，并引发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将通过进口渠道对中国工业生产形成“回波冲击”。全球经济如果出现衰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将严重冲击中国外贸出口。2020 年二季度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滑。今后一个时期，企业还可能遭遇大面积退单、撤单，不少企业已经从招工困难变为无工可复，中小企业可能大量倒闭，进而影响到就业、消费、投资，形成对中国经济的负反馈冲击。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在一季度遭受疫情第一波冲击后，正在筑底过程中，但欧美发达国家遭受疫情第二波冲击后，将对中国经济形成负反馈冲击，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可能难以强劲回升。而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可能延续到第三季度，这将持续影响中国经济。这样，中国和欧美在疫情冲击上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差，这不仅短期利好中国经济，也可以为中期应对外需大幅收缩形成的负反馈冲击赢得时间。

三、中国的应对：从短期政策转向中期一揽子方案

中国现在正面临第一波冲击向第二波冲击的转换过程中，既要应对第一波冲击的尾部效应，也要为应对第二波冲击做好准备。在应对上，要从短期政策为主转向实施中期一揽子方案，从分散化、碎片化政策转向整体化、系统化应对，政策重心也要从复工复产等供给端为主逐步转向扩大国内需求等需求端政策为主。

从短期看，当前最紧迫的还是要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畅通劳务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恢复经济循环和正常经济运行。在疫情退潮后，中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体的问题会显现出来。这就需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落实已经出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和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以及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降低利息负担等政策，让更多受疫情冲击面临短期困难但仍能恢复运营的企业存续下来。同时，对各

地受疫情冲击面临生活困难的群体要实行救助，包括发放消费券和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

从中期看，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负反馈冲击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效应，要着手制定实施中期一揽子方案。应该看到，已经出台的应对疫情的短期政策多为应急性、临时性举措，也是基于疫情主要冲击中国经济的情况下制定的。制订中期一揽子方案，可在综合评估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叠加影响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更系统更完备的政策举措。这不仅可以向全社会传递恢复和振兴经济的决心，也将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发挥主要作用，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降费，促进扩大有效需求。考虑到应对疫情给财政增支减收带来的压力和稳定经济的资金需求，中央财政赤字率可在 2019 年 2.8% 的基础上提高 1 个百分点，财政预算支出可增加 1 万亿元。我国近年来借鉴欧盟对成员国的要求，赤字率都不超过 3%，但欧盟近期已经宣布放松对成员国的限制，我国同样也不应为这一标准所束缚。向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这既有利于发挥特别国债长周期、低成本的优势，又有利于释放大量淤积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发行规模可在综合评估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而定。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在 2019 年 2.15 万亿元的基础上，扩大至 3.5 万亿元，并可适当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提高用于资本金的比例，以发挥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把对中小企业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期延长，并可考虑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率。

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继续通过定向降准等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下调贷款利率，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三，充分挖掘国内消费潜力。疫情对线下消费冲击尤为明显，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引导居民逐步恢复正常消费活动。继续鼓励发展线上消费，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通过减免车购税、阶段性放宽限购数量和鼓励以旧换新等政策举措，鼓励汽车和大宗耐用消费品消费。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信息网络、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促进消费市场下沉释放消费潜力。

第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推动在建项目复工，加快启动已经安排的项目建设。同时，考虑对冲疫情的冲击和影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适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需要，加快启动一批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仍将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承载地，需要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教育、医疗和应急服务设施建设。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建筑面积达到 60 多亿平米，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既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住房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同时，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启动一批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沿江高铁、烟大隧道、琼州海峡隧道等。扩大有效投资，要继续用好公共私营合作制（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第五，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政策既要坚持“房住不炒”的指导方针，着力构建房地产业发展长效机制，又要考虑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巨大关联影响和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增强政策弹性，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放松限价、鼓励居民换购住房等，避免房地产企业出现大量债务违约，拖累银行和金融系统。

第六，深化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国企混改力度，进一步放开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土地供给，有效降低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继续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制定一揽子方案不是要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揽，避免在一些领域形成新的重复建设。政府除了在公益性领域增加直接投资外，其他领域更多可采用贴息、参股等间接投资方式，以尽可能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对经营不善的企业不能简单救助，而要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兼并重组和市场出清。

四、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没有完全摆脱困局，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特征。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疫情，稳定全球经济。

20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应对挑战的强力信号。各方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协同采取必要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继续推动市场开放，减少贸易限制性措施，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保障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顺畅，扎牢全球金融安全网，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摆脱困境，早日恢复稳定。

责任编辑：沈家文

美联储“预防性降息”与 “紧急降息”能否力挽狂澜

谷源洋

摘要：2019年下半年，美联储试图通过3次“预防性降息”提前阻止经济持续下滑，但提振作用有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并在美国迅速蔓延恶化，使原本下行的经济陷入失速和衰退。为“救市”，美联储重拾降息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急需的流动性。本轮降息不是给经济“买保险”“打预防针”，而是启动空前规模的“紧急降息”，降息幅度是3次“预防性降息”的2倍。这令投资者恐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导致三大股指狂跌，多次触发熔断机制，未能扭转股市颓势。之后，美联储又无限量购买国债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些重磅举措，旨在继续缓解“美元荒”、抑制就业突降及维护物价稳定，短期效果不尽人意，最终政策效果及其政策风险如何尚须跟踪观察。

关键词：美联储 预防性降息 紧急降息 经济衰退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美国利率持续上涨，美元不断走强，有35个新兴市场国家上调利率以稳定本国货币汇率，防止投资者抽逃资金；同时有23个新兴市场国家因现行利率过高或经济下行而降低了利率，通过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步入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众多国家经济同步回落，通胀压力趋缓，降息的国家日渐增多，加息的国家明显减少。人们特别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一、美国步入经济周期的晚阶段，经济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央行加息抑或降息同其经济形势紧紧相扣。2018 年美国经济亮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2.9%，创下二战后第二长复苏期，美联储连续 4 次加息。2019 年美国 GDP 增长率在 2.2% 与 2.3% 的区间，远不及 2018 年的 2.9%。美国经济从“加速度”走向“巡航速度”已成定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下行是持续的而不是暂短的，各方对美国经济前景大多抱有悲观情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将 2020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下调到 1.9%，低于 2% 的潜在增长率。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经济学家如同 IMF 一样，认为 2020 年美国经济形势将不及 2019 年，发生衰退的概率有所增加。美联储所做的模型亦显示，未来 12 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攀升。2019 年 9 月，日本《选择》月刊称特朗普总统“自杀式萧条”或在 2020 年爆发。这些预判让特朗普感到提心吊胆，然而他并没有从其制定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去寻找经济持续下行的根源，相反把经济疲软的责任推给了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及其实施的货币政策，指责鲍威尔在 2018 年连续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 2.25%~2.5%，使其借贷成本迅速增加及企业盈利减少，抑制了经济增长。特朗普曾多次批评鲍威尔加息不当，伤害了美国经济和股市，扬言要“炒掉”鲍威尔。

二、在经济滑坡和政治重压下，美联储“鸽派”色彩渐浓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由于经济增速回落，美联储多次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删除了“进一步渐进加息”的相关表述，转而强调要对未来利率变动保持“耐心”，货币政策“鸽派”色彩渐浓。美联储提供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赞扬美国经济连续 10 年扩张，迄今依然稳固，但强调国际贸易关系紧张、全球经济放缓及其他问题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然而，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生机勃勃。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时，将驱使劳动力工资上扬和物价上涨，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事先遏制通胀压力。但从客观现实看，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推行“美国优先”及市场保护主义，既损人又害己。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显弱趋势增强，正反两种因素驱使美联储货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境地。美联储折衷权衡，采取“既不加息、也不降息”的措施，通过停止加息和提前结束“缩表”周期，释放稳住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宽松预期。

作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经济面临三大阻力，即全球需求放缓、美国财政刺激消退及连续加息的滞后影响。为应对世界经济景气不振和国际贸易冲突给

美国经济前景造成的疲软，美联储内部的主导力量转向“鸽派”。特别是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减少，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等主要经济指标低于预期，投资者信心降至2016年以来的低点。在减税效应边际递减的同时，财政收支压力加大，投资和生产预期变差，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多种因素推低长期债券收益率，联储内外要求降息呼声愈益高涨，降息立论多种多样。

“火箭论”。特朗普认为美联储停止加息与“缩表”已经难以铸成赢得连任的经济基础，声称美联储降息将会给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促使经济像火箭一般迅速升空。

“预防论”。美国商业环境不尽如人意，制造业产值减少，房地产交易量收缩，部分联储成员认为如果经济前景压力形成，那么美联储有必要采取降息措施，事先给美国经济打打预防针，遏制住经济持续下行的惯性。事先出台挽救措施优于事后采取行动。

“逆风论”。国际贸易关系紧张及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给美国经济增长造成阻力。不管是以购买力还是以汇率计算，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都远不及前两年，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值分别下调至3%^①和2.4%^②，是近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速。鲍威尔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逆风；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更是直接告诫，如果美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逆风吹袭，那么就应该采取降息措施加以应对。

“豪赌论”。豪赌即为投机。华尔街对冲基金总是在危机时刻兴风作浪，利用危机进行投机活动。资本投机者把赌注押在美联储降息上，认定降息举措将会引发全球新一轮货币宽松周期的来临，从而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益上涨。

“宽松论”。欧盟经济增长急剧滑落，迫使欧洲央行停止了规模高达2.6万亿欧元的资产削减计划，并宣布不予启动加息周期。2019年9月12日，欧洲央行甚至重启“资产购买计划”并降低利率，把存款利率从-0.4%下调至-0.5%，每月购买200亿欧元政府和公司债券，以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央行基于经济表现依然逊于美国和欧洲，通胀率始终达不到2%的既定目标水平，货币政策正常化遥遥无期，只能继续实施量化与质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QE）。日本央行于2019年10月31日，宣布维持现行控制收益率曲线的政策框架，维持对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实施-0.1%利率，以及通过购买国债将10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控制在0%左右。但日本央行同时宣布修改“前瞻指引”，表示如果达成通胀目标的经济动能进一步走弱的话，利率水平将维持在当前甚至更低的水平，这意味着日本央行将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或在负利率泥潭越陷越深。伴随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负利率

^①2019年10月，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3%。

^②2020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2.4%。

水平，世界多国央行又再次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趋势被许多投资者戏称为“日本化”。长期低利率环境给国际投资者带来挑战，很多传统安全资产再不能获得“正收益”。为保证“正收益”，全球投资者到处追逐收益率，所承受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此，市场寄希望于美联储能正确引领全球货币宽松的潮流。

除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转向更加宽松外，印度、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央行亦因经济放缓，通胀率走低及其他因素作用，在美联储降息前后，开始降息或步入降息周期，以平稳经济形势或拉动经济增长。2019 年以来，宽松、降息似乎是全球货币政策的主题。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9 年初到年中已经降息的国家央行约 14 家，美联储降息后又有一些国家央行加入降息行列，到 9 月底实现降息的国家央行约为 30 余家。

在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关注美联储的举措；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人们关注印度央行的动作。印度央行将 2019 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7% 下调至 6.9%，截至 2019 年 11 月初已连续 5 次降息，平均每两个月降息 1 次，以提振疲软的经济。但通胀率依然低于央行设定的 4% 目标水平，仍有继续降息的空间。澳大利亚央行在 2019 年 6 月 4 日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1.25%，成为 3 年来首次降息，预计到 2020 年中期，基准利率有可能降至 0.5%。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同其脱欧进程紧密相关，“硬脱欧”或“无协议脱欧”对英国和欧盟的冲击最为严重。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表示 2019 年英国首季度 GDP 为零增长，如果“无协议脱欧”，尽管现行利率只有 0.75%，也不得不降息，但尚不会选择负利率货币政策。实际上，欧日等国央行即便是想降息，也没有多大降息的空间。同欧日及其他国家央行相比，唯有美联储具备包括降息在内的一些放宽条件。

上述种种降息立论以及其他国家的降息行动，给美联储造成巨大压力，多位联储成员转向支持降息。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不只一次表示过，美国经济既没有强到快速加息的地步，也没有弱到需要立即降息的困境。然而，形势变化很快。在 2019 年 6 月初芝加哥一次会议及 7 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鲍威尔对降息的表态发生了明显变化，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美联储将“采取适当措施维护经济扩张”。市场对“适当措施”的理解是降息，认为鲍威尔的演讲和证词是美联储降息的前奏。市场预期和判断是准确的，鲍威尔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宣布自 2015 年加息以来的首次降息 25 个基点，同时宣布从早先 10 月提前到 8 月结束“缩表”计划安排；9 月 18 日，鲍威尔宣布再次降息 25 个基点，10 月 31 日第三次降息 25 个基点。3 次降息后，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1.5%~1.75%，超额准备金利率降至 1.55%。与前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相比，第三次会议删去了美联储将“采取适当措施维持经济扩张”的表态。在 4 个月内

三度降息后，美联储认为货币政策达到了“适宜”水平，已能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扩张。在评估未来的政策路径时，美联储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低通胀水平这三个风险因素的变化，它们是美联储降息的三个主因。只有对美国经济前景的评估出现实质性变化时，美联储才会采取相应行动。换言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是以国内外经济数据为依据。2019年7月至10月，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路径：一是从加息转向降息，降低融资成本；二是从“缩表”到停止“缩表”转向启动“扩表”，从10月15日起，每月购买6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直到2020年第二季度，旨在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三是考虑发行50年和100年的长期债券。

2019年美国经济虽然降温，但并没有出现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技术性衰退”，加上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3次降息后，美联储按下降息“暂停键”，降息意愿有所减弱，再次回归“既不加息、也不降息”的货币政策框架。然而，鲍威尔的“预防性降息”举措显得有些被动和尴尬。市场认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鲍威尔从不加息到降息的转变，带有屈服于特朗普总统和华尔街政治压力的因素，美联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或多或少被削弱。连续3次降息后，特朗普仍表示不满意，抨击美联储尚未像欧日央行那样推出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反映了经济的脆弱性，因此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站出来解围，声称他不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否真的想在美国实行负利率政策，强调他认为美国不需要负利率。鲍威尔亦不赞成负利率政策，美联储暂不会把负利率作为政策选项。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时刻，有4位美联储前主席联合撰文《美国需要一个独立的美联储》，这不仅是对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也是对鲍威尔主席的提醒。

三、“预防性降息”的提振效果较为有限

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变动必须依靠经济数据；二是货币政策目标是实现全民就业和物价稳定；三是保持独立性，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因素和党派因素干扰，并在总统大选期间保持中立的传统。特朗普执政后，提名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但经济持续下滑，动摇了连任的经济基础，因而特朗普把鲍威尔当作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鲍威尔主持的美联储的所作所为使其独立性受到质疑，但他强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动是由经济数据确定的，不会受到外界干预。然而，经济形势和数据变化无常，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坏参半，尤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逆传统”或“非传统”现象及挑战。按传统而言，就业升高，通胀随之上升，现实状况却是就业市场改善，甚至实现了全民就业目标，但通胀率依然低下，主要

发达国家央行制定的 2% 的通胀目标始终难以达到。“非传统”经济现象和挑战增添了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难度，并引起美联储内部分歧增大。

然而，鲍威尔依然认为美国经济仍在温和复苏，面临的麻烦是来自外部，包括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而且通货膨胀显著低于 2% 的目标，认为有可能通过降息稳定美国经济，但他强调降息只是周期内的政策调整，而不是长期降息周期的开端。换言之，美联储降息是“保险性降息”或“预防性降息”，旨在防患于未然，提前给疲软的经济“打打预防针”“上点保险”。美联储“预防性降息”效果如何？这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美联储“预防性降息”意味着对近期经济表现及其前景的判断比预期更差，试图通过降息举措达到以下目的：一是稳住市场和投资者信心；二是降低公司、企业借贷成本，提振投资，刺激股市；三是驱使美元走软，拉动出口增长；四是缓解偿债重负压力；五是促使经济和通胀上升，防止滞胀发生，拉长经济周期。美联储“预防性降息”能否实现上述预期目标？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运用降息这一传统工具去解决“非传统”经济和金融问题，能否起到作用，迄今依然是未知领域。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央行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而通胀率一直上不去，甚至有时下降。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换言之，货币扩张与通货膨胀之间有无关系，理论界出现了认知上的分歧。

美联储降息如果导致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将会诱发新的不均衡风险。美国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回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BBB 级企业债券规模高达 2.25 万亿美元，B 级或 B 级以下的债券是高风险、较低流动性的资产。企业担心经济回落或衰退将使其债务偿付风险骤增，导致投资 B 级垃圾债的基金纷纷退出，极易发生垃圾债崩盘与企业偿付违约事件，伤害经济增长。美联储降息降低了企业“借新债还旧债”的融资成本，延缓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时间，但降息举措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美联储降息美元走贬，企业生产和出口竞争力得以提振，利于多种行业出口。但实际情况却是，降息后美元指数回跌幅度不大，仍在高位震荡。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美联储多次宣布停止加息、提前终止“缩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在理论上似应驱动美元走贬，但美元指数并没有下挫反而走高了。即使是有时下跌，其跌幅亦甚微，对出口起不到太大的刺激作用。假若美元过度贬值将会导致进口大幅萎缩，进而拉动通胀上升。无论是通胀过低或过高，美联储都要加以干预。货币剧烈贬值被视为一国经济危机的开端，易引发资本外流。许多经济学家反对通过贬值促使通胀率提升，认为制造降息将加剧债务压力，带来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经济下滑。美联储降息对美股也未必是利多

因素。降息会向市场释放更为充裕的流动性，一些行业板块和个股将直接受益，出现股市“短期高点”。但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开启降息周期后，股市一路暴跌的现象。一般而言，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2019年美国的经济表现不及上两年，长短期美债收益率几次出现“倒挂”，势必引起股市剧烈波动。不少机构和资深投资者纷纷发出警示：“降息对美股未必是利多因素。”按照美林时钟理论，在经济下行阶段，“债强股弱”将成为常态。在这种常态环境下，央行往往通过“放水”激励经济，造成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给债市带来利好。^①然而，现实状况是股市荣枯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性有所弱化。2020年如果中美贸易出现变数，抑或发生突发事件，那么就会引发美股暴跌。

IMF 货币市场部副主管法比奥·纳塔卢奇(Fabio Natalucci)表示，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的大背景下，美联储以及各国央行很可能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存在三个薄弱点：一是企业负债加剧，融资风险高。二是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持有高风险、较低流动性的资产。三是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经济体对于外部债务的依赖性增强。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处于高位，金融“黑天鹅事件”一旦出现，就有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②

从历史数据看，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平均连续加息 11 次，而本轮加息只有 9 次就停止了。一般而言，美联储为应对经济衰退，通常需要降息 400~500 基点。如果美联储从“预防性降息”转向启动“降息周期”，则需要将低利率或零利率维持更长时期，从而导致经济面临较强的通缩压力。由于利率水平与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利率不是越低越好，低利率的隐性成本不可忽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18 年美国没有发生银行倒闭现象，而到 2019 年 11 月已有 3 家银行倒闭。如果美联储再继续降息，更多的小银行将会陷入困境。国际清算银行警告称：货币政策不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不能永久地使用货币政策来实现更高的可持续发展。在实施了 10 年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后，各国央行提振经济的空间变得趋窄，各国央行需要节省刺激经济的“燃料”。对市场观察者而言，全球金融市场保持低利率的时间或许将比人们在 2019 年初时的预期更长，但宽松的金融条件和环境需要付出代价，鼓励投资者追求更高回报而去冒险。总体看，“预防性降息”可发挥提振作用，但较为有限，而且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其副作用可能超出预期，使金融稳定性与经济形势继续面对高风险。

^① 咎秀丽：《国际市场债强股弱或成常态》，《中国证券报》2019 年 2 月 21 日。

^② 2019 年 11 月 5 日，法比奥·纳塔卢奇在北京举行的 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

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启动空前规模的“紧急降息”，试图阻止经济失速或陷入衰退

如前所述，在连续 3 次“预防性降息”后，美联储内部及市场对 2020 年是加息抑或降息，其观点大相径庭。然而，世事难料，2019 年底爆发了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疫情并在全球迅速蔓延。截至 2020 年 3 月下旬，疫情已经扩散到 18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严重打击了全球贸易与投资、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制造业等，造成中低端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生产经营活动“停摆”。疫情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金融领域，而且深深冲击到全球文化、政治、军事、安全以及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其影响是严重的、全方位的。世界经济衰退或危机再次成为各国担忧的现实问题。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这场疫情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原来预期的一半。这意味着很多国家都将出现负增长，难逃“技术性衰退”。IMF 早先预测 2020 年世界经济表现将好于 2019 年的乐观情绪业已消失，2020 年 4 月 IMF 将 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调为 -3.0%。按 IMF 的定义标准，世界经济增长率降至 2.5% 以下即标志着衰退，预计 2020 年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经济衰退。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文件指出，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可能达到 2 万亿美元，^① 远远超出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布鲁塞尔提供的文件显示，疫情在欧洲的蔓延将使欧盟 2020 年 GDP 增长率减少 2.5%，降至 -1%。^②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美国面临的外部“逆风”更加强劲，经济衰退概率日趋增高，金融市场更显动荡，内外涌现出始料不及的系列因素，均不利于在大选年为特朗普争取总统连任造势。特朗普总统亦承认伴随疫情的扩散，停止运行的经济范围及规模在不断扩大，美国经济可能正在滑向衰退，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吹嘘上任后的美国经济是历史上最好的。但他再次向鲍威尔施压要求降息。美联储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等不到 20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例行的 FOMC 会议，就提前于 3 月 3 日宣布降息 50 个基点，并在 3 月 15 日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再降息 100 个基点，共计释放出 1.5 万亿美元流动性。“紧急降息”的主要原因：一是疫情日益严峻，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疫情致使需求大幅减少，失业率急剧攀升。美国劳工部宣称，截至 3 月中旬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 30%，

^① 吉斯塔沃·谢拉：《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影响：令人不寒而栗的初步估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站，2020 年 3 月 14 日。

^② 维尔日妮·马兰格尔：《布鲁塞尔敦促各国进行无限制干预》，法国《世界报》网站，2020 年 3 月 15 日。

超出 28 万人，特朗普曾引以为荣的 3.5% 失业率已成为“过去时”。特朗普甚至要求各州劳工部门推迟公布真实的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不单是美国，受疫情冲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失业率和半失业率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国际劳工组织于 3 月 18 日发出警告：如果各国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致使 2020 年贫困劳动者增加 880 万人。^① 这是大大低估了的数据，实际数据可能要高得多。二是疫情扩散给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股市频频暴跌，市场和投资者陷入极度恐慌。防控疫情及维持经济运行都需要流动性的支持，然而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三是七国集团央行行长经磋商要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各国央行需要联合降息，共同应对疫情。四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高盛公司 3 月 16 日已把 2020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 0.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甚至认为衰退其实已经发生。该预测中心报告预计，美国 2020 年首季度 GDP 为零增长，二季度陷入重度衰退，三季度经济继续收缩，GDP 依然为负增长。美联储拥有众多资深经济学家，不会看不到美国经济面临的严重性及紧迫性，因而美联储不得及时出手“救市”。

美联储“紧急降息”不同于 2019 年连续 3 次“预防性降息”。首先，“预防性降息”的降息幅度不大，每次各为 25 个基点，3 次共计 75 个基点。而 2020 年 3 月 3 日启动的“紧急降息”，力度明显增强，12 天内迫不及待地两次降息 150 个基点，为 3 次“预防性降息”的 2 倍，从而导致联邦基金利率重返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美联储连续加息 9 次前的 0%~0.25%。其次，在“紧急降息”的同时，美联储又启动 7000 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和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形成“零利率+量宽”的货币政策格局，试图力挽狂澜，缓解美元流动性紧张，降低美元融资成本。再次，美联储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至零水平，以向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抑制“美元荒”蔓延。最后，从理论层面讲，“预防性降息”和“紧急降息”理应推动美元走低，刺激扩大出口。但事实却是“预防性降息”后，美元指数上下波动，美元指数基本保持高位，在 95 附近浮动。然而，“紧急降息”后，美元指数却一路狂升，竟然突破 103 的关口，创 2017 年 2 月以来新高。主要原因是欧盟（包括英国）经济欠景气，欧元和英镑持续贬值，美元成为各国避险的工具，从而拉动美元走强。“强势美元”驱动大宗商品，特别是国际原油价格下挫，加上疫情“大流行”使全球原油市场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推动需求减少及价格下挫。因此，沙特建议在原有减产基点上，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每天再削减 150 万桶，以此推高国际油价。然而，俄罗斯断然拒绝该建议，因为“减产促价”将有利于准备扩大页岩油出口的美国。再减产谈

^①佚名：《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疫情或致 2500 万人失业》，参考消息网，2020 年 3 月 20 日。

判破裂导致“欧佩克+”框架内的产油国不再受先前减产协议约束。沙特石油巨头阿美公司立即下调了其关键市场的油价，并承诺在短期内将原油日产量增加 200 万桶。俄罗斯亦采取了与沙特类似的措施，实施调低油价与提高油产量同时并举策略，旨在保持或扩大国际原油市场份额，保障各自财政收入增长。国际原油市场形势突变与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冲击了全球市场，国际油价一夜间下跌 1/3，期货价格跌至每桶 30 美元上下，中东乃至全球股市应声而跌。然而，在“预防性降息”期间及此后，并没有出现美元指数暴涨与国际油价狂跌的现象。鉴于沙特和俄罗斯原油开采成本都很低，沙特每桶原油不足 10 美元，因而石油价格争端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主要原油消费国则乘机扩大原油进口，增加原油战略储备，以抵消新冠疫情对经济伤害程度的冲击。4 月 13 日，“欧佩克+”会议达成协议削减原油产量，原油价格大战暂告段落。

美联储“紧急降息”150 个基点步入零利率时代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择跟进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韩国等央行降息 50 个基点，新西兰和巴基斯坦等央行降息 75 个基点，英国、中东国家以及捷克、越南等国央行亦不同幅度降低利率。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早已步入负利率时代，受降息空间限制，维持现有利率不变。但日本央行增加了年度债券购买规模，黑田行长宣称如果疫情影响使日本经济景气进一步恶化，那么央行将推出更多的宽松举措。一些国家央行则表示将视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变化，及时做出利率政策调整安排。

当前，各方关注的问题是央行“放水”能否实现预期目的。“预防性降息”符合市场预期，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但提振作用较为有限。这次美联储紧急“放水”显得过于仓促，“放水”流量过大，让市场感到惊讶，使投资者感到恐慌，对经济形势及前景失去信心，内外投资者争先恐后抛售持有的股票，美国三大股指 4 次触发熔断，累计跌幅超过 30%。这样的结果是鲍威尔及其同僚没有预料到的。不单是美国股市惨跌，全球股市亦在剧烈动荡中遭受天文数字的损失，总市值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 88 万亿美元减少到 3 月 9 日至 13 日的 68.9 万亿美元，一周之内蒸发约 10 万亿美元。欧洲和日本等国的股票市场亦全线大跌，国债收益率跌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据摩根士丹利统计，美国自 2000 年以来曾 6 次“紧急降息”，世界股指，即中间值，在降息 6 个月后下跌 5.7%。法国兴业银行发表的报告称，“没有人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发展，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冲击，它持续的时间越长，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就越大”。^①

^① 贾斯廷·卡里根：《市场面临“全面危机：油价暴跌加剧冠状病毒冲击》，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2020 年 3 月 9 日。

美联储“紧急降息”的本意是释放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消费，延续“牛市股”，维持温和增长。然而，事与愿违，“紧急降息”反而造成美股多次超跌。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触发因素：首先，最近几年美股一直非理性上涨，股市市值被高估约 40%，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冲击，也会有其他因素刺破股市泡沫。其次，美联储启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救市”措施，以为大幅降息与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能恢复金融市场流动性与投资信心，但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给金融市场造成的风险与 2008 年有很大不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银行金融系统内部出现巨额坏账与流动性紧缺，而此次疫情扩散直接冲击全球实体经济面临大停摆，导致企业“缺钱”，即美联储释放的巨额流动性被企业取走，金融市场流动性依然匮乏，触发美股持续剧烈动荡下跌。^①再次，美联储已被特朗普、华尔街和市场“绑架”。特朗普一直把股市作为衡量执政成果的重要指标，千方百计地阻止“牛市”滑向“熊市”，指责美联储降息动作过于缓慢且力度不够，远不及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然而，美联储第一次“紧急降息”50 个基点后，未能逆转股市颓势，市场要求继续降息，但当第二次“紧急降息”100 个基点后，市场感受到了经济前景的“寒气”，担心经济恶化，美联储没有多大的“再救市空间”。政策空间触发市场恐慌情绪骤然升温，加速抛售股票和其他证券，加剧金融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量。据摩根大通估算，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长期投资锐减，已造成当前全球美元缺口金额高达 12 万亿美元，较 12 年前增加了一倍之多。新冠疫情扩散恶化，使各国急需更多的美元去应对防控疫情、债务偿还、贸易支付以及维持经济运行等压力。因此，全球美元缺口将继续扩大。当下，美联储正面临“两难”选择，继续降息抑或暂缓降息都会使市场承受崩盘的压力。

美联储“救市”措施虽然受阻，但仍在推出“紧急降息”的后续措施，以充实流动性。然而，市场越来越关注特朗普政府在财政方面如何应对疫情恶化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情。特朗普政府与参议院已就 2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达成协议，动用的资金将约占政府 4.7 万亿美元年度支出的近一半，包括向美国每个家庭派发 3000 美元现金或支票，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渡过难关；推出 2500 亿美元支援中小企业，扩大失业救助，不让中小企业经营活动停摆，进而导致失业率狂升。美国财长姆努钦警告，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新冠疫情可能将美国失业率推高至 20%。“低失业”和“强股市”是特朗普在大选年争取连任的两根支柱，因而特朗普政府和参议院支持巨额资金的纾困方案。在美国历史上，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出台大规模提振方案，向民众发放支票或现金等并不是新鲜事。关

^①陈植：《复盘美联储救市失败》，《21 世纪经济报道》2020 年 3 月 23 日。

键问题：一是钱从哪里来？二是能否承受得了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三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否尽早达成共识？美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如果派发的现金能够真正到位，则有助于拉动消费；如果援助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能够尽快起步，亦有利于稳定就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燃剂”。但带来的沉重代价无疑将使 2020 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及引发美国债务爆炸式膨胀。但在疫情迅速扩散及其影响愈益加重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或许暂时不会过多地去考虑赤字和债务压力。欧盟已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暂停实施财政“铁律”，允许 27 个成员为防控疫情，其财政投入将不受 3% 赤字的约束。发达经济体之所以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不会增加赤字负担，零利率和负利率的债券之所以有机构和散户购买，是因为经济好转时，出售债券能获取利润。因此，美联储于 3 月 23 日宣布“无限制”地购买国债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重启“降息 + 宽松”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拟出台刺激计划安排，推动股市小幅反弹，但最终政策效果及政策风险如何，尚需跟踪观察。

随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伤害或许超出预期。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尤其金融风险来自外部，需要做好应对外部风险预案，严防外部输入风险，推出更多有效措施，防范国际“热钱”进出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以确保不发生银行危机、资产泡沫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

参考文献：

1. 咎秀丽：《国际市场债强股弱或成常态》，《中国证券报》2019 年 2 月 21 日。
2. 吉斯塔沃·谢拉：《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影响：令人不寒而栗的初步估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站，2020 年 3 月 14 日。
3. 维尔日妮·马兰格尔：《布鲁塞尔敦促各国进行无限制干预》，法国《世界报》网站，2020 年 3 月 15 日。
4. 贾斯廷·卡里根：《市场面临“全面危机：油价暴跌加剧冠状病毒冲击》，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2020 年 3 月 9 日。
5. 陈植：《复盘美联储救市失败》，《21 世纪经济报道》2020 年 3 月 23 日。

责任编辑：李 蕊

关于金融战的理解

黄志凌

摘要：“金融战”不仅指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发动的金融制裁，还包括一个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突然对一个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漏洞的主权国家或关税经济体发动的货币狙击。长期的金融战会引发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摧毁其经济体系，使其经济发展陷入长时间停滞。回顾近几十年的历史，美国非常擅长通过金融战操纵全球经济，从而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其常用的武器是金融制裁。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顺利发动金融制裁，美国还准备了一系列法律依据。美国发动金融战的底气在于美元霸权、支付清算垄断与无可替代的发达金融市场。以美国曾经发动的金融战为样本，对金融战进行一些前瞻性的分析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全球经济 金融战 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制裁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冷战结束之后，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渐消除，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支配能力急剧增强，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属性日渐显现。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甚至能够单边地切断其他国家的国际资金流动，就可以通过金融制裁手段强迫他国遵循自己的意志。回顾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美国擅长通过金融战操纵全球经济，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为此，以美国曾经发动的金融战为样本，对金融战进行一些前瞻性的分析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怎样理解金融战

20 世纪 80 年代起，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支配能力急剧增强，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属性日

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金融的实体经济部门对于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金融体系不仅支撑着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而且金融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① 二是金融部门的规模和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率等数据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非金融部门通过金融资产而不是工业生产来获取利润，而且依赖金融资产获得收入人群的财富和影响力急剧膨胀；三是金融资产交易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并成为决定国际货币流向的主要因素，金融交易中心高度集中，金融技术也呈现垄断化趋势。^② 不仅如此，经济金融化还改变了国家财富的表现形态，使其从传统的土地、资源、商品等实体资产，转向货币、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③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渐消除，金融资产开始成为各经济体跨境资金流动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同时，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得金融资产的电子化交易成为可能。全球经济金融化和金融交易电子化进一步扩大了金融资产的规模，提升了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甚至能够单边地切断其他国家的国际资金流动，就可以透过金融制裁手段强迫他国遵循自己的意志。一个开放的国家，离不开全球贸易、清算、支付、投资、融资，一旦被切断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其整体经济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注意到，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国家安全的地缘防线，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能再局限于领空、领海和领土的空间安全，还要关注经济安全，尤其是预防敌对国家凭借金融战优势引发本国金融危机，破坏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可能性。

这里所说的“金融战”不仅是指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发动的金融制裁，还包括一个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突然对一个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漏洞的主权国家或关税经济体发动的货币狙击。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下，一个国家（尤其是金融体系还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国家）一旦被强有力的国际资本盯住并展开货币狙击，自身的金融体系可能随之崩溃，经济也将迅速倒退。短时间内突发的金融交易事件、支付清算事件，以及融资渠道关闭事件都可以引发一国经济的“猝死”，长期的金融战会引发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使其经济发展陷入长时间的停滞。这就是市场所理解的“金融战”及其严重后果。

当然，深刻理解金融战，人们往往借鉴军事战与贸易战的思维习惯。其实，军事战争、贸易战争与金融战争相比，他们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进行异同点分

①黄志凌：《金融危机扰动下的趋势思维》，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7 页。

②张成思、张步昙：《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6 期。

③王湘穗：《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4 期。

析，既要基于战争原理来分析一般性，还要深入各自资源特点来分析特殊性。譬如左右军事战争的决策者是总统、政客以及军方，人数有限，因而战争往往可以持续很多年。贸易战争涉及众多经济实体，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往往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尤其是市场相互依赖性很强的大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观察强国发起的贸易制裁实践，我们发现有时即使是贸易战争名义还在（制裁法律没有取消），但相关实体出于利益考虑的“商业创新”已经使贸易战争效应大大降低，甚至名存实亡。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而金融战争介于前面所说的两者之间，主导的人数也不多，但多于军事战争的主导人数。而且金融寡头往往与政客的利益观和价值观高度吻合，甚至是政治家的智囊或智库，所以金融战争往往也可以持续很多年。

贸易战争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涉及商品生产线的技术约束，即产能过剩的浪费成本以及闲置维修成本和拆除以后技术消亡的战略成本；另一方面涉及商品自身的物理约束，即不可能长期储存，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要销毁，这就决定了贸易资源驱使的贸易战争不可能持续太长时期。而金融战争则不同，不涉及生产线，不涉及卖不出去的储存难题与销毁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的特点是收益风险相匹配，资本借不出去虽然少了收益，但也没有违约风险。因而金融资源驱使的金融战争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军事战争资源特点受技术革命左右影响很大，因而军事资源驱使的军事战争到底持续多长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概括来说，金融战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危害性强，实施金融制裁和货币狙击等手段，意在引发相关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最终摧毁其经济体系，使其经济发展陷入长时间的停滞，而且危机后经济的恢复通常又是长期的、困难的；二是隐蔽性强，不像贸易战那样透明（譬如加征关税、进出口管制等都是公开的），受到货币狙击的国家或经济体在初期往往不知道具体的“敌人”是谁，金融制裁也是先以合规性理由从个案（有时是关键核心企业或金融机构）入手，具有“温水煮青蛙”效应；三是专业性强，大量操作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尤其是一些汇率异常波动、非正常交易等，有些属于市场投机行为，有些属于有计划的金融战行为，非专业人士很难识别与判断；四是突发性强，一旦爆发，不会给被攻击与制裁的国家或经济体留下充足的应对时间；五是传染性强，透过市场特有的“恐慌机制”由一个具体的交易或具体的市场形态，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并形成金融危机。

因此，我们对于金融战的特殊性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更不能简单套用贸易战或军事战争的逻辑与思维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战。

二、聚焦美国金融制裁与国际货币狙击实践， 被金融战击败的原因并不复杂

实证观察，金融战的形式多样，但金融制裁与货币狙击则属于发动金融战的重武器。回顾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美国是金融战的高手，擅长通过金融战操纵全球经济，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其发动金融战最常用的武器是金融制裁。对于拥有美元霸权和支付清算系统霸权的美国来说，金融制裁是一种更为直接、高效、师出有名的金融战手段。

（一）金融制裁可能源于贸易战手段的失效，但一些金融制裁措施只有美国具备实施能力

金融制裁的发起主体多为主权国家，有时也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制裁方通过阻碍国家、组织、企业、个人等受制裁主体的资产和资金流转，实现“维护国际和平及保护人道主义，满足主权国家自身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打击国际犯罪及毒品活动的需要”等目的。^①

以往，两国之间如果存在核心利益冲突，无法调和的矛盾时常演化为战争。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热武器的杀伤力正在不断增强。即便是国力极为悬殊的两国进行热战，占据上风的国家也难免会出现大量的军队人员伤亡。这会引发优势方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更会激发敌对国人民的民族仇恨。发动一场军事战争，需要比过去更强的国民基础。因此，国家之间的交锋逐步转向经济领域，进攻方通过破坏敌对国的经济体系来达成战略目的，而贸易战就成为重要工具。

然而，传统的贸易制裁难以杜绝受制裁国家通过走私等灰色手段获取商品的可能性，并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确保制裁能够得到贯彻执行。^②况且在全球产业链日益精细化的当今，各国经济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件出口商品的生产可能涉及处于一条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多个国家。一国对他国使用贸易制裁手段难免会造成误伤、自伤。而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性、定向性等特征，开始逐步成为个别具备雄厚金融实力的国家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 53 个单独实施金融制裁的案例、101 个贸易与金融制裁相结合的案例和 21 个实施资产冻结的案例中，分别有 19 例（36%）、32 例（32%）和 8 例（38%）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在 40 个单独实施

^①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33～34 页。

^②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0～81 页。

贸易制裁的案例中，只有 10 例（25%）获得了积极的效果。^①

观察已有案例，现代金融制裁主要通过三大途径完成，^② 其中部分措施只有美国具备能力实施：

一是冻结或没收被制裁方的海外资产。制裁方通过冻结其境内被制裁方的资产，甚至联合其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冻结被制裁方的资产，限制被制裁方的正常经济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日本出兵占领东南亚南部，威胁到美英荷的国家利益，美英荷先后冻结日本的海外资产，封锁日本的石油贸易，遏制日本获得战略性技术、设备和资源的能力。

二是封锁被制裁方美元流通的渠道。美元是国际贸易往来和金融资产交易的最主要结算货币。一旦被制裁方获取或使用美元的能力受到限制，其国际金融体系中举步维艰。2012 年 3 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取消了伊朗金融机构的会员资格，导致伊朗出口商品的支付结算遇到极大困难，最终伊朗被迫在核武器战略上向美国做出妥协，换取美元的使用权。

三是切断被制裁方与全球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制裁方在禁止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与受制裁方交易的基础上，还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要求第三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参与制裁，全面断绝被制裁方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渠道。

朝鲜案例：2002 年朝鲜恢复核计划后，美国开始调查朝鲜的非法金融活动，并于 2005 年 9 月指控澳门汇业银行为朝鲜提供非法金融服务，宣称将在指控声明生效 30 天后的任意时间中断美国金融机构与澳门汇业银行的业务联系。虽然美国并没有对境外金融机构的行动提出具体要求，但大多境外金融机构出于对美国“秋后算账”的担忧，仍主动切断了与澳门汇业银行的往来。

伊朗案例：2006 年 9 月，针对伊朗铀浓缩技术的成功研发，美国禁止伊朗银行通过第三方国家的银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2006 年后的 2 年内，在伊朗的外国银行从 46 家减少为 20 家。^③ 2011 年底，美国在 2012 年《国防授权法》中进一步升级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措施，规定外国金融机构不得为伊朗中央银行或其他受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否则将受到美国的制裁。许多金融机构为了避免受到美国的处罚而选择放弃伊朗市场，伊朗逐渐被美国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

①刘东民、史晨：《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趋势、特征及其依赖的技术平台》，《银行家》2018 年第 8 期。

②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7～56 页、79 页。

③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 年第 2 期。

俄罗斯案例：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地区宣布独立后被并入俄罗斯，欧美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日渐紧张。欧美开始采取金融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改变外交政策，并逐步升级制裁力度，通过限制俄罗斯企业进入欧美金融市场，禁止境内机构或人员向俄罗斯提供中长期融资支持，实现关闭俄罗斯融资途径的目的，^① 俄罗斯因此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二）发起货币狙击既取决于自身实力，也取决于发现“鸡蛋缝隙”的能力

货币狙击的发起主体多为实力雄厚的国际金融资本。当这些机构发现某一经济体出现财政和货币政策决策失误、经济发展失衡、金融体系监管失控等致命漏洞时，就会通过金融衍生品放大可控制资产的规模，攻击相应经济体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人为地影响金融资产价格，从中获得经济利益。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的经济受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牵连而走向下坡。为了维持经济发展速度，泰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取消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同时由于泰国施行泰铢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泰国为了保证固定汇率制，只能维持较高利率，导致泰铢当时的融资利率远超美元，致使泰国银行业纷纷在国际货币市场融入美元，并在换汇成泰铢后，于泰国境内货币市场融出泰铢，实现套息交易。有的泰国银行甚至还在套息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期限错配，通过融入短期外币负债，融出长期泰铢资产，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敞口。久而久之，泰国积累了大量 1 年内到期的外债。同时，泰国工人工资增长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率，叠加泰国主要出口产品国际需求降低，导致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 1995 年和 1996 年迅速扩大。经常项目逆差本应带给泰铢贬值的压力，但由于固定汇率制，泰铢被动跟随美元的升值趋势，造成泰国的出口进一步受到抑制，无法积累外汇储备来抵御外债风险。泰国短期外债占总储备比例由 1994 年的 96.36% 上升至 1995 年的 119.37%，并在 1996 年进一步上行至 123.47%。^②

早在 1995 年，乔治·索罗斯就意识到了泰国经济的问题，并试探性地对泰铢发起攻击。虽然此时并没有引起泰铢的汇率危机，但索罗斯坚信泰国资产存在巨大泡沫，并开始为日后做空泰铢积蓄力量。1995 年，索罗斯采取了十分隐蔽的做空行为，没有引起泰国当局的注意。1997 年，索罗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索罗斯掌控的量子基金开始散播国

^① 马鑫、许钊颖：《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美国研究》2015 年第 5 期。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短期债务包括所有原定偿还期一年（含）以下的债务和长期债务的拖欠利息，总储备中包括黄金储备。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泰铢贬值的传闻，并大举抛售从泰国商业银行借入的泰铢。泰国政府试图通过抛售美元并买入泰铢，禁止国际投机资本从当地银行融入泰铢，提升国际投机机构融资成本等手段进行反击。但是，泰国的外汇储备有限，且融资成本的提升使泰国本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为此，泰国中央银行试图在 1997 年 6 月孤注一掷，通过禁止泰国金融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和远期外汇交易等方式，彻底断绝国际投机资金的泰铢来源。但是，量子基金再次通过媒体诱导市场，贬低泰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同时继续抛售泰铢，在外汇市场制造了更大的动荡。因为国内外舆论对泰国央行限制金融交易的巨大压力，泰国财政部长被迫辞职。^① 之后，国际投机者加大了抛售泰铢的力度，泰国再也而无力反抗。1997 年 7 月，泰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泰铢迅速贬值。泰铢兑美元年平均汇率由 1996 年的 25:1 贬值至 1997 年的 31:1，并在 1998 年进一步贬值至 41:1，^② 量子基金则通过做空泰铢获取了巨额利润。

（三）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甚至会引爆部分地区金融危机，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割韭菜行为”

国际金融资本发起的货币狙击是一种主动、直接的逐利行为。但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有时也会被动、间接地引发货币战。由于国际间流通的金融资产多以国际储备货币计价，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自身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改变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和汇率，影响全球汇率走势和金融资产价格。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体掌握全球资本流动，因而有能力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过程中择机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

拉美等经济体就曾经历过因美国货币政策调整而引爆的金融危机。二战后，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改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国开始增发美元。增发的美元首先流入了离美国较近的拉美地区。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增发的美元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了拉美国家外债的急剧上升。此外，拉美国家在美国的鼓励下，还积极借债投资石油。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则给了美国进一步布局的机会。美国以低利率的短期美元贷款和浮动利率的长期贷款向拉美国家提供援助，帮助拉美国家走出石油危机的影响。但是，拉美国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它们已经欠下了巨额的短期外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短期外债占总储备比

^① 李聃：《金融战争：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掠夺方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36 页。

^②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例，由 1979 年的 87.72% 上升至 1981 年的 193.25%。^① 当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并于 1979—1981 年大幅加息后，大量美元流回美国。美联储多次加息首先导致的就是美元国际借贷成本的上升。不仅新债的融资成本随美联储加息上升，当美元的市场利率达到 20% 时，美国金融机构甚至要求拉美国家以 20% 的利率偿还浮动利率的旧债。美元走强还伴随着石油价格的暴跌，造成拉美国家石油出口收入的锐减。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即便耗尽外汇储备也无法偿还所借债务的本息，就此揭开了 1982 年拉美金融危机的序幕。而美国资本却在拉美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普遍处于低位时重返拉美，在收割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通过控股拉美企业实现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

观察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与非美金融市场表现，我们感到虽然时常有美国资本利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展开针对其他经济体的经济金融体系漏洞发动货币狙击，且华尔街大鳄也伺机在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谋利，但美国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主要依据为自身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不会单纯为了操纵其他经济体的金融资产价格而特意改变货币政策。

（四）被金融战击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

被金融战击败的原因很多，但自身经济结构缺陷则是共性。无论是受到美国金融制裁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还是被索罗斯成功狙击的泰铢，自身经济结构缺陷是被攻击方在金融战中迅速败北的根本原因。

金融战败方经济结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依赖短期资本。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境外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对经济的刺激掩盖了泰国、拉美国家出口和工业生产的疲软。当这些经济体受到美元加息、投机资本操纵汇率等外部因素的冲击，或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时，此前流入的短期资本极易出现恐慌性外逃，引发外汇市场崩塌，而本地货币的贬值会进一步削弱相关经济体偿还外债的能力，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10 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 11 次金融危机中，^② 有 4 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与他们的国际收支或经常项目逆差较大有关，其中 3 个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因为相关国家的货币在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时，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所致；同时，有 4 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外债规模失控有关。^③ 二是经济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短期债务包括所有原定偿还期一年（含）以下的债务和长期债务的拖欠利息。总储备中包括黄金储备。

②不包括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③李聃：《金融战争：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掠夺方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6～227 页。

发展依赖出口贸易。有些金融战败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出口贸易，缺乏内生动力。比如，伊朗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绝大多数财政收入来源于石油出口。然而石油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是美元，一旦美国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来切断伊朗的美元支付、清算和交易渠道，伊朗的石油出口将无法正常运转，最终导致伊朗丧失经济发展的土壤。

当然，被金融战击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政策决策失误。一个原本平稳运行的金融体系有时会因政策决策失误而出现“自乱手脚”的现象，如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的日本。尽管《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急速升值是导致日本陷入“长期失落”的导火索，但实际上日本政府在协议签署之前非常乐于见到日元适当地升值，因而积极响应了美国关于签署《广场协议》的倡议。然而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远超日本政府的预料。为了对冲日元迅速升值造成的出口金额萎缩，日本央行持续保持较低利率，放宽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日本股市和房市，最终泡沫破灭引发了金融市场动荡和长期经济低迷。

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决策失误也会放大经济结构缺陷，进一步弱化其防御金融攻击的能力。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为了刺激经济，在缺乏金融监管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吸引了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极大加剧了其经济的不稳定性。

虽然从战争角度分析金融战胜负的主要原因也可能还是攻防双方之间较大的金融实力差距，但金融实力的差距首先体现在获胜方领先的金融专业能力。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以其专业能力，察觉到了泰国经济的结构隐患和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并准确把握时机，通过各类金融工具，在做空泰铢的同时获得了巨额利润。而泰国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沉浸在泰国较高的经济增速之中，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金融体系漏洞。在泰铢受到国际投机资金攻击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国际投机资金试探性做空泰铢的意图。在泰铢受到致命攻击后又没有及时、专业地应对，造成了局势完全失控。

三、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发动金融制裁， 美国抓住各种机会以各种名义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一）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名义实施金融制裁

1945 年 12 月，美国颁布了《联合国参与法》，规定“当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41 条，为实施其决议而决定采取措施，并促请美国实施该措施时，总统可以发布命令、制定规则或条例，通过其指定的机构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调查、规制或断绝任何外国或外国国民或在该外国的人员同美国或其管辖下的任何人或涉及到美国管辖的任

何财产之间的全部或部分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通讯往来”。美国有时会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作为实施金融制裁的理由。同时，美国也会尽可能发挥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力争将自己的金融制裁目标融入联合国的决议中，变成联合国的制裁目标。^①

（二）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需要的名义实施金融制裁

美国政府通常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国家紧急状态法》为依据，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利益的对象采取金融制裁措施。

1977 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规定：“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对外政策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权命令国内金融机构停止与被制裁对象之间的金融交易、款项划拨、货币转移等业务。而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被制裁国家或实体的侵犯时，总统有权下达冻结外国人在美国的资产，实行贸易禁运，或采取其他适当的应变方式的命令。对于那些违反该法案，依旧参加与被制裁对象之间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可以依据该法对其实施民事处罚或刑事处罚。”^②

1976 年通过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是美国国会对总统行使“紧急状态权”的制衡和规范。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前必须向国会解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理由和进入紧急状态后将采用的具体措施。尽管《国家紧急状态法》对美国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进行了约束，但总统在对“紧急状态”的界定方面仍拥有较大的自主权。^③ 美国对于“紧急状态”的概念定义十分宽泛，这使得美国可以针对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外交政策冲突、经济利益纠纷、违反美国价值观标准等任何美国认为威胁到其核心利益的情况采取金融制裁措施。比如，1992 年 5 月和 1998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和克林顿曾分别签发行行政命令，认定前南斯拉夫政府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地区的行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非同寻常的威胁”，并宣布为应对南斯拉夫政府的行为而进入紧急状态，冻结了南斯拉夫在美国境内的全部财产。^④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恐怖组织居无定所，传统的经济制裁无法有效地封锁恐怖组织的经济活动。对此，美国逐渐加强金融反恐的力度，以金融制裁措施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流转渠

①黄风：《美国金融制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警示》，《法学》2012 年第 4 期。

②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38 页。

③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8～39 页。

④黄风：《美国金融制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警示》，《法学》2012 年第 4 期。

道，遏制恐怖主义的发展势头。“9·11”事件后，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频次明显增加。^①为了进一步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在2001年10月颁布了《爱国者法案》，为美国管控境外主体的金融流通活动提供了新的依据。《爱国者法案》规定：“当美国成为武装敌对行动志向对象或者成为外国或外国国民袭击对象时，美国总统可以在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前提下，单方面决定对局部或孤立的敌对事件中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外国主权实体实行金融制裁。”^②

（三）更多的情况是以维护美国价值观标准的名义实施金融制裁

某些事件虽然属于其他国家的内务，但如果美国认为这些事件违背了美国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持有的价值观，就会据此对事件涉及的相关主体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比如，2003年3月，美国以“破坏津巴布韦的民主进程”和“蓄意瓦解津巴布韦的法治”为由，冻结津巴布韦部分政府官员的在美资产；2003年7月和2007年10月，美国谴责缅甸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因而发布行政命令对缅甸政府和缅甸政府的高级官员实施冻结资产等金融制裁手段。^③

对特定主体或事件实施金融制裁的法律依据：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和《爱国者法案》等针对一般性主体的法律以外，美国还针对特定主体或事件制定了一系列专项法律。比如1996年《伊朗制裁法》、2010年《伊朗综合制裁、问责和撤资法》、2012年《伊朗自由和反扩散法》、2012年《减除伊朗危险和叙利亚人权法》，以及包含对伊朗金融制裁条文的2012年《国防授权法》和2013年《国防授权法》等。^④其中，2012年《国防授权法》为了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明确规定了对银行体系的制裁措施。根据《国防授权法》的条例，“如果美国总统认为外国金融机构故意与伊朗中央银行或指定的其他伊朗金融机构处理或提供了重大金融交易，应禁止该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新开设代理账户或通汇账户、或禁止继续维持这类账户、或对此类账户施加严格的条件。如果外国的中央银行、国有银行或国家控制的银行，参与了和伊朗之间的石油产品购买及销售相关的金融交易，也都在签署制裁范围之内”。^⑤

对境外主体实施金融制裁的法律依据：为合法行使“长臂管辖权”，对境外主体实施金融制裁手段，美国在司法实践中时常援引国际法关于域外管辖权的条例。而“效果原

①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

②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③黄风：《美国金融制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警示》，《法学》2012年第4期。

④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

⑤同②。

则”在美国法院的普遍应用，更是扩大了美国实施“长臂管辖权”的范围。根据 1987 年《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对“效果原则”的解读，美国可以合法管辖“发生在一国之外，但已经或打算对另一国境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在如此宽泛的解读之下，任何影响或意图影响美国和美国公民的行动都会受到美国的管辖。^① 即便境外主体一些行为的本意并非针对美国或美国公民，甚至尚未发生，但美国仍可根据这些主体过往行为体现出的意图为其安置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极具主观倾向性的判定方式，不仅扩大了美国实施金融打击的范围，更为美国以保护国民为由实现战略意图留足了空间。事实上，美国很多金融制裁行动表面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但本质是美国为实现战略布局而使用金融制裁手段的借口。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就曾多次假借打击核武器扩散的理由。美国战略情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曾指出，“伊朗问题的关键在于波斯湾地区的权力平衡，伊拉克而非核武器才是美伊关系的根本问题”。^② 采取金融制裁手段维持两伊之间的权力平衡，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巩固石油美元体系，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针对一般性事件和行为的法律、针对特定事件和行为的法律，以及针对境外主体的法律共同构成了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法律基础。

四、美国发动金融战的底气来自于无可比拟的金融基础

美国完善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不仅为美国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提供了依据，还迫使境外主体必须在美国和其对手方之间做出选择。而境外主体愿意遵守美国法律的根本原因是参与美国金融体系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违反美国法律将面对的严重后果。例如，2010 年 8 月，巴克莱银行同意支付 2.98 亿美元了结美国对其违反针对古巴、伊朗、利比亚、苏丹和缅甸有关金融制裁协议的指控。再如 2012 年 8 月，美国纽约州银行监管机构指控渣打银行为伊朗客户非法掩盖大量金融交易，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法规，拟吊销渣打银行在纽约州的营业执照并处以巨额罚款。2012 年 12 月，渣打银行同意支付 6.67 亿美元罚款，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和解，了结相关指控。还譬如 2014 年 6 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法国巴黎银行承认美国对其利用美国金融系统为苏丹、伊朗和古巴转移资金的指控，认罪并同意支付 89.7 亿美元罚款。这些欧洲大型跨国银行宁愿接受天价罚款，整顿违规业务，与美国达成和解，也不愿被踢出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体

^①陈宇瞳、成弋威：《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分析与风险防范》，《金融监管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②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9 页。

系的主要金融机构之所以都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其根源就在于美元霸权、支付清算垄断与无可替代的发达金融市场。

（一）美元霸权是美国影响全球经济的基石，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这里，我们借用“美元霸权”这个政治情感词汇，但必须赋予其经济学含义。一是美元几乎等同于“全球大家庭的主权货币”，具备完整意义上的、且被全球认可和接受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是现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二是美国具备了维护美元信用的经济实力、金融技术以及金融市场容量，具备了透过美元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超强能力。三是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几乎没有其他国家的储备压力，美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压力很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所谓“美元霸权”，也是美国核心利益的集中体现。

二战以后，美国取得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于战争降低了各国间的信任度，战后各国倾向用黄金交易，严重制约了国际贸易。在此背景下，美国 and 英国分别由怀特和凯恩斯提出了各自的国际货币体系，计划将黄金与一种货币（美元/班柯）挂钩。最终，因实力差异巨大使英国无力与美国抗争，英国不得不接受了美国的方案。由于持有世界绝大多数黄金储备，美国推动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步奠定了美元较其他货币的优势。美元成为了全球贸易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

然而，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缩小，久而久之演变成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逆差。同时，由于黄金储备增长的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被迫超量发行美元来满足国际清偿需求。美国长时间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了其他国家对美元贬值的预期，而过度发行的美元又引起了其他国家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担忧。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本条件受到了法国等多个国家的质疑。这些国家纷纷选择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远远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单方面解除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西方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达成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协议，即《史密森协定》，但1973年美国再次退出该协议，标志着美国正式摆脱了黄金储备的限制。

虽然美元的可信度不再像与黄金挂钩时那么高，但短时间内也没有能替代美元的货币出现，美元仍旧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广泛使用。为了保持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迅速为美元找到了新的锚定物——石油，并与沙特签订了只能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结算货币的

协议。因为石油是当时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大宗商品，石油美元也带动了其他关键性大宗商品也成为美元的锚定物，美元因此成为了大宗商品的计价与结算货币，从而保持住了自身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建立后，其他国家不得不继续通过商品和服务换取美元来维持自身的贸易结算需求和国际储备需求。而美国则得以较为自由地发行美元换取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再通过低利息的美国国债换回美元。低息换回的美元一部分以工资、福利等形式流向美国人民，满足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另一部分则有条件地投向海外，通过海外资产收益率与美国国债利息的差额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美国人民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和美国投向海外的资产也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美元需求，因而为美国带来“滚雪球”般的回报。这使美国具备了以美元影响全球经济的能力。

当然美国货币供给也不是随意的，美联储具体掌管着货币政策。理论上，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使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产能利用率等主要经济指标符合其长期政策目标，不会单纯为了操纵他国经济而特意调整货币政策。但美元霸权的存在，使得美国可以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情况下，通过控制美元的发行量和流向，间接影响全球金融资产价格。

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紧密相连。在经济下行周期，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国内外输出流动性，助涨自身经济和其他各国的资产价格。但美国对外输出的流动性多以短期资本或中长期浮动利率资本为主，这类资金的期限与成本并不稳定。而待美国经济复苏到一定程度，美联储就会开始加息，收紧货币政策，为将来经济再度下行预留降息的空间。这时，美元将开始走强，吸引资金回流美国。一方面，回流美国的资金在其他国家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并得以在资产价格高位套现。另一方面，许多被撤资国家的经济难以维持正常发展，本国货币开始大幅贬值，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待被撤资国家的资产价格跌到一定程度，撤走的资金又会重新回流，完成对优质资产的抄底。美国通过货币政策影响美元走势，通过美元走势影响美元资金流向，通过美元资金流向影响世界经济。

（二）全球垄断的支付清算系统常常在美国发动的金融制裁中扮演重要的技术基础角色

SWIFT 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是美国通过支付清算系统发起金融战的重要武器。

SWIFT 是全球最大的安全报文交换服务机构，其网络连接了 1.1 万家金融机构客户，负责全球几乎全部货币的电子报文交换，是跨境货币能够顺利支付清算的核心前提。美元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和清算货币，使用量遥遥领先位居第二位的欧元。2015 年的一次全球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跨境贷款和存款以美元交易，87% 的外汇市场交易以美元为交易对象，美元资产在大多数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占比超过 60%。^①

CHIPS 是设立在纽约的私营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美国对 CHIPS 有着绝对的掌控，而全球 90% 以上的跨境美元交易都是由 CHIPS 完成支付清算。^② 由于美元在国际清算、支付中的垄断性地位，如果美国禁止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使用 CHIPS 进行跨境美元支付清算，这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将举步维艰。

2012 年 3 月，为迫使伊朗放弃核工业，美国联合欧盟制裁伊朗银行系统，要求 SWIFT 停止向被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提供跨境汇兑网络。数据显示，2010 年伊朗 19 家银行和 25 家金融机构通过 SWIFT 传送了 230 万份汇兑业务的电子报文，^③ 其跨境汇兑业务完全依赖 SWIFT 完成。由于支付清算渠道被切断，伊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被迫退化成为物易物等非现金模式，导致伊朗既无法从境外进口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无法向境外出口商品换取资金，引发了伊朗经济体系的崩塌。伊朗官方里亚尔兑美元年平均汇率由 2012 年的 12176:1 上升至 2013 年的 18414:1。^④ 但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伊朗人民很难以官方汇率换得美元，伊朗黑市上里亚尔兑美元汇率甚至能达到 40000:1。最终，伊朗被迫放弃了核武器的开发，换取美国暂时解除对其支付清算的制裁。

SWIFT 还是美国获取他国的国家和商业机密的数据源。“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权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从 SWIFT 中调取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流转信息。2003 年，美国在对 SWIFT 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时，发现澳门汇业银行有帮助朝鲜洗钱的嫌疑，并将澳门汇业银行列入了黑名单。各国银行出于对美国通过 CHIPS 切断美元清算路径的担忧，纷纷主动中断了同澳门汇业银行的往来，并停止与朝鲜的跨境汇兑业务。该事件造成朝鲜对外贸易的瘫痪。^⑤

①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 年第 2 期。

②刘东民、史晨：《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趋势、特征及其依赖的技术平台》，《银行家》2018 年第 8 期。

③孙天仁：《SWIFT 宣布终止对伊朗的金融服务》，人民网，2012 年 3 月 16 日。

④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⑤张明、薛威、陈骁：《警惕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中国宜将继续韬光养晦》，搜狐网，2018 年 8 月 20 日。

（三）发达且容量巨大的金融市场，成为封锁他国融资渠道的有力武器

美元霸权和支付清算系统霸权帮助美国铸造了强大的资本市场。仅以债券市场的容量为例，早在 2012 年美国供全球投资者选择的风险较小的固定收益市场总额就达 38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比例高达 240%。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这是任何区域市场都无法替代的，也是任何投资者与融资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影响一国的融资环境。俄罗斯就曾因为被美国封锁融资渠道而爆发了金融危机，迄今美国对俄罗斯依然还维持着级别较高的金融制裁。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地区就加入俄罗斯进行公投，拉开了美国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的序幕。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始于冻结高级政府官员的金融资产，并逐步升级。由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预期十分强烈，在美国开启对俄罗斯制裁的 2 个月内，已有 500 亿美元的资金逃离俄罗斯。2014 年 4 月底，标准普尔下调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评级，导致俄罗斯发债成本大幅提高，在八周内 7 次因价格原因取消发债计划。2014 年 7 月起，美国开始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俄罗斯金融、军工和能源部门。美国先是禁止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诺瓦泰克公司等能源公司进入美国金融市场，要求美方不得为这些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欧盟达成一致，采取协调性制裁行动，将制裁的“战场”扩散至欧洲市场。^① 2014 年 9 月，美国又以俄罗斯继续破坏乌克兰稳定为由，禁止美国公司和公民买卖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莫斯科银行和俄罗斯农业银行等 6 家大型俄罗斯银行发行的 30 天以上债务，禁止买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新发行的 90 天以上债券。^②

美国全面封锁了俄罗斯重要部门的融资渠道，这对美国而言只是富裕资金没有被高效使用，损失的只是利息；可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则是断绝了营养。2014 年 9 月，俄罗斯的外债达 6808.6 亿美元，而同期俄罗斯的国际储备仅为 4542.4 亿美元。^③ 如果美国长期封锁俄罗斯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途径，俄罗斯根本无力偿还外债。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国家大范围的违约将引发该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受到破坏性的损伤。特别是俄罗斯赖以生存的能源部门属于重资产行业，一旦丧失稳定、低价的融资支持，就极易陷入经营困境。美国封锁俄罗斯的国际融

①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7～149 页。

②易爱军、周而捷：《美国宣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重要行业》，新浪网，2014 年 9 月 13 日。

③数据来源：俄罗斯央行。

资通道产生了连锁效应，由于投资者担忧预期日益强烈，其股市被腰斩，卢布兑换美元也由 2013 年底的 31:1 大幅贬值至 2016 年的 80:1，累计贬值幅度 160%；而且俄罗斯还由此陷入深度经济衰退，2013 年俄罗斯 GDP 为 2.3 万亿美元，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连续 3 年大幅下降，分别为 2.06 万亿美元、1.36 万亿美元和 1.28 万亿美元。

参考文献：

1. 黄志凌：《金融危机扰动下的趋势思维》，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2. 张成思、张步昙：《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6 期。
3. 王湘穗：《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4 期。
4. 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5. 刘东民、史晨：《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趋势、特征及其依赖的技术平台》，《银行家》2018 年第 8 期。
6. 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 年第 2 期。
7. 马鑫、许钊颖：《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美国研究》2015 年第 5 期。
8. 李翀：《金融战争：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掠夺方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 黄风：《美国金融制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警示》，《法学》2012 年第 4 期。
10. 陈宇瞳、成弋威：《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分析与风险防范》，《金融监管研究》2017 年第 1 期。
11. 孙天仁：《SWIFT 宣布终止对伊朗的金融服务》，人民网，2012 年 3 月 16 日。
12. 张明、薛威、陈骁：《警惕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中国宜将继续韬光养晦》，搜狐网，2018 年 8 月 20 日。
13. 易爱军、周而捷：《美国宣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重要行业》，新浪网，2014 年 9 月 13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 国际经济 ·

世界经济同步放缓 衰退风险不容忽视

释经组 *

摘要：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在上年基础上进一步回落，主要经济体增速同步放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贸易、实体经济表现疲弱，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开启新一轮货币宽松周期以应对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进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散，使本就增长疲弱的世界经济再添风险因素，多个国际组织已经指出，疫情的持续蔓延将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关键词：世界经济 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衰退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跌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世界经济增长 2.9%，增速较上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按汇率法计算，世界银行预计世界经济增长 2.4%，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分国家看，美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维持低速增长；印度、新加坡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明显下滑。分经济领域看，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低贸易增速、低通胀水平、低失业率以及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主要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或降低利率并扩大政府支出，以防止世界经济出现衰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爆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可能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部分国家经济衰退几乎已不可避免，国际组织机构最新预测表明

* 释经组：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张军、石庆焱、石婷、张国洪、李婧婧、胡晨沛、郝悦。

世界经济大概率陷入衰退。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一）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2019 年，美国经济总体表现出温和扩张的态势，但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明显分化，呈现出就业强、消费稳、工业和贸易弱的特点，随着前期税改红利等财政刺激效应的减弱及贸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的显现，全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面对逐渐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美联储货币政策由上年的“加息—缩表”转向“降息—扩表”。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美国经济需求端、供给端受到全方位冲击，就业形势在短期内迅速恶化，经济衰退风险明显加大。

1.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回落。2019 年，美国 GDP 达 21.43 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 2.3%，增速虽回落 0.6 个百分点，但在世界经济同步放缓的背景下，仍明显高于日本、德国等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季度看，4 个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速分别为 3.1%、2.0%、2.1%和 2.1%，呈现出高开低走的特点。从需求端看，个人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1.76 个百分点，为近 6 年来最低水平；政府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全年拉动经济增长 0.41 个百分点；私人投资拉动 0.32 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拉动 0.23 个百分点，私人存货变动拉动 0.09 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拉动效果波动较大，其中四季度拉动 1.48 个百分点，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表 1）。

2. 工业增速大幅下滑。2019 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 0.8%，增速较上年下滑 3.1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生产下降 0.2%，为近 3 年来首次负增长。分行业看，机动车及其零部件作为工业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汽车市场表现低迷的情况下出现明显衰退，全年产值下降 2.2%，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市场销售稳定增长。2019 年，美国零售总额 62376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6%，增速回落 1.3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近 5 年来的平均水平。其中，网络零售较快增长，全年电子购物和邮购零售额为 6889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1%，占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11.0%，为历史最高水平。

4. 外贸增速明显下滑。2019 年，美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56163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0.2%。其中，出口额 24998 亿美元，下降 0.1%；进口额 31165 美元，下降 0.4%。全年贸易逆差 6168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7%，为 2013 年以来首次收窄。分类别看，货物贸易总额 41721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5%；服务贸易总额 14442 亿美元，增长 3.6%。

表 1 2017—2019 年美国 GDP 增长率 单位：%

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及其构成增长率（季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折年率）							
GDP	2.4	2.9	2.3	3.1	2.0	2.1	2.1
个人消费支出	2.6	3.0	2.6	1.1	4.6	3.2	1.8
政府消费与投资	0.7	1.7	2.3	2.9	4.8	1.7	2.7
私人投资	4.4	5.1	1.8	6.2	-6.3	-1.0	-6.1
出口	3.5	3.0	0.0	4.1	-5.7	1.0	1.4
进口	4.7	4.4	1.0	-1.5	0.0	1.8	-8.7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个人消费支出	1.78	2.05	1.76	0.78	3.03	2.12	1.20
政府消费与投资	0.12	0.30	0.41	0.50	0.82	0.30	0.47
私人投资	0.75	0.87	0.32	1.09	-1.16	-0.17	-1.08
净出口	-0.28	-0.29	-0.16	0.73	-0.68	-0.14	1.48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5. 价格温和上涨。2019 年，美国消费价格上涨 1.8%，涨幅较上年收窄 0.6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2.2%，较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12 月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为一年来新高。全年生产者价格上涨 1.7%，涨幅较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

6. 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2019 年，美国就业市场在上年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三大就业指标均表现亮眼。一是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3.7% 的失业率创下 1969 年以来的新低；二是非农就业人数稳定增长，全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10.8 万人，其中教育和健康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为主要增加行业，分别增加 64.7 万人和 38.8 万人；三是劳动参与率创多年新高，全年劳动参与率 63.1%，为 2014 年以来新高。

（二）欧元区经济更趋疲弱

2019 年，受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不确定性和英国脱欧等多重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速延续 2018 年的回落态势。尽管消费与就业表现稳定，但外部需求持续减弱进一步传导到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导致各成员国经济增速同步下行，欧元区整体更趋疲弱。展望 2020 年，由于内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政治经济风险交织，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元区前景黯淡，经济复苏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 GDP 增速加速回落。2019 年，欧元区 GDP 增长 1.2%，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 0.7 个百分点，为 2013 年以来最低。季度增速呈回落态势，GDP 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 0.5% 回落至四季度的 0.1%；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 1.4% 回落至四季度的 1.0%。分经济体看，欧元区经济增长引擎德国遭受严重冲击，增速回落 0.9 个百分点至 0.6%；受国内结构性改革措施红利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经济表现相对稳定，增速分别为 1.3% 和 2.0%，均回落 0.4 个百分点；意大利继续面临经济下行与债务高企双重压力，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0.3%，接近停滞；荷兰回落 0.9 个百分点至 1.7%；希腊彻底摆脱债务危机，连续 2 年实现 1.9% 的较快增长。从需求端看，内需为拉动欧元区 GDP 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拉动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点，个人消费支出拉动 0.7 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导致净出口成为拖累 GDP 增长的主要原因（表 2）。

表 2 2019 年欧元区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拉动 单位：%

指标	GDP 同比增速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净出口	出口	进口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库存变化			
一季度	1.4	0.6	0.3	0.8	-0.3	0.0	1.5	-1.5
二季度	1.2	0.6	0.3	1.7	-0.3	-1.1	1.1	-2.2
三季度	1.3	0.8	0.4	0.7	-0.7	0.2	1.3	-1.1
四季度	1.0	0.7	0.4	1.3	-0.6	-0.7	1.0	-1.7
2019 年	1.2	0.7	0.3	1.2	-0.5	-0.5	1.2	-1.7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2. 工业生产持续萎靡。2019 年，欧元区工业与制造业生产均较上年下降 1.5%，为 7 年最大降幅；月度降幅呈现扩大态势，年末增速分别降至 -3.6% 和 -3.8%，均为 2009 年 12 月以来最大降幅。汽车行业的萧条状况是造成工业生产疲弱的主要原因，欧元区和德国汽车生产较上年分别下降 12.5% 和 14.8%，均为 10 年最大降幅。

3. 消费市场增长稳定。2019 年，欧元区商品零售量增长 2.3%，增速较上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邮购或网购零售以及计算机、外围设备和软件类专门性商店零售分别增长 9.4% 和 4.4%，增速均较上年加快 2.6 个百分点。

4. 贸易活跃程度下降。对贸易局势的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英国脱欧等地缘政治问题导致贸易活跃程度下降。2019 年，欧元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44652 亿欧元，较上

年仅增长 2.2%。其中，货物出口额 23454 亿欧元，增速由上年的 4.1% 回落至 2.7%；进口额 21198 亿欧元，增速由 7.0% 回落至 1.5%。

5. 价格水平持续低迷。2019 年，欧元区通胀水平有所波动，全年消费价格上涨 1.2%，涨幅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创 3 年来最低水平；受服务业价格拉动，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为 1.1%，较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生产者价格涨幅由上年的 3.2% 大幅回落至 0.7%，全年呈回落态势。

6. 就业市场继续改善。2019 年，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全年失业率为 7.6%，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为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月度失业率保持下降趋势，年末 7.4% 已低于金融危机前平均水平（7.5%）；失业人数持续减少，全年累计减少 51.4 万人。虽然欧元区失业率大体保持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明显减小，且各成员国仍存在较大差异，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改善的空间已逐渐收窄。失业率最高的希腊下降 1.9 个百分点至 16.6%，失业率最低的捷克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2.0%；而葡萄牙从 6.6% 升至 6.9%，其他低失业率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卢森堡、塞浦路斯、立陶宛也略有上升。

（三）日本经济低速增长

2019 年，日本经济延续上年低迷态势，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持续的影响下，工业生产持续萎缩，对外贸易恶化，国内消费也因四季度上调消费税影响而转弱，全年经济表现出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三低”状态。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全面冲击以及内部政策实施难度加大、债务负担加剧、老龄化等问题未有明显缓解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前景面临的困难较多，未来风险与挑战加大。

1. GDP 低速增长。2019 年，日本经济延续上年低迷态势，GDP 达 536.10 万亿日元，增长 0.7%，增速较上年小幅加快 0.4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前三季度经济维持低速增长，其中一、二季度 GDP 环比分别增长 0.6% 和 0.5%。四季度受消费税上调叠加自然灾害影响，消费支出、企业投资和生产供应链遭受冲击，GDP 环比下降 1.8%，为 2014 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从需求端看，内需依然是拉动 GDP 增长的主要力量，全年拉动增长 0.8 个百分点。受益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充裕流动性为企业提供良好资金支持，个人企业设备投资拉动 0.1 个百分点。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项，拉低 0.3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前三季度个人消费表现强劲，其中二、三季度分别拉动 0.4 和 0.8 个百分点，四季度个人消费、个人企业设备投资大幅降温，分别拖累经济 1.1 和 0.7 个百分点（表 3）。

2. 工业生产持续萎缩。2019 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 2.9%，增速由正转负，为 2009 年以来新低。其中，四季度受台风、暴雨影响，工业生产大幅下降 6.3%，为 2013 年一季

表 3 2019 年日本 GDP 构成对经济同比增长的拉动

单位：%

指标	2019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0.7	0.8	0.9	1.7	-0.7
国内需求	0.8	0.9	1.3	2.3	-1.1
个人需求	0.3	0.8	0.9	1.6	-1.8
个人消费	0.1	0.2	0.4	0.8	-1.0
个人住宅投资	0.1	0.0	0.1	0.1	0.0
个人企业设备投资	0.1	0.3	0.1	0.8	-0.7
个人存货变化	0.1	0.3	0.3	-0.2	-0.2
政府需求	0.5	0.2	0.5	0.7	0.7
政府消费	0.4	0.1	0.4	0.5	0.4
政府投资	0.1	0.1	0.0	0.2	0.3
政府存货变化	0.0	0.0	0.0	0.0	0.0
净出口	-0.2	-0.2	-0.4	-0.6	0.4
出口	-0.3	-0.4	-0.4	-0.1	-0.4
进口	0.1	0.2	0.0	-0.5	0.8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度以来新低。分行业看，15 个工业大类中，14 个行业转增为降，其中生产用机械工业、电子元器件工业降幅较大，较上年分别下降 7.7%和 7.8%。

3. 消费需求冲高回落。2019 年，受上调消费税影响，日本消费需求冲高回落，全年零售额仅增长 0.1%，增速较上年回落 1.6 个百分点，新车登记数下降 2.1%。分季度看，前三季度国内消费保持稳定增长；三季度，因调税引发的提前消费令 9 月份零售和新车登记同比激增 9.2%和 13.6%，10 月份调税后零售额、新车登记双双大幅下降 7%和 25.1%，为近 4 年来新低。

4. 对外贸易持续恶化。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日韩贸易冲突加剧，严重打击日本对外贸易。前三季度进口额和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 2.4%和 4.8%，四季度台风、暴雨灾害天气令本就萎缩的对外贸易雪上加霜，全年出口额下降 5.0%，进口额下降 5.6%，双双由正转负，均为 2016 年以来最低增速。

5. 消费价格低位徘徊。2019 年，日本消费价格上涨 0.5%，涨幅较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0.6%，回落 0.3 个百分点。当前通胀水平与日本央行设定的 2%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生产者价格上涨 0.2%，回落 2.4 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涨

幅的大幅收窄也反映出工业生产的萎缩态势。

6. 劳动力供给长期紧张。2019 年，日本失业率 2.4%，与上年持平，仍为 37 年来的最低水平。有效求人倍率为 1.60，维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出劳动力长期供给不足。从就业角度看，2019 年日本老人、女性及海外劳动力就业人数快速增长，65 岁以上老人就业人数达到 892 万人，女性达到 2992 万人，分别较上年增长 2.5% 和 1.6%，均创历史最高人数。2019 年 10 月，在日工作的外国人累计达 166 万人，同比增长 13%。

（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

IMF 预计，2019 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 3.7%，较上年大幅回落 0.8 个百分点。分国家看，2019 年，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其中，印度增速大幅下滑 1.5 个百分点至 5.3%；新加坡大幅下滑 2.7 个百分点至 0.7%；中国香港经济增速为 -1.2%，为 2009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表 4 2018—2019 年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单位：%

经济体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越 南	7.1	7.0	6.8	6.7	7.5	7.0
印 度	6.8	5.3	5.8	5.6	5.1	4.7
印 尼	5.2	5.0	5.1	5.1	5.0	5.0
中国台湾	2.8	2.7	1.8	2.6	3.0	3.3
韩 国	2.7	2.0	1.7	2.0	2.0	2.3
巴 西	1.3	1.1	0.6	1.1	1.2	1.7
新加坡	3.4	0.7	1.0	0.2	0.7	1.0
南 非	0.8	0.2	0.0	0.9	0.1	-0.5
墨西哥	2.1	-0.1	1.2	-0.9	-0.3	-0.5
中国香港	3.0	-1.2	0.7	0.4	-2.8	-2.9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注：印度年度数据为财政年度。

二、世界主要经济领域运行情况

（一）世界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

2019 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 1.5%，增速较上年回落 2.1 个百分点，为 10 年来最低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 0.8%，为 10 年来首次下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3.8%，

增速较上年回落 1.5 个百分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明显下滑，年中一度跌至 49.3% 的多年新低。12 月份，美国制造业 PMI 为 52.4%；欧元区制造业 PMI 为 46.3%，连续 11 个月低于荣枯线，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制造业 PMI 分别为 43.7%、46.2% 和 50.4%；日本制造业 PMI 降至 48.4%；印度、巴西制造业 PMI 下半年开始有所回升，12 月份分别为 52.7% 和 50.2%；俄罗斯、南非则表现不佳，年末已分别降至 47.5% 和 48.4%。

（二）全球贸易明显恶化

2019 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头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的贸易争端拖累全球贸易增长，与贸易活跃程度密切相关的诸多指标在 2019 年均明显恶化。一是货物贸易量额齐跌。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测算，2019 年全球贸易量较上年下降 0.4%，为近 10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年贸易额下降 5.3%，其中进口额下降 7.1%，出口额下降 2.3%。二是全球贸易景气程度持续走弱。2019 年四季度，世界贸易组织（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 96.6，已连续 5 个季度低于 100 的趋势水平，个别分项指数接近或跌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三是贸易保护措施规模明显增加。WTO 数据显示，2019 年 5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共实施了包括提高关税、实现进口禁令在内的 28 项贸易限制措施，涉及商品价值约 4604 亿美元。目前，全球非关税措施已激增至 5 万多个，影响 90% 的全球贸易，成为全球贸易谈判的中心问题。

（三）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降

2019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下降，并呈低位波动态势，全年国际能源价格下降 12.7%；非能源价格下降 4.1%。其中，农产品价格下降 3.8%，原材料价格下降 3.8%，化肥价格下降 1.3%，金属和矿产价格下降 5.0%。国际油价低位震荡。2019 年，欧佩克组织（OPEC）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较上年下跌 8.2%。一季度在美伊紧张局势加剧、委内瑞拉局势动荡、利比亚内战等中东地缘政治事件影响下，价格出现短暂回升，4 月份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 70.78 美元/桶，较年初上涨 20.5%；此后，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转弱、贸易摩擦反复令市场需求不振，油价震荡下跌，8 月份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跌至年内低点，达到 59.62 美元/桶；四季度，贸易利好消息助推油价低位回升，12 月份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为 66.48 美元/桶，年内低点回升 11.5%。

（四）国际金融市场仍不稳定

2019 年，国际金融市场整体表现仍不稳定，随着全球经济前景、贸易局势变化及多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等因素起伏波动，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债市收益率整体下行，略有分化。2019 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74 个基点，德国下跌 39 个基点，英国下跌 37 个基点，日本上涨 8 个基点。二是汇市宽幅震荡。2019 年末，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的缓解，投资者对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减弱，美元指数在 12 月份下跌，全年累计上涨 0.34%；从其他主要货币兑美元看，欧元和日元分别贬值 2.02% 和 0.84%；英国首相约翰逊于 2019 年 8 月首次明确表示将避免“无协议脱欧”后，英镑不断走强，全年累计升值 3.88%。三是股市整体走高。2019 年，全球主要股指集体上涨。德意志银行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股票的价值从年初开始的不到 70 万亿美元，上涨至逾 85 万亿美元，总市值增加超过 17 万亿美元。明晟全球股票指数全年累计上涨 23.7%，明晟新兴市场股指上涨 22.3%。分国家看，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创历史新高，全年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5.2%，道琼斯指数上涨 22.3%，标普 500 指数上涨 28.9%；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上涨 12.1%，创 3 年来最大年度涨幅；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 26.4%，创 20 年来最佳年度表现；德国 DAX 指数上涨 25.5%，创 6 年来最大涨幅。

（五）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继续下滑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受世界经济增长疲弱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2019 年全球 FDI 下降 1%，从上年的 1.41 万亿美元降至 1.39 万亿美元，连续第 4 年下降。其中，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 6430 亿美元，较上年减少 6%，继续处于近年来的低位；发展中国家流入量 6950 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分国家看，美国 FDI 流入量 2510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仍为流入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流入量 1400 亿美元，与上年持平，位列全球第二；新加坡流入量 1100 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加 42%，为流入量第三多的国家。

三、2020 年世界经济或将陷入衰退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全面冲击

2020 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大面积爆发，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截至中欧时间 2020 年 4 月 9 日 10 时，全球已有 212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 1436198 例新冠肺炎，累计死亡 85522 例。在疫情迅速扩散后，世界经济几乎所有领域均受到了全方位的冲击：一是全球贸易投资需求大幅下滑。WTO《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

报告预计，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 12.9%~31.9%，下滑幅度可能超过金融危机时期，几乎所有地区贸易降幅都将达到两位数以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 FDI 在未来一年内下降幅度最大可能达到 40%，创过去近 20 年的新低。二是主要行业受到较大冲击。2020 年 3 月，全球制造业 PMI 降至 47.6%，其中美国（48.5%）、欧元区（44.5%）、日本（44.8%）等主要经济体均创下多年来的新低；发达经济体服务业更是进入“至暗时刻”，3 月份全球服务业 PMI 降至 37.0%，低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数值，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欧元区经济体服务业几乎全面停滞，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服务业 PMI 分别降至 31.7%、33.8%、17.4% 和 23.0%。三是全球主要资产价格全面下跌。一季度，美股在一个月内 4 次触发熔断机制，德国 DAX30、英国富时 100、法国 CAC40 三大欧洲股指季度跌幅分别达到 24.1%、24.8% 和 25.6%，全球共有超过 30 国股市进入“技术性熊市”；在疫情冲击和主要产油国价格战的双重影响下，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美油在一季度累积下跌 66%，创下历史最大季度跌幅，美油和布油均跌至每桶 20 美元上方。联合国、IMF 等主要国际组织已经表示，2020 年世界经济将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下滑，全球经济几乎肯定会发生衰退，并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

（二）全球贸易局势仍不稳定

2019 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些争端已经延伸至技术领域，冲击到全球供应链。尽管中美已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不排除这是在特朗普总统竞选压力和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背景下的短期缓和，未来全球贸易走势仍具有较高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2019 年，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争端，除中美经贸关系曲折反复外，美国还取消印度、土耳其最惠国待遇，对欧盟、法国商品加征关税，对越南钢铁制品征收最高 456% 的关税等。当前，美国贸易政策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2019 年 12 月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 884.0，远高于 105.9 的历史平均水平。二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明朗。二战后，世界市场的开放主要依靠多边机制（GATT/WTO）推动，2019 年 WTO 上诉机构正式停摆，WTO 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多边谈判功能陷入困局。从目前的改革方案看，主要成员国的观点分歧较大，未来 WTO 和多边体制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的协调作用将基本消失，全球经贸关系将处于更加动荡和不确定的状态。三是区域贸易协定助推贸易增长的效果仍然存疑。尽管当前贸易全球化趋势有所受阻，但区域性开放潮流势头不减，持续 7 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稳步

推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美日达成新贸易协定、欧盟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等，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将在双边、区域和多边渠道下得到有效推进。但也存在部分国家倾向于用区域贸易协定或者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定来替代全球化的多边协议，将区域贸易协定作为“逆全球化”的工具，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

（三）宽松货币政策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2019 年，全球央行启动新一轮降息潮，美联储在下半年连续降息 3 次，并重启扩表；欧洲央行 9 月份进行 2016 年以来首次降息，并宣布重启资产购买计划。据统计，全年至少有 40 个经济体进行了 89 次降息，其中印度、俄罗斯、冰岛降息次数最多，均降息 5 次；土耳其降息幅度最大，累计达 1200 个基点，共降息 4 次。2020 年 3 月份，美联储在短期内连续紧急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下调至 0%~0.25%，并引领全球新一轮降息潮。宽松的货币环境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或实现通胀目标，但货币环境的长期宽松同样存在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企业部门债务负担加剧，美国历史数据显示，在历次经济衰退前企业部门杠杆基本都经历了快速攀升，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企业金融的脆弱性；二是新兴经济体债务危机发生概率提高，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已多次由于过高的外债比重问题发生经济危机；三是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存疑，与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诸多经济体货币政策应对空间显著收窄，如金融危机前美国和欧元区政策利率在 4% 以上，日本政策利率也为正，但目前欧、日政策利率已多年为零甚至负利率，美国政策利率一再下降后也已触及零利率水平。从政策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宽松货币政策作用已明显减弱。如，印度于 2019 年进行 5 次降息，但尚未能扭转 GDP 增速大幅下滑的趋势；瑞典央行担心超低利率带来的资产泡沫风险，已于年末成为率先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因此，不能过于教条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杠杆率持续走高

面对疫情的冲击，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多国政府选择以历史级别的财政刺激来应对经济下行。2020 年 3 月 27 日，美国出台总额约为 2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规模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0% 左右，这一数字也远超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推出的 7000 多亿美元刺激计划；4 月 6 日，日本通过历史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 108 万亿日元。然而，金融危机以后，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刺激经济，使得当前多个经济体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经上升至历史高位。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三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已经分别达到 103.5%、100.6% 和 218.4%，较国际金融危机前分别提高 42.8、33.7 和 72.9 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方面，

中国政府杠杆率处于国际中等水平，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庞大；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国政府杠杆已经处于较高的风险区域。世界银行在 2020 年 1 月份《全球经济展望》指出，过去 50 年有过 4 次债务积累浪潮，最近一次债务浪潮开始于 2010 年，是这 4 次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和范围最广泛的一次。虽然低利率缓解了高债务带来的部分风险，但前 3 次范围广泛的债务狂潮都以金融危机告终，过高的债务水平使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五）地区动荡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有增无减

2020 年，全球地缘政治将继续动荡，调整与重塑的特征更为明显。中东、东北亚、南美洲等地区都存在地缘冲突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年初美伊紧张局势影响，由美联储经济学家卡尔达拉等人编制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已飙升至 547.97，为 1985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未来美伊矛盾或将持续紧张，可能扰乱全球石油供给，挫伤市场情绪。欧洲方面，民粹主义力量与主流政治力量激烈博弈，当前民粹主义政党直接控制或者通过执政联盟方式间接控制着 11 个欧盟国家的政府；英国脱欧虽已于 2020 年初暂告段落，但英欧需就未来关系展开全面谈判，包括贸易谈判在内的相关谈判被认为比脱欧谈判更为复杂，难度更大。此外，2020 年还是多国大选之年，民意分裂加剧的美国、陷入政治僵局的以色列、社会运动不断的法国、国内局势不稳的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以及韩国、斯里兰卡等国都将迎来大选。而其中美国大选已被视为英国脱欧后最大的地缘政治扰动因素，全球著名金融机构美银美林 2020 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大选的结果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之一。

四、主要国际机构对 2020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

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严峻、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等已使世界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就增长疲弱的世界经济再添风险因素，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可能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部分国家经济衰退几乎已不可避免。在疫情快速扩散的情况下，多家国际组织再度调低 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在 2020 年 4 月发布的最新预测指出，2020 年世界经济将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衰退，170 多个国家的居民收入将出现负增长；WTO 指出，受全球贸易大幅萎缩影响，全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介于 -8.8% ~ -2.5%；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预测称，2020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1.5%，为 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为 -3.3%，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为 1.1%。

表 5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的年度预测 单位：%

指标	预测机构	2018	2019 估计值	2020 预测值	指标	预测机构	2018	2019 估计值	2020 预测值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¹				通货膨胀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3.6	2.9	-3.0		发达国家	2.0	1.4	0.5
	发达国家	2.2	1.7	-6.1		发展中国家	4.8	5.0	4.6
	美国	2.9	2.3	-5.9		英国共识公司			
	欧元区	1.9	1.2	-7.5		世界	2.9	2.7	2.1
	日本	0.3	0.7	-5.2		美国	2.4	1.8	0.8
	发展中国家	4.5	3.7	-1.0		欧元区	1.8	1.2	0.4
	国际金融协会					日本	1.0	0.5	-0.1
	世界	3.1	2.6	-1.5	货物贸易量增速	世界贸易组织 ²			
	发达国家	2.2	1.6	-3.3		世界	2.9	-0.1	-12.9
	发展中国家	4.5	3.8	1.1		出口			
	英国共识公司					北美	3.8	1.0	-17.1
	世界	3.1	2.5	-2.1		中南美	0.1	-2.2	-12.9
	美国	2.9	2.3	-4.0		欧洲	2.0	0.1	-12.2
	欧元区	1.9	1.2	-5.7		亚洲	3.7	0.9	-13.5
	日本	0.3	0.7	-3.3		其他	0.7	-2.9	-8.0
	印度	6.1	4.7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³			
	世界贸易组织 ²					世界	3.8	0.9	-11.0
	世界	2.9	2.3	-2.5					

资料来源：2020 年 4 月 IMF 《世界经济展望》；2020 年 4 月英国共识公司《共识预测》；2020 年 4 月 WTO 《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20 年 3 月国际金融协会《全球衰退》报告。
注：1. 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2. 为 WTO 乐观情景下的预测；3.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

参考文献：

1. 曾培炎：《加强中欧合作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全球化》2020 年第 1 期。

2. 张宇燕：《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当代世界》2020 年第 1 期。

3. 智艳：《弱势回稳的世界经济：新变量、新动力、新机遇——2020 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世界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 期。

4.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2020：全球经济增速或将放缓》，《中国经济时报》2020 年 1 月 7 日。

5. Consensus Forecasts.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 April 2020.

6. IIF. *GMV: Global Recession*. March 2020.

7.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The Great Lockdown*. April 2020.

8. WTO. *Trade Statistics and Outlook: Trade set to plunge as COVID-19 pandemic upends global economy*. April 2020.

9.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low Growth, Policy Challenges*. January 2020.

责任编辑：李 蕊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思考

李金波 窦 勇

摘要：近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进而中央提出要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其关键在于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通过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模式、制度安排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就海南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特色 海南 自由贸易港 国际自贸港

作者简介：李金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部长、高级经济师、博士；
窦 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处长、副研究员、博士。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提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发展定位，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经验，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更加强调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打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要求，对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主要模式、制度安排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将为海南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参考。

一、国际著名自贸港的模式与制度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荷兰鹿特丹港等全球知名自贸港依托自身区位优势，不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高水平高标准的营商环境，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些自由港的发展经验，可为我们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借鉴。

（一）主要模式

当前国际上成功的自由贸易港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全域高度一体化的自由港，如香港。香港是全球物流、金融、贸易中心，是集外贸、金融、运输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自由港城市，是全域意义上自由港。香港实行自由通航、自由贸易政策，对所有货物免征关税，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税收政策极具国际竞争力。香港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连续 23 年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二是局部划定自由港，全域设为自由区，如新加坡。新加坡目前设有 8 处自由贸易区，区域范围涵盖新加坡港主要货运码头和航空货运枢纽。在 8 个自由贸易区之外，还实行与自由贸易区相同的贸易、投资、财税、金融、外汇、检验检疫及出入境管理政策。三是局部划定自由港，另设多个自由区，如迪拜。自 1984 年以来，迪拜陆续批准建立了 24 个自由区，发展出特色明显的自由区管理运营模式。迪拜自由区主要有三种类型：工贸综合型、物资流通型和行业产业型。迪拜 24 个自贸区全部由迪拜政府直属，各自由区实行不同的行业政策，最大限度发挥自由区功能效应。四是依托多国统一大市场作为腹地的自由港。鹿特丹港成为国际知名自贸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欧盟国家间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区，形成了统一大市场。尽管来自欧盟外的货物进入鹿特丹港需要缴纳关税、增值税等，但鹿特丹港采取了较为自由便利的保税措施，成为事实上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由贸易港。

（二）政策和制度体系

国际典型的自由港通常具有相对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包含了贸易投资、金融、税收、法律、监管等多个方面。

1. 贸易投资制度

实施自由的贸易政策。比如香港，根据《香港海关条例》等对外贸易相关条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除药品、武器、动植物等少数威胁健康和生态的物品外，均可自由进出香港；香港很少有配额和贸易管制，基本没有进出口配额；除对设限国家的纺织品出

口受被动配额管制外，香港没有主动的进出口配额管理。只对烟草、酒类（30 度以上）、碳氢油和甲醇等 4 类商品实行进出口证管理。新加坡根据《商品对外贸易法》《进出口管理办法》等主要贸易法规，除危险品、武器、药品及化妆品等少数特殊货物和少数特定地区外，其他商品均可自由贸易。迪拜自由区和鹿特丹港也是如此，同样没有资质和配额限制。

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政策。香港只对电讯、广播、交通、能源、酒制品销售和金融等少数行业实行有条件的准入，其他行业都是完全开放的；对外来或本地投资者一视同仁，为所有在香港公司提供公平经营环境。新加坡同样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除国防相关行业和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领域需向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外，新加坡对外资进入没有行业限制，商业、外贸、租赁等市场完全开放，对于外资无股权比例限制。迪拜在自由区内实施外商国民待遇政策，允许外商 100%控股；除矿产开发、金融零售业务外，区内企业注册、经营活动基本不受干预。鹿特丹除军工生产、铁路、电气输送网等少数特殊行业外，向外国公司完全开放，并享受本国企业同等权利。

2. 金融制度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在金融领域普遍具有“三大自由”，即跨境汇兑自由、贸易结算自由和投融资自由。

跨境汇兑自由。香港采取单一汇率制，没有汇兑管制措施，资本和金融账户高度开放，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在境内外开立本币和外币账户，账户余额可自由兑换、划转。新加坡早在 1978 年就取消了所有的兑换限制，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在境内外开立本币和外币账户，账户余额可自由兑换、划转。迪拜自由区内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外汇自由兑换。鹿特丹实行荷兰统一的外汇管理政策，外国投资者可以开设其他外汇账户，不受外汇管理的限制，从事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外汇交易同样也不需要领取特别许可证。

结算自由。香港企业可以在香港银行开立多种货币账户，使用任何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没有国际收支限制，进出口不设押金、预付资金、融资限制，进口购汇不要求提供信用证等证明文件，出口收汇也没有强制结汇要求。新加坡外资企业可自由开立银行账户，可自由决定结算货币种类。迪拜自由区和鹿特丹港也是如此，区内企业享受结算自由。

投融资自由。香港特区法律对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没有限制，国际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香港发行的债务工具。本地资金和境外资金均可自由进出、自由流动，外来投资者可将股息或资金自由调回本国。在新加坡，外资企业可以向新加坡本地银行、外

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开展融资业务，不限制企业利润汇出境，也无须缴纳特定税费。迪拜自由区和鹿特丹港区也是如此。

3. 税收制度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在税收制度方面多具有“零关税”“低税负”“简税制”等特征。

“零关税”。香港对所有非禁止类商品实施零关税，进口或出口的一般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关税，只对酒类（30 度以下）、烟草、碳氢油类及甲醇 4 类征收商品税。新加坡除了少数商品外，对其他商品进口不征收关税，全球超过 90% 的货物免关税自由进出。新加坡只对极少数产品征收进口税，约为全部商品细目的 8%，包括酒类、烟草（含卷烟）、糖制品、人造珠宝、皮包钱包和冰箱等，这些商品关税税率一般较低，约为 5%。只有汽车例外，其税率为 45%。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对所有境外入区货物免除进口关税，但进入迪拜境内须缴纳 5% 的关税。在鹿特丹港，对来自欧盟国家的货物免关税。鹿特丹港虽对来自欧盟外的货物需缴纳关税，但欧盟整体关税较低，平均不到 2.5%，而且保税期间可免缴关税，保税加工后进出时可按原材料或制成品税率孰低来缴税。

“低税负”。在香港，企业利得税最高税率为 16.5%，企业首得 200 万的利得税降至 8.25%，其后的利润则继续按标准税率 16.5% 评税；个人薪俸税最高税率为 15%。在新加坡，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税率为 17%，且也有分级分类的优惠政策；所有企业可享受前 30 万新元应税所得的部分免税待遇；一般企业前 1 万新元所得免征 75%，后 29 万新元所得免征 50%。对于新创业公司，新加坡还实行免税退税政策，并且越来越优惠。符合条件的起步企业前 10 万新元所得全部免税，后 20 万新元所得免征 50%。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等部门会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投资于新加坡鼓励发展的行业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如针对大宗商品业务，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全球贸易商计划，目的是为了吸引大型国际贸易公司前来设立区域营运中心，如果申请成功则企业的税率会下降到 10% 或 5%。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新加坡实行累进税率制。扣除个人所得税减免之外，个人所得税税率保持在 0~20% 之间。例如，4 万新元（约人民币 20 万元）、8 万新元（约人民币 40 万元）年薪的平均税率仅约为 1.5% 和 4%，远低于国际水平。此外，只要有财政盈余，新加坡都会给予人民税收回扣，如 2007/2008 财政年，新加坡的总回扣额达年收入的 25%。在迪拜杰贝·阿里自由港，免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除了杰贝阿里自由港免征增值税外，迪拜还有 6 个自由区也免征增值税：汽车城 Dubai Cars and Automotive Zone (DUCAMZ)、迪拜轻纺城 (Dubai Textile City)、Al Quoz 自由区 (Free Zone Area in Al Quoz)、Al Qusais 自由区 (Free Zone Area in Al

Qusais)、迪拜航空城 (Dubai Aviation City)、迪拜机场自由区 (Dubai Airport Free Zone)。在荷兰鹿特丹港, 公司利润 20 万欧元以内按 20% 征收, 超过 20 万欧元部分按 25% 征收, 近期因应世界减税趋势, 分别又下调 4 个百分点; 实行参股所得免税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即母公司得自子公司的所有红利和资本利得, 只要满足相应持股条件即可免税; 出售公司股份获得的收入原则上免税; 一定条件下, 并购和分立发生的收入享受免税待遇等。参股所得免税的基本条件是母公司至少持有子公司 5% 的股份, 子公司资产中的自由投资组合 (free portfolio) 不得超过 50% 等。对于无形资产收入 (包括技术创新收入), R&D 税收抵免后有效税率仅为 5%。为吸引外籍高端人才, 给予符合规定的外籍员工 30% 税收基数减免。

“简税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低税率及简单税制政策, 具体为, 一是只对来自香港的利润及收入征税; 二是不设增值税, 主要是三种直接税, 即利得税 (企业所得税)、薪俸税 (个人所得税) 和物业税, 并设有免税额制度。新加坡主要有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种, 对于取得新加坡应税收入的任何公司或个人需根据属地原则在新纳税。鹿特丹税务部门可通过与企业进行谈判, 预先确定未来的缴纳税金额和缴纳方式, 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4. 法律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都将健全法制作为重点, 建立起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治秩序。

注重顶层设计, 确保有法可依。香港沿用英国成熟的法律体系, 在法律上与欧美等国家相通一直是香港的优势, 建立了一整套规范自由贸易港运行的法律体系。香港在货物进出口领域适用的法律主要有《海关条例》《进出口条例》《进出口 (一般) 规例》《进出口 (费用) 规例》《进出口舱单公告》《进出口 (登记) 规例》《进出口 (移离物品) 规例》《进出口 (战略物品) 规例》《进出口 (运载物品) 规例》《进出口 (电子货物资料) 规例》《储备商品 (进出口及储备存货管制) 规例》《基因改造生物 (进出口须备的文件) 规例》等。而在外汇资金流动方面有《外汇基金条例》《杠杆式外汇买卖 (账目及审计) 规则》《杠杆式外汇买卖 (周年报表) 规则》《杠杆式外汇买卖 (仲裁) 规则》《杠杆式外汇买卖 (豁免) 规则》等。新加坡于 1966 年颁布了《自由贸易区法》(Free Trade Zones Act), 2014 年进行了修订, 该法案涵盖了自由贸易区运行的制度安排, 包括定位、功能、管理体制、优惠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此外, 新加坡还制定了《自由贸易区条例》《自由贸易区管理机构的任免通知》《自由贸易区指定区域通知》《自由贸易区生产条例》《自由贸易区指定货物通知》等。迪拜自由区在法律上规定了自由区为离岸法区, 除了刑法仍然适用外, 其民法和商法在区内停用, 由自由区管委会自行制定相关法规。鹿特丹则适用

欧盟的法律，确保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章可循。如《共同农业政策》《共同渔业政策》《共同外贸政策》《共同海关法典》《共同原产地规则》《共同竞争法》《共同反倾销规则》《共同商检法》《共同专利法》《共同公司法》《共同的产品技术安全与卫生法规》以及其他从第三国进口的共同管理规定。

确立法治秩序，树立全球公信。中国香港、新加坡司法制度独立，具备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香港政府一直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主要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2016 年 9 月成立争议解决政策统筹办公室负责全面统筹调解及仲裁的工作；由于法制健全，本地调解及仲裁服务广受国际信赖，作出的判决在全球多个司法辖区内均具有效力。新加坡则建立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司法相对独立制度，一方面保持执政党对司法系统的有效影响力，避免司法干预政治；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确保司法完全独立，不受权力干扰，既为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稳定的秩序保障，又确保了司法的独立公正。迪拜自由区为了确立法治公信，采取了更为特别的举措：2004 年公布《金融自由区法》，允许在区内实行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通法的国际法律系统，设立金融法院开展独立审判。

5. 监管制度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在监管上围绕货流、人流实行了一系列便利举措，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监管、可控监管。

极为便利的货物通关检验措施。香港进出口报关手续十分简便，除豁免报关的商品外，承运人只需于货物输入或输出后 14 日内向海关呈报进口或出口商品的运输资料和进（出）口报关单。企业可以在香港 24 小时进出货，同时可以将 14 天的货物清单汇总报关，高效便捷。香港查验率非常低，低于 1%。香港海关对进出口货物以抽选方式进行检查或检验，海关采用科学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依托大型 X 光机器检查货物，减少对货物的开箱，确保将在各出入境管制造成的干扰减至最少。高度便利的通关报关政策为企业将多地订单在香港港口整合发货、整合资源构建复杂的供应链提供了条件。此外，香港航运业高度开放，船只从海上进入或驶离港口时都无需向海关结关，进出或转运货物在港内装卸、转船和储存等不受海关限制。新加坡则在 1989 年就建立了“一站式”贸易网络（TradeNet），连接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军控等 35 个政府部门，与进口、出口贸易有关的申请、申报、审核等全部监管流程均通过该系统完成。进出口商通过电脑终端 10 秒钟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手续，10 分钟即可获得审批结果。除 TradeNet、海港网络（PortNet）外，新加坡政府还投资或参与了海事网（Marinet）、空运社群网（Cargo Community Network）等电子政务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单一窗口的内容和覆盖范围。

高度自由的人员出入境政策。香港是独立的出入境管制地区，对境外访客实行宽松

的签证政策。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旅游签证和进入许可规例》的相关条文，因为在香港特区出生或居住而与香港特区有密切关系者，无须领取签证或许可证。如不属于密切关系者，则须领取签证或进入许可证。前往新加坡投资经商的外国人可通过多种途径方便地出入新加坡：一是有意在新加坡进行投资者，可通过“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二是经常出入新加坡从事商务活动人士可申请有效期为1~5年的多次出入境签证，每次到访可在新停留30天，并可视情况申请延长停留期；三是持社交访问证可在新逗留6个月，且在签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四是商业入境证专为准备在新加坡成立新公司并将积极参与公司运作的企业家设置，最初有效期为2年，可多次入境，可申请续期，持证者还可申请让家人一同来新加坡居住。

二、深刻理解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

仔细研究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其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遵循以下内在逻辑。

（一）发挥地缘优势，重点打造供应链关键节点

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和荷兰鹿特丹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最为重要的经验在于他们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挖掘了其独特的地缘优势。香港位于南亚与东北亚航线要冲，新加坡则是扼守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迪拜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点，鹿特丹港则是亚欧大陆桥的西桥头堡。独特的地缘优势注定其要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上述自由港正是借着这些地缘优势，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国际中转物流的汇聚地、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对自由港而言，物流是引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物流的聚集和整合，导入背后的资金流、人流、商流和信息流，推动自由港成为资源和要素汇聚的纽带，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中枢。并且，通过物流产业的汇聚作用，既可为本地船务服务、航运补给、航运金融等服务业发展提供动力，又可通过完善采购、仓储、分配、运输等服务环节，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致力于打造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特殊的制度设计显得十分重要。比如，自由贸易港的“零关税”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安排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供应链关键节点在此布局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事实上，对自由贸易港而言，本地的消费市场十分有限，重要的不是通过关税获得多少收益，而是通过“零关税”和极少的贸易管制措施来聚集全球优质生产要素，打造一个更低成本的生态系统，其经济价值要远远高于因征收关税而获得的

经济效益。这是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及相关自由贸易政策等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

（二）利用分工深化，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链集群

所谓产业链的集群化，是指产业链上高度相关的产业环节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上聚集。比如新加坡借助其作为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的定价中心功能，在裕廊工业园区培育起世界级的石化基地，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又如迪拜所开辟的 24 个自由区各自特色不一，每个自由区都聚焦于形成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又如鹿特丹港，借助其运输条件和石化贸易枢纽地位，发展炼油、石化加工、钢铁等临港工业。这种产业集群化是自由贸易港作为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升级形态。

当然，这种产业集群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比重大幅提升。为了降低中间环节成本、提高产业链整体收益，跨国公司必然会选择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如各类自由贸易港区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在这一背景下，投资便利化及有关投融资自由的制度安排就十分重要了。换言之，贸易自由化深化了全球分工，而分工的深化必然要求投资便利化。而对那些自由港而言，敞开胸怀、吸引全球资本围绕自由贸易港的资源优势和功能定位进行系统性的投资布局、打造产业链集群，是培育自由贸易港的造血功能的必然选择。

投资便利化关键在于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以及与之有关的投融资自由等制度安排。试想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准入、较短的负面清单，全球的优质产业资本也难以汇集到所谓的自由贸易港。而若产业资本进来后赚得利润无法汇出，或者在开展投融资时成本较高，这些资本也会望而却步，产业链集群也难以形成。

（三）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形成全球价值链枢纽

当前，以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正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枢纽。所谓价值链枢纽，是指控制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布局确定将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价值链的枢纽。自然，结算在哪里，税收就在哪里。这也是全球自由港竞相招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重要原因，当前 7000 多家跨国公司在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

而全球价值链枢纽也不是天然的，而是政策制度设计推动形成。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往往会把税负较低、法治环境优良等营商环境较好的地方作为其价值链的枢纽。这正是当今高标准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关注的焦点。比如多数自由港都实行低税负政策，对在当地注册经营的企业实行相对较低的税率；通过实行资金进出自由、结算自由的有关政策为跨国公司在全全球范围内配置结算中心提供便利；对人员进出境采取高度便利化

的政策，以吸引全球人才聚集、配合打造总部经济；进一步的，在制度设计的顶层——法治秩序的建立上采取实质性措施树立全球公信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价值链枢纽的基础性安排。

迪拜的制度设计非常具有代表性。迪拜奉行以《古兰经》为基础的伊斯兰法，其限制利息、反对风险转嫁等理念与现代金融法治格格不入，严重限制了金融业务的开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阿联酋酋长国和迪拜酋长国双重授权，迪拜成立了一个具有独立管辖权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特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以处理国际金融交易。经过多年的努力，DIFC已在全世界建立起法治公信力，为迪拜真正成为中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根据不同国情，设计“境内关外”监管模式

如果说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一系列多边贸易体系是由世界各国共同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区域性经济组织是由若干国家共建共享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那么自由港就是由单一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向全球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这样的由单个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对于香港这样的小经济体而言，全域模式是一种选择，但对其他稍大的经济体就不再适用。新加坡虽然全域适用了自由区的一些政策，但在货物流转需要通过8个自由贸易区进行。8个自由贸易区与其他区域是围网隔离的。迪拜只在杰贝阿里等24个自由区享受特殊优惠政策，而且货物进出和中转只能通过杰贝阿里自贸区、迪拜国际机场和马克图姆国际机场等3个围网区域。鹿特丹因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不再围网了，但仍保留保税仓库的设置。

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很难做到全域都是自由区，这就需要一定的隔离措施，建立“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所谓的“境内”是指国境以内，一般也是自由贸易港的“一线”以内。所谓的“关外”是指关境之外。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定义，关境是指“一个国家的海关法得以全部实施的区域”。自由贸易港的“关外”主要指“关税征收的例外”，即关税豁免。大国采用“境内关外”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赋予自由贸易港各种特殊政策，通过“一线完全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在吸引全球资源的同时有效隔离潜在的风险，从而不影响本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以自由港为平台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进而促进全国经济高水平发展。

（五）紧跟时代脉搏，引领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产业链全球布局对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提出了挑战。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生产过程日益超出了国

界的范围，这就使得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逐渐从制成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在这一背景下，生产成本会随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不断累积，这样零关税等新贸易规则的价值就初见凸显。

对此，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也是走在贸易规则创新前列的，除了实行零关税和一系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外，还积极参与到各种经贸规则的制定中，成为引领形成国际经贸新规则的重要力量。比如，中国香港至今已分别与中国内地（2003 年 6 月）、新西兰（2010 年 3 月）、欧盟（2011 年 6 月）、智利（2012 年 9 月）、中国澳门（2017 年 10 月）、东盟（2017 年 11 月）、格鲁吉亚（2018 年 6 月）以及澳大利亚（2019 年 3 月）达成了 8 份自贸协定，且完成了与马尔代夫的自贸协定谈判。中国香港也是首名加入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① 新加坡也对外签署了 76 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 41 个投资保护协定，其目的在于使选择在新加坡开展跨国业务的公司享有最低税负。特别是近年来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到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新加坡和有关国家的持续努力下，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逐步被纳入到谈判议题。

三、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议

海南是当前中国唯一的全省建设自贸区并探索建设自贸港的特殊区域。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港，要注意吸收借鉴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在贸易、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制度经验，还要注意结合海南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加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突出中国特色。

（一）发挥独特优势，明确自贸港的目标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海南要发挥好这一独特优势，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的目标定位。

^①《贸易便利化协定》（《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于 1995 年成立后首份缔结的多边贸易协定，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生效。而中国香港是首名于 2014 年 12 月正式加入《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协定》包括加快货物流动、放行和清关，以及促进海关与有关当局合作的条文，令跨境贸易更容易，并提供更透明及可预计的营商环境，有助商户减低成本及提升效率。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网站，https://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tradefora/trade_facilitation.html。

1. 海关监管特区。海南应实行相较现有 138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更为特殊的监管政策，将全岛整体定位为海关监管特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境内关外”制度：在操作上对境外货物和人员进入岛内，一线完全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内地货物和人员照常进入岛内，经由海南岛离境时需按有关要求办理报关手续。

2. 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试验田。当前，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在自由贸易港率先实行有关国际经贸新规则，可以为我国加快实施 FTA 战略、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3. 中国特色的新贸易中心。海南不以转口贸易、加工制造为发展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导。这就需要海南结合自身实际和国家需要独辟蹊径，打造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离岸贸易为特色的新贸易中心。

4. 国际一流的经济交往中心。借鉴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港的经验，发挥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优势，吸引集聚一批掌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打造万商云集、人才汇聚、政商交流的高水平国际经济交往中心。

（二）注重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制度规则体系

作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最具国际竞争力、最有特点的开放平台，自由贸易港承担着加快推动中国由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历史使命。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此，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有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好的制度规则。

1. 制定“自由贸易港条例”。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条例，形成一个管总的、基础性的制度设计，把中央对于海南的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精神转化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法定条例，形成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来回“翻烧饼”。要通过“自由贸易港条例”的制定，为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制度体系奠定一个有法可依的顶层架构。在操作上，这一条例不应再是中央文件中的“指导意见”，因为“指导意见”毕竟不是法律；也不要等几年后才可能出台的来自全国人大的“自由贸易港法”，而应该是由海南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草拟，经征求中央有关部委意见后提交本级人大审议通过的“自由贸易港条例”；在试验成熟的基础上，再择机升格为国家立法。

2. 制定基础性专项规章。要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尽快制定出台五个基础性专项

规章：一是海关管理的有关规定，明确自贸港海关监管地位、方式、职能等相关安排；二是体现自贸港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规则；三是适用于自由贸易港的人口迁徙流动、落户、生活的管理办法；四是用于指导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操作指引；五是确保整个海南岛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标准的环保规章。要以上述五项基础性专项规章为依托，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结合海南实际，研究制定十大支持政策

注意到海南正同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印发，有关政策应当在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自由贸易港特点。

1. 对海南全岛进口自用消费品实行零关税。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鹿特丹受制于欧盟的统一海关政策要求外，其他高标准自由贸易港都采取了零关税政策。海南应将实施零关税作为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手棋。除少数特殊商品外，对由境外进入海南全岛的自用消费品免征关税。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分为几步：第一步，先从正面清单做起，即列出对部分商品实施零关税的清单。如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 10 个领域进口的企业自用设备（含零配件、耗材）和原辅料免征关税。第二步，待试行取得效果后，列出一个相对较长的负面清单。第三步，逐步将负面清单缩短。

2. 削减非关税壁垒。研究提出进出口货物“负面清单”，采取综合措施，分步骤削减不必要的非关税壁垒，最终实现仅对部分产品进口实行禁止或有条件限制。当前，可配合南繁育种中心的建设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先行允许海南无障碍引入全球优质种质资源，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探索建立中转隔离基地（保护区）、检疫中心、种质保存中心、种源交易中心。取消或放宽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及自然人移动模式的限制，率先在医疗、教育、互联网、会展、体育赛事、影视制作等新兴领域取得突破。

3. 放宽离岛免税政策。近年来，随着出境游日益升温，中国人每年境外购物总金额接近万亿。海南要充分发挥其“旅游岛+自由港”的优势，通过放宽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国内游客到海南旅游消费。海南全岛实现境内关外后，对旅客从海南自贸港带入内地的行李邮递物品视同从境外带入境内。为此，要做好离岛免税政策与行邮税有关政策的衔接，对于经由“一线”进入岛内的免税生活消费类货物，开放更多的特许经营，扩大离岛免税的商品范围，促进庞大的境外消费回流，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4. 实现货物进出分线监管。境外货物进入岛内在“一线”基本放开，仅在指定口岸

实行备案管理；对通过海南岛进行中转、加工等以及转口、过境的货物，实现转关货物不报关，转口货物不报检，转口货物价值量不统计（仅统计物理量和吞吐量）等。对由海南岛输入内地（“二线”）的货物属于离岛免税政策范围之外的，视同内地的进口，按有关要求正常报检报关；对内地输往海南岛的货物不视同出口，但经由海南出口到境外的视同出口，按有关要求办理报关手续。

5. 便利人员流动。外国人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经商，可直接落地签证，如由海南进入关内（二线），则要办理相关入境手续。实行分级管理的工作准证制度，为在自由贸易港工作生活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便利周到的入籍落户服务。国内人员自由进出自由贸易港，如经过海南去往境外，则需要依规办理相关出境手续。在海南自贸港内设立出入境管理机构，由国家相关部门授权办理相关出入境业务。

6. 实施低税率所得税政策。当前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对设在西部地区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 15% 的所得税率。2018 年海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51955 元，低于陕西（63478 元）和重庆（65933 元）。建议在海南也适用企业所得税率为 15% 的政策，并对初创型科技企业还可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对个人来源于海南的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比照深圳前海的政策，按照最高不超过 20% 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7. 实施高水平投资便利化政策。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34 号）对此已有详细表述。鼓励各类资本投资于高端医疗健康、生物制药、航空航天、深海远海科技等领域。允许外资将来自港内的投资收益自由汇兑、自由进出。支持海南自贸港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可调回港内使用；支持港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为人民币“走出去”创造条件。

8. 建设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允许港内金融机构全面开展各类离岸业务。允许港内企业自主持有外汇、外币之间自由兑换、外进外出的外汇资金自由划转。探索资金流、货物流、订单流三流分离状态下外汇收支便利化措施，支持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吸引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结算中心、贸易中心和订单中心落户海南，打造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支持在港内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9. 在海南率先探索数字贸易新规则。取消外资进入增值电信业务领域的股比限制，鼓励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在海南建设离岸大数据存储中心，为全球用户提供云计算服务。国家电信管理部门和安全机关对此类数据存储和云计算服务免于审查过滤。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互联网资讯开放水平，允许企业和科研人员经登记后更开

放地接入域外网站；通过运用电子身份证、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允许自由贸易港内人员在实名认证下查阅国际互联网信息。

10. 支持发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专项债券”。目前，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其中 2020 年约 971 亿元、2021 年 758 亿元、2022 年 587 亿元、2023 年 680 亿元、2024 年 94 亿元。考虑到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国家战略，若能以“自由贸易港”的名义发行专项建设债券，其资信评级有望实现 3A，可以大幅降低融资成本。故建议中央在每年正常下达海南的地方债额度的同时，支持海南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业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专项债券”，首期规模 200 亿元，可以滚动发行，专项用于自由贸易港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窦勇、李金波：《解构自贸试验区产业体系发展》，《中国外汇》2019 年第 18 期。
2. 王晓红、李锋、夏友仁、高凌云：《对“三零”国际经贸规则的认识》，《国际贸易》2019 年第 6 期。
3. 黄奇帆：《在长三角地区协同推进建设开放新高地》，《全球化》2019 年第 2 期。
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自由港政策比较及借鉴研究》，《科学发展》2014 年第 9 期。
5. 王胜、陈健娇、钟天祥：《荷兰鹿特丹自由贸易港发展经验探析》，《今日海南》2018 年第 7 期。
6.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今日海南》2018 年第 4 期。
7. 张春宇、叶芊林：《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新举措——海南全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国远洋海运》2018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新形势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美基建领域的比较研究

王维伟 盛思鑫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迅速发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可持续发展、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等不少挑战，尤其与美国相比，基础设施发展的总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作为当前新冠疫情和外需下滑的一种积极应对，中国可借鉴美国在基建领域的发展经验，加快推动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建项目，重视发展与民生相关的“软基建”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基建”，扩大基建领域的对外开放，充分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参与，大力推进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创新和债务处置工作，稳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服务于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 软基建 新基建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王维伟，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讲师、硕士生导师；
盛思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一、中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经验与现状分析

（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领域都实现了迅速发展。截至 2018 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3.2 万公里，较 1949 年增长 5 倍。^①其

^{*} 感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吕志岭硕士与北京交通大学张帅博士在本文后期文字修订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①中国政府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中国交通 70 年大幅跃升》，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 年 8 月 13 日。

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3 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2/3，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经建成运营“四纵四横”高铁网，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中国公路总里程 485 万公里，是 1949 年的 60 倍。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为 14.3 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水路货运量达 70.27 亿吨，为 2017 年同期的 105.2%；水路客运 2.80 亿人；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3919 个，是 1949 年的 148.6 倍。^① 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 4945 条，是 1950 年的 412.1 倍。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主要有如下发展经验。

1. 长期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国民经济的优先发展领域。从“六五”计划重点投资交通运输建设，到“九五”计划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十三五”规划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国家一直坚持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特别是用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长较快。“五五”到“七五”期间，中国对重点基础设施的投入达到年均 10.7% 的增速。^② “八五”到“九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达到 26%。^③ “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年均增长 24.5%，比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速高 8 个百分点。^④ “十二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12.5 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 1.6 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

2. 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本需求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对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较难通过市场的方式满足，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建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稳定且成本较低的融资渠道。2009 年，国家开发银行 78.4% 的贷款投向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重点支持了南水北调、国家高速公路网、石油储备等国家重大项目。^⑤ 这一比率在 2013 年增至 80% 以上，主要投向公共基础设施等“两基一支”领域。^⑥ 截至目前，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家开发银行累计贷款占到 85% 以上。以铁路为例，2017 年国家开发银行发放铁路贷款 1472 亿元，这是其连续第 7 年发放铁路贷款超 1000 亿元，累计支持铁路建设里程近 6 万公里，约占全国通车铁路里程的 50%，成为了支持铁路发展的主力银行。^⑦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中国宣布的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已完成合同签约

①交通运输部：《2018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交通运输部网站，2019 年 4 月 12 日。

②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 60 周年系列报告之七：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 年 9 月 15 日。

③任艳：《制度创新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④同脚注②。

⑤姜业庆：《国开行贷款 78.4% 投向基础设施》，《中国经济时报》2010 年 1 月 20 日。

⑥杜金：《国开行以中长期投融资服务稳增长、调结构》，《金融时报》2013 年 7 月 18 日。

⑦佚名：《人民网：国家开发银行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国家开发银行网站，2018 年 6 月 22 日。

3518 亿元，重点支持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条件。^①

3. 积极探索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新模式。21 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引入建设—移交 (BT)、建设—经营—转让 (BOT)、资产证券化 (ABS)、公私合作 (PPP)、溢价回收机制、项目收益债券、基建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新模式，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200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帮助政府突破了举债限制。2008 年，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地方平台迅速扩张，并在之后几年内成为地方政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同期，BT、BOT 等投融资方式也逐步兴起。为满足基础设施及民生领域的发展需求，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有关企业债券申请共计 7166.4 亿元。^② 2014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连发 3 份关于 PPP 模式的重磅文件，鼓励社会资本以 PPP 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2018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基建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这意味着基建进度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生项目建设会进一步加快。^③

4. 充分借助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发达国家的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减轻国内的资金压力，充分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例如，1983—2002 年，世界银行给予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贷款占对华贷款的 50% 左右。而在上述时期，世界银行基础设施贷款占投资贷款的平均比重从 46% 下降为 35%，占总贷款的比重则从 39% 下降到 25%。^④ 1986—2016 年，中国总计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 360 亿美元援助贷款，其中有 50% 投向了交通部门。此外，中国还一直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获取有关技术支持，如亚洲开发银行 1986 年以来批准的对华技术援助赠款就有 4.32 亿美元，其中有较大部分用于支持运输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⑤ 2017 年 5 月 14 日，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6 家多边开发银行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方面达成共识，之后财政部还联合亚洲开发银行等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⑥ 2019 年 3 月，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签署主权业务联合融资框架协议，拟在未来共同为更多项目提供融资。^⑦

①董静：《国开行，用优质服务护航“一带一路”》，《中国金融家》2019 年第 11 期。

②沈明：《发改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证券日报》2016 年 2 月 25 日。

③佚名：《政治局会议明确“六稳”，加大基建投资补短板》，第一财经网站，2018 年 7 月 31 日。

④董大方：《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模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⑤亚投行：《亚行行长承诺大力支持中国改革》，亚投行网站，2017 年 3 月 20 日。

⑥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财政部与 6 家多边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财政部网站，2017 年 5 月 14 日。

⑦佚名：《亚投行：已批准 15 个国家的 39 个项目，将开展联合融资》，央视网，2019 年 4 月 20 日。

（二）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经验

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基建领域主要有以下发展经验。

1. 凯恩斯经济学为美国的基建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减税等措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提高充分就业水平。其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核心原则是将更多财政资源配置于基础设施，通过社会化的工程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吸收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等。20 世纪下半叶，尽管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时有起伏，但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重点施政内容。1993 年克林顿担任总统后实施大力发展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计划，有力支撑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大发展。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和上一任总统奥巴马都致力于推动美国基础设施的更新与升级，以确保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重视发挥私人公司和金融资本的重要作用。美国具有重视调动私营部门在基建领域作用的经济传统，私营部门拥有大部分美国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以 2015 年为例，私营部门拥有的基础设施资产存量为 40.7 万亿美元，地方政府的资产为 10.1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的资产仅为 1.5 万亿美元。2016 年除国防开支外，美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为 3.5 万亿美元，其中有 86% 来自私营部门，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所占比例分别只有 8% 和 6%。^①美国联邦政府历来重视通过融资和补助方面的政策激励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奥巴马政府曾采用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业主有限合伙基金等融资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基建领域部分私人投资的限制，还支持诸如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等基础设施资产的私有化。2018 年初，美国公布《重建美国基建立法纲要》。这个纲要本质上是一个基建融资计划，目的是希望通过 2000 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撬动 1.3 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广泛涉入基建领域，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避免了政府投入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对私人资本的“挤出”。

3. 重视州际和全国性项目的建设投入与协调。尽管联邦政府在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较为有限，但通过平衡和协调各州政府在州际项目中的利益，有力推动了州际和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建设州际公路体系，几

^①Chris Edwards. *Who Owns U. S. Infrastructure?*. Tax & Budget Bulletin. CATO Institute, 2017 (78).

乎连接了美国所有主要城市，成为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相互合作最成功的范例。奥巴马政府投资 3500 万美元用于提高电力设施和电力规划水平，提升各州之间的协作，减少能源运送和传输过程中的损失。美国 2050 年基础设施远景要求交通规划统筹国际国内，要为国内商业对外拓展提供方便、为城市间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从而提高国内和国际交通的通达性与便利度。

4. 高度重视民生类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权运动的展开，美国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民生类基础设施的投入。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表明，2016 年底，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娱乐、环境保护等民生类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存量占政府总资产的 24%，超过 3.3 万亿美元。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美国于 1972 年制定了《清洁水法案》，确保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防止水资源浪费。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1970 年以来，废弃物负荷增长了 1/3，但污染物的排放仅为 1970 年的 50%。高质量的水资源使公众健康得到一定保障，同时也带动了滨水地区的城市发展。美国 2050 年基础设施远景强调，交通规划要服务于城市和乡村社区的弱势群体。

5. 将基础设施建设国际拓展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经济完成了重建，提高了美国在欧洲的软实力，同时也确立和巩固了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一是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帮助美国打开了战后市场，对外援建带动了美国建筑材料的出口，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并输出了技术和生产标准。二是美国对西欧市场的占有率迅速攀升，1948—1950 年分别为 36.3%、62.7%、73.2%。^①此外，美国对东南亚的国际援助项目也大多侧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帮助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推动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目前在缅甸提供了超过 2.5 亿美元的融资，用于缅甸开发电信塔。^②

6. 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的国家。政府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放到国家和全球战略竞争的高度，把它看作进入信息时代的基础以及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国家竞争力优势的关键所在。1993 年 9 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开始从整体上整合信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发展。为此，美国投入 4000 亿美元，耗时 20 年建立 NII。此后，克林顿总统又开始实施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计划（NSDI），签署《电信法》和开发新一代互联网（Next Generation Internet）等文件，进一步推进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进入 21

^①孔昊：《马歇尔计划何以成功》，《支点》2015 年 1 月 21 日。

^②魏珊珊：《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缅甸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寻找投资机会》，《财经时报》2019 年 4 月 9 日。

世纪以来，随着通信、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美国开始大力推动宽带网络建设及其应用的发展，促进信息基础设施的“超级公路”真正实现。

（三）中美基础设施领域的差距简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跨越式大发展，后发优势明显。尽管近年来有关更新和升级美国基础设施的研究及政策建议层出不穷，媒体也常常报道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很多大城市。但是综合而言，中国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根据《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美国的基建水平目前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 141 个国家中总体排名第 13，中国的排名为第 36。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公路连通性、公路质量、空运和海港服务效率、饮用水安全等具体领域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①

表 1 中美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得分和全球排名比较

指标	中国		美国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基础设施总体	77.9	36	87.9	13
运输基础设施	68.9	24	79.6	12
1. 公路连通性	95.7	10	100	1
2.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	59.7	45	74.5	17
3. 铁路密度	17.9	61	41.3	48
4. 列车服务效率	59.0	24	69.2	12
5. 机场连通性	100	2	100	1
6. 空运服务的效率	60.7	66	79.6	10
7. 班轮运输连通性	100	1	96.7	8
8. 海港服务效率	58.6	52	75.9	10
公用基础设施	86.9	65	96.2	23
1. 电力接入	100	2	100	2
2. 供电质量	99.0	18	98.6	23
3. 接触不安全饮用水	83.6	74	100	14
4. 供水可靠性	64.9	68	86.1	3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整理而得。

^①Klaus Schwab.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表 1 显示，中国与美国在机场连通性、电力接入和供电质量等方面的排名差距较小。在班轮运输连通性方面，中国排名第 1，美国排名第 8，中国优于美国。在铁路密度方面，美国现在的总里程为 23 万公里，而按照原先的规划，中国到 2020 年才 16 万公里。^① 在公路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公路连通性排名第 1，中国排名第 10。在公路基础设施质量方面，中国排名第 45，美国为第 17。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公路交通最发达和通车里程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运输部联邦公路局发布的《2014 年美国公路统计报告》，2014 年底美国公路网总里程 672.1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0.4 万公里。^② 而 2018 年，中国公路总里程仅为 485 万公里。在航空基础设施领域，美国的航空基础设施有较突出优势。目前美国有 1.97 万个机场，而中国只有 298 个机场；美国有 33 万架民用飞机，而中国只有不到 6000 架。中国的机场拥有量和民用飞机拥有量只有美国的 1/60 左右。中国的基础设施在交通运输的服务效率、饮用水安全和供水可靠性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比较明显。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虽有较快发展，但除个别领域外，同美国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中美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主要挑战

（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

1. 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地域上：一是城乡差距大。以医院的床位数为例子，2017 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为 8.75 张，农村为 4.19 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 1.35 张。^③ 此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与城镇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前者为 38.4%，后者为 74.6%。^④ 二是省市间的差异大，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省市与发达省市间的差距较大。例如，按省域面积计算，天津、北京、上海的铁路密度最高，西藏、青海、新疆的铁路密度最低。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截至 2018 年底，全国仅有 35 个城市开通了城轨交通线，其中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运营线路总长要远超石家庄、哈尔滨和乌鲁木齐等城市。^⑤ 三是区域间的差距大。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基础设施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以铁路为例，当前中国铁路路网布局，中西部铁路密度要远

①尚前名：《基础设施投资依然大有可为》，《瞭望》2016 年第 30 期。

②周国光：《中国与欧美公路网的比较与思考》，《长安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0 期。

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8》，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 年。

④CNNIC：《2019 年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城乡网民规模》，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9 年 2 月 28 日。

⑤仲建华、李闽榕主编：《中国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 2018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城市轨道交通》2019 年第 4 期。

低于东部地区。

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民生基建发展不充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中国生态环保领域投资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而美国在 2000 年已经达到 2.6%。^① 中国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只有 1.5 平方米，不到美国和日本人均数的 1/10。^② 二是信息基建发展不充分。根据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61.2%，北京、上海、广东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 70%，而中西部一些地区如云南、西藏、甘肃等，互联网普及率还未及 50%。^③

2. 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创新与政策监管。中国基础设施现有投融资模式较难持续，不太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亟需通过金融创新探索新的融资模式。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而原有主要由政府投资的模式带来了较高的地方债务，支持基础设施的金融体系长期依靠银行贷款，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较高。尽管中国正在力推基建的 PPP 模式，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因此，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还需要更多金融创新，同时也需要做好监管工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另外，对于政府作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项目，在具体的项目决策和建设过程中，需要严格监管各种不规范行为以及腐败问题。

3.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由于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通常由不同部门负责，省际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协调机制缺失使得基础设施在部门间和省际的协调性不足。例如，在京津冀地区，对区域整体发展有利但对本区域发展影响不利或利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就很难推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也面临数据、信息和资源共享等“软联通”问题。以交通领域为例，由于不同的地区或部门掌握着各自领域的基础数据，受地区或部门利益竞争和协调机制缺乏的影响，这些数据很难共享与整合，增加了交通研究与规划决策的难度。

4. 国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融资、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意识形态差异、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博弈^④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但是其中不少国家资金短缺，政府的财力和履约能力也较弱，一些较大的基建项目推进起来十分困难。此外，各国在基建、交通规则、道路标

① 贾蕾、郑国峰：《中美环保投资的对比研究及经验借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 年第 6 期。

② 郭谦：《基础设施建设应转型为“民生基建”》，《中国证券报》2014 年 12 月 05 日。

③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CNNIC：《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2019 年 8 月 30 日。

④ 盛思鑫、曹文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全球化》2015 年第 1 期。

由表 2 可见，到 2025 年，美国在基建领域需要总投资 4.59 万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 2 万亿美元。为实现目标，到 2025 年美国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需要由 GDP 的 2% 增加至 3.5%。而这仍将低于日本（6%）、韩国（5%）、澳大利亚（4%）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①

3. 基建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当前联邦政府有关基建的政策和监管对美国的基建成本有较大影响。例如，根据美国的《购买美国产品法》，使用联邦政府资金建设的项目必须从美国本土采购原材料，并且不得雇佣外国人。^② 由于美国国内基建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外国劳工，基建成本居高难下。另外，由于基建项目的审批流程复杂，大的投资计划容易受到国会、两党政治和地方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基建效率也比较低。正如特朗普总统在 2018 年达沃斯论坛上指出的，美国现在仅仅为了批准一条简单的道路就可以花 10 年的时间。

三、中国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过去的发展经验以及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作为当前新冠疫情和外需下滑的一种积极应对，应继续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高质量发展。一是重点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大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积极谋划和提前开工一批促进城市群及都市圈发展的重大基建项目，以此促进人口和经济的集聚，从而充分发挥基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二是在有条件的地区，注重将基础设施从传统的“铁公基港”拓展到包括改善医疗、社会福利、文化和娱乐设施投资在内的诸多涉及民生的“软基建”，注重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突出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低碳与科技含量，更新或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

（二）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中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效益已呈现递减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基建”有望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以及政府的引导作用，发展和运用新科技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

①李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报告：基础设施建设或成中美合作新亮点》，《科技日报》2017 年 1 月 24 日。

②盛思鑫、曹文炼：《关于投资美国基础设施的调研》，《全球化》2014 年第 10 期。

业发展创新以及提高城市的智能化水平。首先，应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这些新技术、新基建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二，大力发展数据驱动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科技生态产业化落地的新型基础设施。第三，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与 5G 相结合，大力构建物联、数联与智联的政府治理支持平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最后，大规模培养面向产业的核心基础人才，从而真正释放“数据”作为新一代生产要素的庞大价值。

（三）大力推进政策创新和债务处置工作

在政策创新方面，对于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应继续由政府财政出资。对于纯经营性和准营利性基础设施项目，在及时总结 PPP 基建模式经验和局限的基础上，加快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市政债”等创新金融模式发展基建，努力降低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成本和建设成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营造公平、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环境，积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参与基建的策划、设计、投资、运营和收益分配。对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的基建项目，要分类施策和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鼓励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政策创新。债务处置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风险监管，对于风险较大的城投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要采取“开源节流”的办法严控其新增债务和支出，鼓励和督促其通过城投公司发展转型、分散基础设施所有权、债转股、所有权出让等方式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同时还要摸排这些债券持有人的风险敞口情况，严防一些风险管理水平较弱的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因持有这些债券而导致兑付危机。对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允许和鼓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从银行间市场获得流动性，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压力，同时也可减小债务存量规模。

（四）稳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认真总结“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已有重大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网络，特别是涉及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建网络。一要加强舆论引导，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密切关注西方和部分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各种攻击和抹黑，并积极予以有力回应。二要强化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在金融方面的可持续性，防止部分项目因烂尾或严重拖延而导致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重损失，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行稳致远。三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和实施力度，切实关注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评估

和保护问题，尤其是对可能演变为负面舆论焦点的话题进行重点摸排，提早准备应对方案。四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资存量投资的梳理和情况掌握，尤其是对通讯、安防、传媒、大数据、网络创投等敏感领域项目做到心中有数。

参考文献：

1. 5G 与高质量发展联合课题组：《迈向万物智联新世界：5G 时代、大数据、智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彼得拉·托多罗维奇、罗伯特·亚罗著，彭肿、刘合林、袁晓辉校译：《面向基础设施的美国 2050 远景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9 年第 7 期。
3. 陈瑞三、项英辉：《促进经济增长、化解政府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新思路》，《辽宁经济》2012 年第 9 期。
4. 陈文理：《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借鉴》，《湖北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5. 龚婷：《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分析》，《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7 年第 3 期。
6. 李玉涛：《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5 年第 1 期。
7. 刘银喜、徐天骄：《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对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借鉴》，《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8. 罗雨泽、陈红娜：《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验》，《中国经济时报》2015 年 8 月 3 日。
9. 马昱、邱苑华、王昕宇：《城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19 年第 8 期。
10. 吕雪梅：《美国艾森豪威尔州际及国防公路系统》，《中外公路》2004 年第 4 期。
11. 钱红波：《美国城市交通数据资源共享对我国的启示》，《上海东方早报》2015 年第 12 期。
12. 孙燕铭、孙志人：《美国财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研究》，《财政研究》2017 年第 6 期。
13. 王虎、王莎：《奥巴马政府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措施简析》，《中国财政》2016 年第 12 期。
14. 刘慧勇：《铁路需要研究大战略》，《中国投资》2012 年第 11 期。
15. 张朋辉：《美国酝酿能源基础设施“大修”》，《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4 日。
16. 赵硕刚：《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及中国企业机遇》，《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李蕊

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现状、动力与挑战

——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

任玉娜

摘要：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同时也是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缩小东盟的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现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信息通信技术及人才交流等方面，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初显成效。并且，东盟巨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庞大的数字用户基础，初具规模的数字产业以及逐步完善的政府战略部署，为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东盟国家欠发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巨大的数字鸿沟以及薄弱的数字科研能力构成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障碍。

关键词：数字经济 数字丝绸之路 信息通信技术 东盟

作者简介：任玉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经济由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及其与实体经济的跨部门、跨产业融合两部分构成。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诉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新机遇。通过数字经济的赋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大数据、智能互联、云平台等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共同推进数字经济跨国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及相关机制。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提升双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核心内容是数字经济的

协同发展。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是一个逐步缩小双方数字鸿沟，进而实现高层次合作及普惠共赢的过程。现阶段以中国对东盟的援建为主，包括数字技术输出、数字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发展瓶颈是影响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关键因素，关系着数字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

一、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现状

东盟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有 17 年，双方正在紧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2014 年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已经成为双方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标志性项目。2017 年，中国与泰国、老挝等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将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合作领域，优化合作方式，协调利益诉求，共同建设能够惠及多方的数字丝绸之路。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当前的建设重点包括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开展电子商务合作，进行信息通信技术及人才交流等。

（一）共建数字基础设施，着力实现互联互通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首先要打破由于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的合作壁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在国家层面，2018 年，双方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指出要做好东盟内部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的对接工作，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协同。中国已经按照“1-3-10-4-6”的规划，在东盟多国境内援建了信息基础设施，即 1 个国际海缆登陆站、3 条国际通信海缆、10 路国际陆路光缆、4 个重要通信节点、6 个大数据中心。^①在企业层面，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均已在东盟国家开展投资与合作。中国联通成立了广西东盟信息交流中心，并在越南等东盟 8 国成立了分公司，中国移动与东盟共同开发信息高速公路，中国电信推出了东盟国际信息园项目。华为、中兴、海容通信、小米、欧珀（OPPO）等通讯企业也在东盟国家展开了业务布局，并投资建设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在物联网、云计算、智能互联、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密切合作。

^①佚名：《东盟数字经济发展障碍体现在四方面需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经济带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DJNMJVQ05385KJD.html>，2019 年 4 月 25 日。

(二) 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共建数字商业生态体系

2014 年以来，双方已成功举办六届中国—东盟电子商务论坛。中国与东盟多个成员国签署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协议，跨境电商的合作规模、合作领域和便利化程度持续提升，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愈加完善。京东“亚洲一号仓”电子商务产业园、谷歌出海体验中心、阿里巴巴“一达通”、苏宁电子商务产业园等 20 多个电商项目成功推进。目前，东盟已经是继美国、欧盟之后的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第三大合作伙伴。^① 如表 1，阿里研究院《建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报告指出，2018 年，天猫国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销售额前 10 名中，有 4 个是东盟国家，分别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泰国商品的销售额最高，且 2018 年的销售额比 2017 年增加了 125%。中国与东盟的电商合作除了涉及商品贸易外，还在技术、经验、投融资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双方共同致力于智能机器人分拣、自动化智能物流、人工智能客服及电子支付等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表 1 2018 年天猫国际“一带一路”商品销售额前 10 名国家及部分品牌

排名	国家	商品品牌
1	泰国	Mistine, Twin Lotus, RAY, Beauty Buffet, Paratex, Nittaya
2	以色列	Moroccan oil, Silkn, Tripollar, Sabon
3	新加坡	Expression, Brands, Vita Realm, Hibeau
4	捷克	Dermacol, Nutrend
5	希腊	Korres, Apivita, Mesa Vounos
6	匈牙利	Omopua, ChocoMe, Tokaji
7	土耳其	Flormar
8	马来西亚	ChekHup, Old Town, AhHuat,
9	印度尼西亚	Richeese
10	俄罗斯	Libre Derm, KDV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阿里研究院《建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整理而得。

(三) 开展数字技术合作，促进数字人才交流

2011 年，中国科技部决定启动“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通信、互联网、嵌入式系统和机器人研发等信息技术的合作是十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12 年，中国科技部联

^①李霞、柯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策略研究》，《对外经贸实务》2019 年第 9 期。

合东盟科技委共建了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为双方技术项目的交流提供官方平台支撑。2015 年以来，阿里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东盟国家建立了区域性数据中心。2018 年 12 月，双方延长了《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期限，继续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技术应用、科技政策和监管等方面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2019 年 9 月，中国首个对国外单一国家建立的数据通道——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启动，拟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并探索数据处理、联合研发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在数字人才交流方面，2009 年，华为设立了信息通信技术（ICT）知识转移项目，旨在为各国培养本土 ICI 青年人才。华为相继与印度尼西亚联合成立了数通 IP 高级培训中心、华为联合创新中心，发布“未来种子”计划并推出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智慧一代（SmartGen）。柬埔寨和老挝也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加入了华为“未来种子”计划。除华为外，还有许多其他企业在东盟乃至全球推出了数字人才联合培养项目。2018 年，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教育联盟（简称 GET 联盟），为培养数字人才、探索数字商业模式、传播创新创业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内在驱动因素

东盟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其展现出的巨大潜在机遇是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重要的内在驱动因素，具体体现在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消费者、数字产业生态、数字公共服务四个维度。

（一）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提升，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总体上看，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完善，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规模、增速持续提升，基础设施的性能、种类和覆盖范围显著提升且资费大幅下降。2018 年，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移动互联网覆盖了东盟 50% 以上的人口，移动数据成本也降低至四年前的 1/2。^① 同时，各国正在逐步达成统一的基础设施标准和协议，并整合数字基础设施平台。这将显著降低数字产业发展成本，提升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普及范围。例如，东盟科创独角兽格步（Grab）旗下的格步支付（GrabPay）与泰华农民银行（Kasikornbank）、马来西亚银行（Maybank）以及大华银行（UOB）等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逐步成为东盟电子支付的领军企业，堪称“东南亚版的支付宝”。数字基础设施

^①Google, Temasek, & Bain & Company. *e-Conomy SEA Report 2019*. <https://www.useit.com.cn/thread-24962-1-1.html>.

对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已经得到了东盟国家的普遍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为数字产业创造着发展空间。

（二）数字消费者规模庞大，成为主要驱动力

根据阿里研究院与毕马威（KPMG）的测算，2018 年在全球主要的 150 个国家之中，有 7 个东盟国家的数字消费者指数位列全球前 50 名（如表 2）。其中，新加坡位列全球第 4 名，具有显著优势。东盟人口基数庞大，人口结构比较年轻，且中产阶级成长强劲，为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础。当前东盟整体互联网用户数量大致为 60%，是继中国、印度及美国之后的第四大互联网用户聚集区，网民总数约为 3.6 亿人。^①图 1 显示了从 1995 年互联网商用后直至 2017 年或 2018 年东盟各国的互联网用户占比。其中，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三国 80% 以上人口为网民，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越南、菲律宾、泰国的互联网用户约占 60%~70%，达到了东盟 10 国的整体平均水平；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四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低于 45.3% 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08—2019 年，东盟 10 国互联网用户占比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21.9%，在全球属于增长率较高的区域。如图 2，其中缅甸、柬埔寨增长强劲，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63.8% 和 54.1%。

表 2 2018 年东盟部分国家数字消费者指数

国家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文莱
指数	0.779	0.578	0.474	0.433	0.408	0.398	0.324
排名	4	25	33	34	36	37	4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阿里研究院、KPMG《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整理而得。

不仅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而且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把时间花在互联网上并参与数字经济消费。谷歌（Google）和淡马锡（Temasek）等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东盟各国互联网用户平均上网时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 年，泰国用户日均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长达到 5 小时 13 分钟，居全球第一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用户，日均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长约为 4 小时，位居全球前 10 位。越南用户日均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间为 3 小时 12 分钟，也高于 3 小时的全球平均水平。许多互联网用户利用谷歌邮箱（Gmail）、谷歌文档（Google Docs）等基于云的应用程序提升工作效

^①Google, Temasek, & Bain & Company. *e-Conomy SEA Report 2019*. <https://www.useit.com.cn/thread-24962-1-1.html>.

率，利用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应用丰富生活。同时，电子商务、网约车、在线医疗等数字服务的需求激增。因此，东盟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规模庞大的数字用户基础，这为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潜在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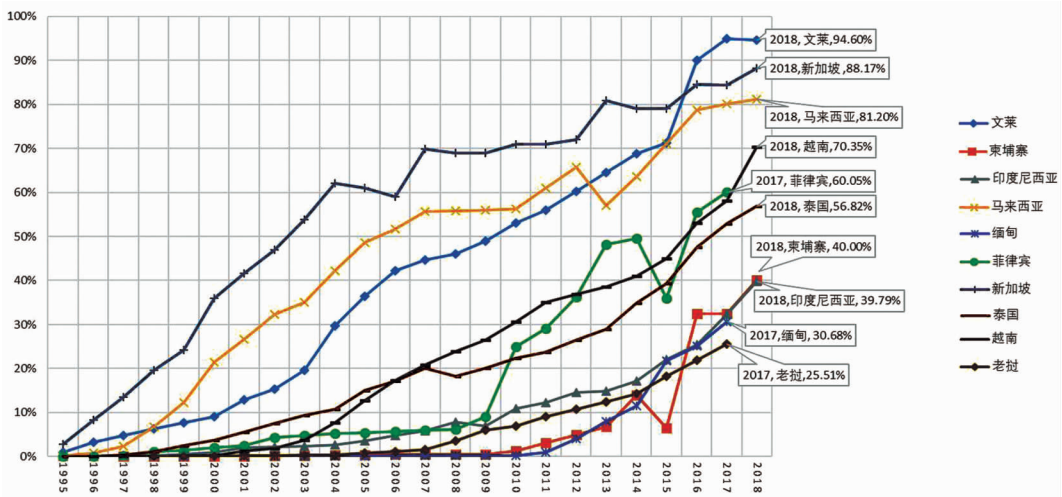


图 1 1995 年以来东盟各国个人互联网用户占人口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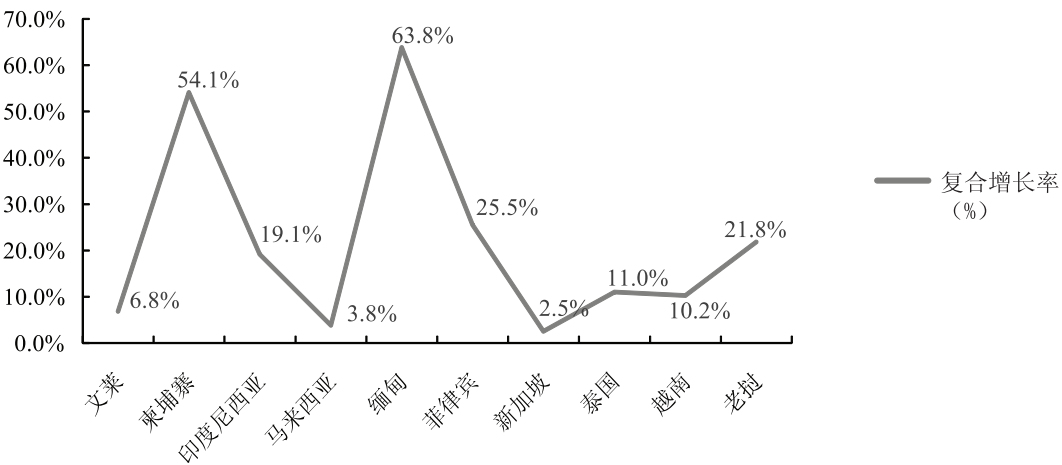


图 2 2008—2019 年东盟各国互联网用户占比复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而得。

（三）数字产业初具规模，富于发展活力

从数字产业整体规模来看，东盟各国数字产业体量偏小，数字产业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较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 年）》中统计了 47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其中包含 5 个东盟国家。如表 3 所示，2018 年，美国数字产业规模高达 123408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数字产业规模为 47290 亿美元，

与美国差距明显。英国、美国、德国的数字产业规模占 GDP 比重均超过了 60%，位居世界前 3 名。新加坡数字产业规模为 1348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37.02%，略高于中国的 34.75%。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数字产业规模尚不足 GDP 的 12%。东盟的数字产业初具规模，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阶段，将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东盟各类数字产业正在迎来加速发展期，展现出了旺盛的增长势头，未来将释放出更大发展潜力。

表 3 2018 年部分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国家	数字产业规模 (亿美元)	数字经济 规模排名	GDP 规模 (亿美元)	GDP 规模 排名	数字经济占 GDP 百分比 (%)	占比 排名
美国	123408	1	204941.00	1	60.22	2
中国	47290	2	136081.52	2	34.75	9
德国	23994	3	39967.59	4	60.03	3
日本	22901	4	49709.16	3	46.07	5
英国	17287	5	28252.08	5	61.19	1
新加坡	1348	17	3641.57	28	37.02	8
印度尼西亚	1186	21	10421.73	16	11.38	43
马来西亚	780	27	3543.48	29	22.01	17
泰国	580	29	5049.93	23	11.49	42
越南	293	35	2449.48	32	11.96	3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及世界银行数据整理而得。

注：表中的排名范围仅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 年）》中所统计的 47 个国家，而非世界排名。

东盟各国主要的数字经济产业可以分为电子商务、在线媒体、线上旅游、网络交通四大类。Google 和 Temasek 等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 年东盟各国数字经济产业的交易总额比 2018 年跃升了近 40%。2015—2019 年，约有超过 370 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了数字经济领域，成就了一批独角兽企业。通过丰富商品种类、注重移动客户端开发、积极进行市场营销、延伸物流网络等途径，东盟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从 2015 年的 55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382 亿美元，到 2025 年有望超过 1530 亿美元。网络交通市场交易规模在 2025 年有望增至 400 亿美元，增速仅次于电子商务领域。目前，东盟有 3500 万网约车及在线食品配送用户，日均乘车预订 800 万次，但其中活跃用户仅占 20%，未来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东盟国家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在线媒体行业增长强劲，网络教育、媒体影音、

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等深受欢迎。旅游业是东盟的重要支柱产业，在线旅游亦是当前数字经济中最成熟、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并且，在线旅游业强大的渗透能力和无边界属性，能有效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形成新兴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利局面。

表 4 2019、2025 年东盟 6 国分行业数字经济规模

行业	业务类型	典型企业	2019 年 市场交易规模	预计 2025 年 市场交易规模
电子商务 (E-Commerce)	网络购物 数字金融服务 (支付、汇款、 借贷、投资保险)	Lazada Shopee Tokopedia Qoo10	382 亿美元	1530 亿美元
在线媒体 (Online Media)	在线广告 网络游戏 音乐订阅 视频点播	Google Play Netflix Facebook	142 亿美元	320 亿美元
线上旅游 (Online Travel)	网络订票 网约酒店 线上度假租赁	OYORooms RedDoorz	344 亿美元	780 亿美元
网络交通 (Ride Hailing)	网约车 在线食品配送	Grab Gojek FastGo Micab	127 亿美元	400 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e-Conomy SEA Report 2019》及其他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四）政府数字化水平提升并部署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公共服务与数字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不仅意味着市场和产业的数字化，提升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亦是应有之义。电子政务是政府数字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联合国每隔一年对 193 个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所做的全面测评显示，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由 2016 年的第 4 名下降至 2018 年的第 7 名，但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仍具有显著优势。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 6 国的电子政务发展也位列高水平阶段。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还有提升空间。东盟国家均推出了有效的电子政务发展规划，例如，马来西亚的公共部门 ICT 框架（2016—2020），菲律宾的电子政务总体规划，泰国的智慧政府建设规划，越

南的无纸化电子政务项目。同时，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也在着力建设公共云基础设施。

表 5 2016、2018 年东盟各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国家	2016 年电子政务发展情况			2018 年电子政务发展情况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世界排名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世界排名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新加坡	0.8828	4	非常高	0.8812	7	非常高
马来西亚	0.6175	60	高	0.7174	48	高
菲律宾	0.5765	71	高	0.6512	75	高
泰国	0.5522	77	高	0.6543	73	高
文莱	0.5298	83	高	0.6923	59	高
越南	0.5143	89	高	0.5931	88	高
印度尼西亚	0.4478	116	中等	0.5258	107	高
老挝	0.3090	148	中等	0.3056	162	中等
柬埔寨	0.2593	158	中等	0.3753	145	中等
缅甸	0.2362	169	低	0.3328	157	中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6 UN E-Government Survey》及《2018 UN E-Government Survey》整理而得。

此外，东盟各国政府都提出了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至今已经经历了国家计算机计划、国家信息技术计划、信息技术 IT2000—智慧岛计划、信息通信 21 世纪计划、智能国 2015 计划、智慧国 2025 计划 6 个发展阶段；马来西亚制定了“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提出了到 2020 年，打造出亚洲信息走廊及 12 座“数字城市”的战略目标，并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互联互通。为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融合，东盟也陆续推出了《东盟电子商务协议》和《东盟数字融合框架》等合作战略。

三、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问题及挑战

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已经初显成效，并且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当前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及挑战，包括东盟各国及中方利益诉求协调问题，西方大国的干涉与掣肘问题，东盟内部政策制度和宗教文化的复杂性问题等。相对于各种外部因素，东盟地区数字经济本身发展水平不足是制约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

绸之路的关键因素。

（一）数字经济综合实力较弱且存在数字鸿沟

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其综合经济实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直接导致了巨大数字鸿沟的存在。阿里研究院与 KPMG 发布的《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测算了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数字经济实力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的数字经济综合实力居全球前两位，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为 0.837 和 0.718。东盟 10 国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平均为 0.3626。新加坡具有显著优势，位列全球第 9 名。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于东盟平均水平，位列全球第 32~67 名，在 150 个国家之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而文莱、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仅低于东盟平均水平，而且在全球也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

表 6 2018 年中美及东盟 10 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国家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全球排名
美国	0.837	1
中国	0.718	2
新加坡	0.609	9
马来西亚	0.459	32
泰国	0.411	46
印度尼西亚	0.391	54
菲律宾	0.376	63
越南	0.367	67
文莱	0.304	89
老挝	0.251	107
柬埔寨	0.247	113
缅甸	0.211	1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阿里研究院、KPMG：《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整理而得。

（二）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

改变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不健全、标准不统一、区域差距大的现状，是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性任务，也是中国与东盟开展高层次数字经济合作的必要支撑。当前，东盟信息技术的渗透程度、传输速度、上网资费还难以支撑电子商务等

数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Google 和 Temasek 的统计显示，数字支付在东盟互联网用户中的普及率不足 50%，在越南、菲律宾甚至不足 25%。交通仓储、物流业的自动化程度也比较低，降低了数字产业的智能化水平。新加坡是全球网速最快的国家，平均网速为 60.39 兆比特每秒（Mbps）。^① 新加坡 100 兆（M）的入门级带宽是缅甸、老挝、柬埔寨入门级带宽的 200 倍。并且，新加坡已经计划于 2020 年推出 5G 区域网，于 2021 年落实 5G 全国网络。此外，东盟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存在不兼容现象，技术标准的不一致以及人为设置的壁垒严重阻碍了信息和贸易的互联互通。

（三）数字科研能力薄弱

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力薄弱是制约东盟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瓶颈，也是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面临的最主要挑战。除新加坡外，中国与东盟其余 9 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数字产业消费端应用市场广阔，但生产端研发能力薄弱。例如，中国主要负责客户端产品研发的前端工程师数量相对充足，但芯片工程师与算法工程师相对稀缺。根据阿里研究院和 KPMG 测算的数字科研指数，数字科研水平全球前 50 名中包含 3 个东盟成员国。其中，新加坡数字科研指数为 0.134，排名第 18 位；马来西亚为 0.056，排名第 42 位；泰国为 0.047，排名第 46 位。中国数字科研指数为 0.686，排名第二；美国为 0.956，排名第一位，中美之间的数字科研能力差距依然显著。数字科研能力薄弱使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受制于他国的风险，成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关键制约。能否攻克关键数字技术关系着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层次及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 阿里研究院、KPMG：《迎接全球数字经济新浪潮——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8 年 9 月 18 日。
2. 阿里研究院：《建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9 年 4 月。
3. 财新数联：《数字经济的供给侧——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18 年度报告》，财新网，2018 年 5 月 27 日。
4. 丁波涛：《中国—东盟信息化合作现状与发展前景》，《东南亚纵横》2017 年第 4 期。
5.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①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 页。

2019 年版。

6. 黄黎洪：《中国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与数字化时代全球治理的变革研究》，《电子政务》2019 年第 10 期。
7. 佚名：《东盟数字经济发展障碍体现在四方面需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经济带网，2019 年 4 月 25 日。
8. 刘才涌、王彬：《东南亚地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发展、特征与原因》，《东南亚纵横》2010 年第 6 期。
9. 李霞、柯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策略研究》，《对外经贸实务》2019 年第 9 期。
10. 沈霄、王国华：《基于整体性政府视角的新加坡“智慧国”建设研究》，《情报杂志》2018 年第 11 期。
11. 向坤：《从数字经济视角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内涵、结构和发展路径》，《西部论坛》2017 年第 6 期。
12. 毛鹏飞：《中资企业为柬埔寨打造“数字基础设施”》，新华网，2019 年 3 月 17 日。
13. 逸秋：《推进网络共建让数字丝路越走越宽》，《人民邮电》2015 年 12 月 18 日。
14. 闫志君：《中国东盟共建数字经济“一带一路”核心区》，《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5 月 8 日。
15. 闫志君、翟崑：《中国东盟共建数字经济“一带一路”核心区》，搜狐网，2019 年 5 月 8 日。
1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东盟信息化发展与合作白皮书（2016 年）》，中国信通院网站，2016 年 9 月。
1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中国信通院网站，2019 年 10 月。
18. Google, Temasek, & Bain & Company. *e-Conomy SEA Report 2019*. <https://www.useit.com.cn/thread-24962-1-1.html>.
19. United Nations. *2016 UN E-Government Survey*. <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3069-1-1.html>.
20. United Nations. *2018 UN E-Government Survey*.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18-un-e-government-survey.html>.

责任编辑：李蕊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现状及态势

李蕊

摘要：“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数字出版业已经步入成长期，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走出去”步伐日益稳健，成为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呈现出政府加强产业引导及监管、数字技术支撑结构升级、生活方式改变催生新的需求、媒体融合发展迈向更深层次的态势。“十四五”时期，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还需完善产业扶持政策、构建数字版权保护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国际化进程、吸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数字出版 数字转型 融合发展 版权保护

作者简介：李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副主任。

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带动了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生活中，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经济结构、影响了生活方式。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内容产业欣欣向荣，数字出版已是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步入成长期，开启了升级换代之路。目前国内对数字出版尚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和界定，并且对其的认识随着技术和产业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着。21世纪初，谢新洲、徐丽芳等学者提出，数字出版是指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从编辑、制作到发行，所有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电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进行的一种出版形式。^①《2005—2006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将数

^①谢新洲：《数字出版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徐丽芳：《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7期。

字出版概括为，“用数字化（二进制）的技术手段从事的出版活动”，数字出版的核心是数字化技术手段。^①新闻出版总署 2010 年出台《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数字化”“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罗秉雪随后又提出，数字出版可定义为以“全媒体出版”为特点，数字技术为支撑，立足于内容层面的复合出版活动。^②

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支柱产业

2011—2018 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规模从 1377.88 亿元增长到 8330.78 亿元（见图 1），增长了 5 倍，年复合增长率达 29.3%。^③可以看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步入高速成长阶段，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3.7%；而进入“十三五”时期后，产业发展趋向成熟，2016—2018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20.7%，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符合《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的“数字出版总营收保持年均 17% 的增长速度”目标。

数字出版收入在新闻出版业收入中的占比，2011 年为 9.5%，次于印刷复制（63.9%）、出版物发行（14.9%），位居第三；^④2014 年数字出版收入占比为 17.0%，超过出版物发行，跃居第二，收入增速与增长贡献率（60.2%）均居首位；^⑤2018 年数字出版收入占比再次提升至 30.8%，^⑥对新闻出版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超过 2/3，是该行业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发展方向。

①郝振省：《2005—2006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罗秉雪：《数字出版：新语境下的概念演变与界定》，《出版发行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作者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1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2 年 7 月 12 日。

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5 年 7 月 15 日。

⑥作者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8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8—2019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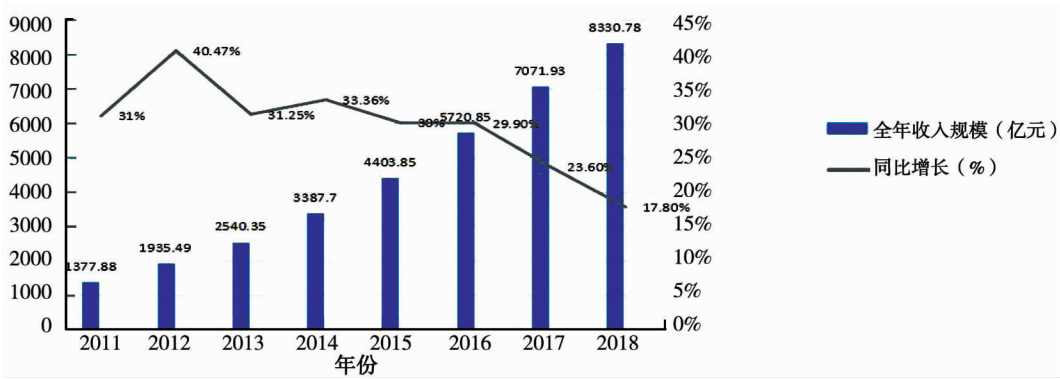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18 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二）新媒体飞速发展，传统书报刊数字化转型缓慢

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主要包含互联网期刊、电子书（含网络原创出版物）、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博客、在线音乐、网络动漫、移动出版（含手机彩铃、铃音、手机游戏等）、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互联网广告等九大产业类别（见表 1）。从产业结构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表 1 2011—2018 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九大类别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产业类别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互联网期刊	9.34	10.83	12.15	14.30	15.85	17.50	20.10	21.38
电子书（含网络原创出版物）	16.50 （电子图书+电子阅读器）	31.00	38.00	45.00	49.00	52.00	54.00	56.00
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	12.00	15.90	11.60	10.50	9.60	9.00	8.60	8.30
博客	24.00	40.00	15.00	33.20	11.80	45.00	77.13	115.30
在线音乐	3.80	18.20	43.60	52.40	55.00	61.00	85.00	103.50
网络动漫	3.50	10.36	22.00	38.00	44.20	155.00	178.90	180.80
移动出版（含手机彩铃、铃音、手机游戏等）	367.34	486.50	579.60	784.90	1055.90	1399.00	1796.30	2007.40
网络游戏	428.50	569.60	718.40	869.40	888.80	827.00	884.90	791.10
在线教育	—	—	—	—	180.00	251.00	1010.00	1330.00
互联网广告	512.90	753.10	1100.00	1540.00	2093.70	2902.00	2957.00	3717.0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注：2011—2014 年在线教育数据缺失。

1. 新媒体蓬勃发展

移动出版与互联网广告作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两大“巨头”，营业收入分别从 2011 年的 367.34 亿元、512.00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007.40 亿元、3717.00 亿元，分别增长了 4.5 倍、6.2 倍。2011—2016 年二者在全行业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2018 年略有波动，现已占全行业收入的近 70%（见图 2），是数字出版产业收入的“龙头”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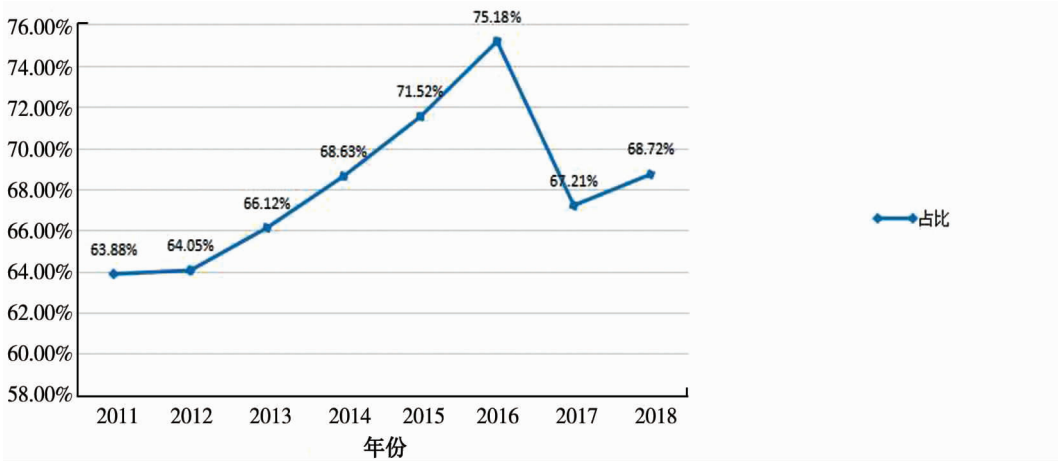


图 2 2011—2018 年移动出版与互联网广告收入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在线教育 2015 年首次纳入统计，营业收入为 180.00 亿元，在全行业收入占比居第四；2017 年收入出现爆发式增长达到 1010.00 亿元，超过网络游戏居第三；2018 年达 1330.00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7.4 倍，占全行业收入的 15.96%，成为数字出版的新增长极。在线教育作为数字教育出版最具成长性的板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资源趋向集中逐渐形成了在线教育集团。

网络游戏 2018 年营业收入 791.10 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 9.49%，也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类别相比增速较慢，从 2011 年到 2018 年仅增长了 84.62%，占比也被移动出版和在线教育超越，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

此外，网络动漫、在线音乐和博客同样保持快速发展态势。虽然 2018 年三者收入占全行业收入仅为 4.80%，比 2011 年增长 2.53 个百分点，但 2018 年三者收入比 2011 年分别增长 50.7、26.2、3.8 倍。尤其网络动漫和在线音乐是数字出版产业增速最快的两个类别，发展潜力巨大。

2. 传统书报刊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

互联网期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三项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从 2011 年的 2.75%下

降至 2018 年的 1.03%，传统书报刊数字化业务步履缓慢。书报刊是传统新闻出版的主营业务，近年来，传统出版机构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媒体融合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其他类别相比，增长缓慢且全行业占比持续下降。

其中，互联网期刊收入增长相对平稳，“十二五”时期以来，除 2018 年（6.37%）外，年增速均在 10% 以上；电子书收入增速则逐年下降，从 2013 年^①的 22.58% 大幅收窄至 2018 年的 3.70%；而数字报纸是九大类别中唯一一个收入下降的类别，2013 年增速从 2012 年的 32.50% 断崖式下跌至 -27.04%，之后一直处于负增长但降幅逐年收窄，2018 年同比下降 3.49%（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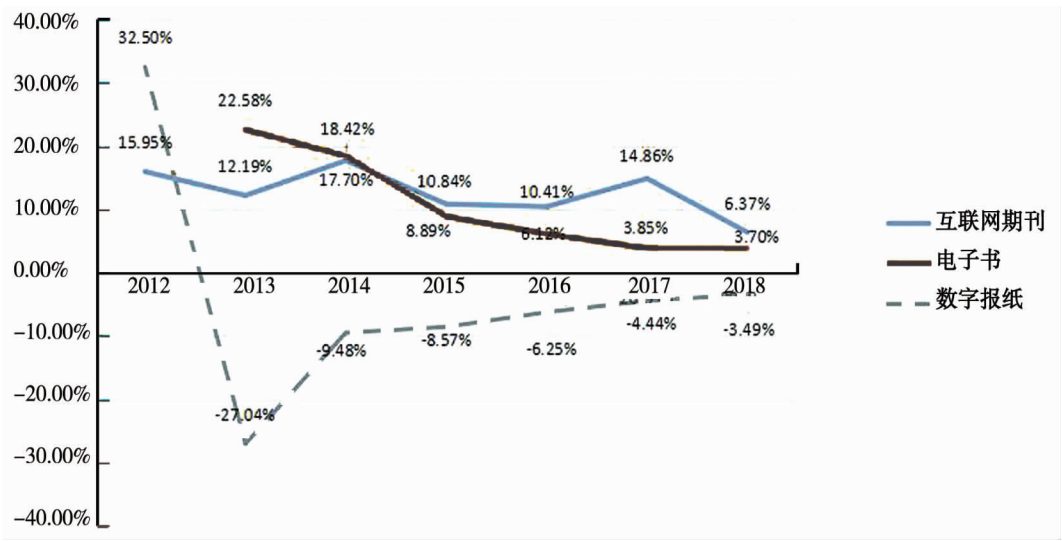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18 年互联网期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三）用户规模相对稳定，数字阅读平稳增长

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十二五”时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累积用户规模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增幅超过 70%。2015—2018 年，累积用户规模（包含了重复注册和历年尘封的用户）分别为 17.24 亿、16.73 亿、18.25 亿、17.32 亿人（家/个），保持在相对比较稳定的水平。

另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2011—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从 2.03 亿人增至 4.32 亿人（见图 4），年复合增长率为 11.39%，呈现

^①2012 年电子书收入数据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作者计算增速数据时未采用 2011 年数据。

平稳增长态势。^① 同时，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增长 3.2 个百分点。^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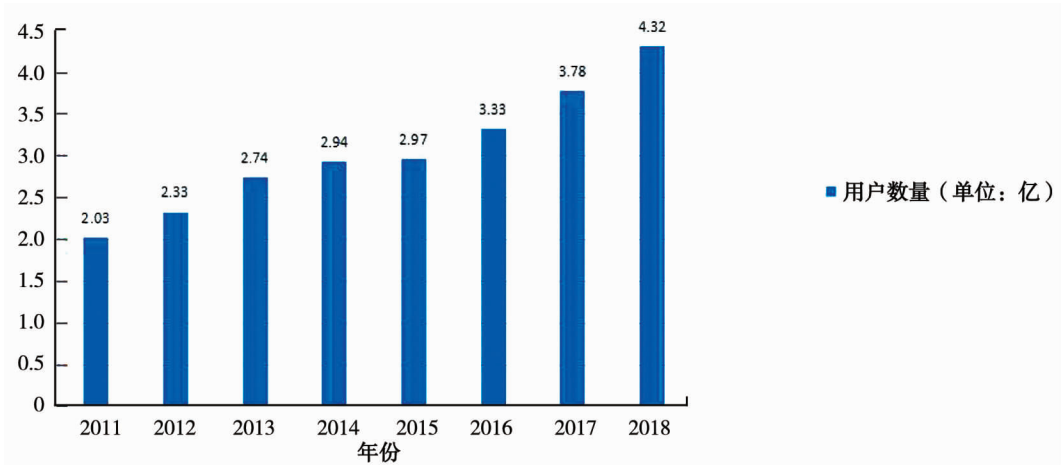


图 4 2011—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数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四）出口规模波动性增长，国际竞争力提升

2012—2018 年，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5），由 26.15 万盒（张）降至 5.30 万盒（张）；出口金额则整体呈现增长趋势，^③ 由 2191.50 万美元波动性增长至 2897.90 万美元，且增速波动幅度较大。同时，出口数量在全国出版业出口总量中占比呈下降趋势，由 1.25% 降至 0.31%；出口金额在出口总金额中占比呈上升趋势，由 23.13% 提升至 28.71%（见图 6）。可见，数字出版“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且正朝着精品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随着数字出版“走出去”步伐加快，其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例如，中图公司搭建“易阅通”平台，实施“海外中国电子书店”项目，走进了美国 GooglePlay、西班牙 24Symbols、德国 Tolino 等平台；中文在线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①佚名：《2017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市场规模达 152 亿，用户接近 4 亿》，https://www.sohu.com/a/228207725_99957183；王坤宁、李婧璇：《〈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51837>。

②刘彬：《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6.2% 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http://culture.gmw.cn/2019-04/18/content_32755352.htm。

③2016 年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金额及占比均达峰值，其中，数字出版物出口 3055.3 万美元，增长 29.1%，占此类别出口金额的 94.72%。可见此类别出口以数字出版为主，基本可反映数字出版物出口的整体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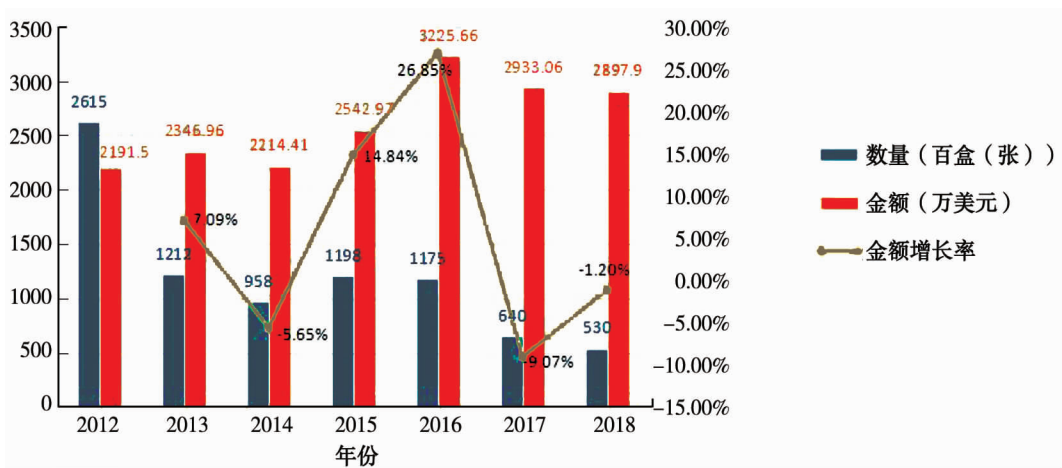


图5 2012—2018年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数量、金额、金额增长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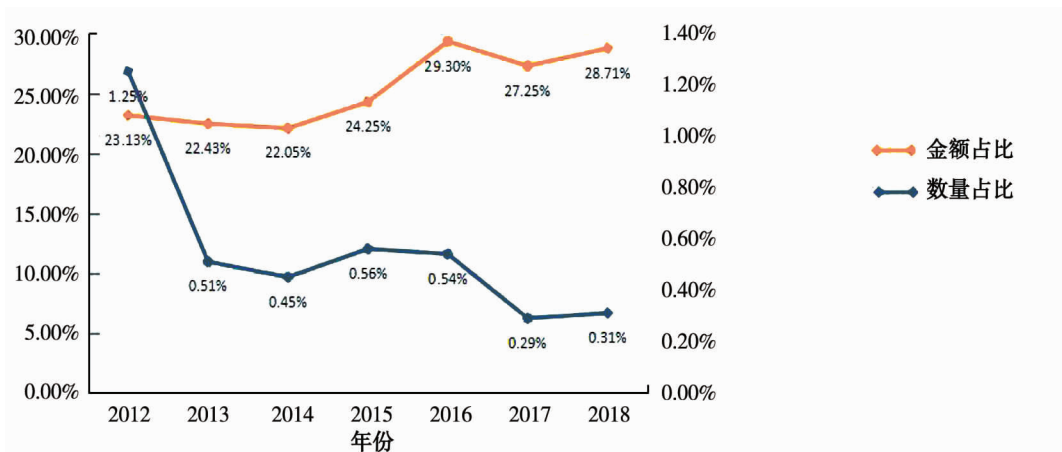


图6 2012—2018年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金额占比与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年度《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共同推出“引得”数字人文资源平台，为国际专业学术研究与文化知识普及提供技术支持；阅文集团2019年上线起点国际，覆盖英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泰语等十余种语言，面向海外用户提供文学阅读服务，2019年底访问量已超过5000万人次；据艾瑞咨询（iResearch）调研，我国网络文学传播范围覆盖40多个国家，上线十几种语种版本，海外读者每年新增28.4%，网络文学出海潜在规模预计达300亿元以上，市场潜力巨大。

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态势

（一）政府加强产业引导及监管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出台了许多支持和引导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数字出版纳入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新兴文化产业；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已成为中国实现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任务。2013 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设立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内设数字出版司，产业管理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分别于 2014 年 4 月和 2015 年 4 月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步入实质性建设阶段。2014 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先后推出了《关于加强数字出版内容投送平台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行业政策文件，加强引导与管理。2016 年，数字出版作为现代文化产业首次列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将政策支持重点转向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数字技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出版是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传播技术等技术的基础上，融合传统出版内容而进行的。一是改变了传统出版内容，由文字、图片等拓展为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互相融合的多元形态，出版载体也随之数字化。二是改变了传统发行模式，数字介质存储的“虚拟化”将经营模式由“先复制后发行”改变为“先销售后复制”。同时，在加强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和第五代移动通信（5G）商用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入应用，将持续拓展数字出版产业的新模式、新载体、新渠道，对出版业选题策划、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都产生深远影响。

（三）生活方式改变催生新的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持续创新，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这也不断催生出新的需求。数字化内容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过移动终端获取数字化内容的便捷高效，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阅读习惯和学习方式。利用移动终端阅读电子书、聆听有声书、学习知识付费内容、获取教辅材料的配套音频和视频讲解，对大众来说已不新鲜。特别是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对大众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期间，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当当云阅读、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几十家数字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社和资源提供商推出限时免费专题栏目，知网、得到App、喜马拉雅、学而思网校、作业帮、凯叔讲故事等各个知识付费、在线教育平台更是发挥线上教育培训的优势，助力“停课不停学”。这些数字化出版内容通过各类阅读和知识服务平台，以免费形式向公共提供，得到良好反馈，甚至创造了更多的消费需求。

（四）媒体融合发展迈向更深层次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① 经过长期的磨合与探索，报刊书、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兴媒体不断融合，无论是“策、采、编、发”的生产流程，还是“报、刊、网、端、微、屏”的分发过程，跨界融合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入，涌现出更多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培育出更多新的增长点。出版机构在内容、产品、品牌、模式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部分出版机构已实现内容多元开发，形成了全媒体融合产品。同时，出版机构的服务能力也进一步提升，顺应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满足数字出版用户在内容获取上多元化、细分化、多场景化的需求。

三、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建议

虽然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在不断发展，已建成完善的从数字内容供应商到运营商、到客户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但仍存在产业扶持政策有待完善、数字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健全、传统书报刊数字化转型缓慢、国际竞争优势不明显、数字出版专门人才及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①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网，2019年3月16日。

（一）完善产业扶持政策

首先，从顶层设计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布局，加大财税、金融等方面的产业扶持力度。“十四五”时期应将数字出版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重点支持数字化转型和媒体深度融合，加强配套保障措施，符合条件的数字出版企业可参照高新技术企业标准享受优惠政策。其次，完善相关行业标准并加强行业管理。我国数字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些团体标准，但仍需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行业标准，创建多方参与的内容监管平台，加强行业自律，规范数字出版市场秩序。再次，构建科学完善的数字出版统计指标体系。应进一步明确数字出版的定义与范畴，健全数字出版行业细分类别，发布更详细的相关产业数据。

（二）构建数字版权保护体系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条例，国家版权局、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启动了“剑网”专项行动，对网络转载、短视频等领域的盗版侵权问题予以重拳整治。但我国的数字版权法律体系尚不成熟，应出台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将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信息领域技术加入数字版权保护中，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的数字版权保护司法环境。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引导大众尊重知识产权，增强数字版权保护意识。

（三）推动传统书报刊数字化转型升级

《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充分考虑书报刊和音像电子出版企业之间、新兴媒体企业与传统新闻出版企业之间的现实差异，分类推进，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和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但传统书报刊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对较慢，收益增速远低于网络广告、移动出版、网络游戏。应鼓励传统出版机构与数字技术企业加强合作，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媒体融合发展，拓展新业务、研发新产品、采取新模式、提供新服务，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增强传统书报刊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加速数字出版国际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国家数字出版传播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新闻出版业重大工程为数字出版“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加速我国数字出版国际化进程，一要进一步细分海外市场，满足差异化阅读需求。应了解海外数字出版的市

场规则，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政策、文化背景细分输出内容与输出策略，集中优势提升我国数字出版的国际影响力。二要重视产业链建设。积极拓展海外受众喜爱的数字出版作品类别的周边业务，实现游戏、图书、音像等类目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三要丰富产品传播渠道。采取建立或借助国际网络平台、与国外出版商及运营商合作、参加国际书展等多种方式，努力进入国际主流渠道。四要加强版权输出。我国版权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需精选优质作品、建设专业化国际人才队伍、提高版权代理机构服务水平，增加版权输出的数量和种类。

（五）着力培养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

相较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产业更需要熟悉数字技术及出版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传统出版人才是按照传统的编印发职责分工，缺乏数字技术训练，无法很好地应对跨界竞争。目前，全国只有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四川传媒学院等十几所高校设置了数字出版专业，不能满足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应鼓励高校增加数字出版专业设置，加大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同时，吸引各类人才加入数字出版产业，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引进、评价、考核、激励机制；通过产学研合作与交流，企业、行业定期培训，充分利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优化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着力培养专业化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网，2010年8月16日。
2. 新闻出版总署：《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国出版》2011年9月上。
3.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6年6月29日。
4.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网，2019年3月16日。
5. 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艾瑞网，2019年6月21日。

责任编辑：谷 岳

· 名人观察 ·

扩大有效投资是对冲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及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韩永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尽管当前疫情防控已经明显见到成效，但是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还在继续。为了尽快摆脱疫情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困扰，避免经济发展滑向短期衰退、影响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党中央在分析评估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加快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创造条件”的决策部署。各地在继续严控疫情蔓延扩散、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结合编制“十四五”规划积极谋划有效恢复和稳定经济发展的计划与措施。扩大有效投资需求，加大投资安排力度是一项重要举措。据相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近期全国已有 25 个省、区、市发布了 202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说明各地正在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力图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一、有效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有时因投资决策失当导致经济过热、环境破坏和资源配置浪费，但其对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性作用毋庸置疑。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40 年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

根据统计资料，1982 至 2016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0.9%，其中

1991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21.8%，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6.087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6%。按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到45%左右。2015年以后这一比重出现下降，但仍然在43%左右。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然，长期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结构失调、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终会偏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客观上更加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和全面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近几年，中央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优化经济增长结构，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消费结构，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回升。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在不断地向最终消费率和服务业发展比重提升的方向发展。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到57.8%。

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渐进的。由于最终消费率提高是个渐进的过程，再加上最终消费比重大幅度提升受到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增长预期以及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当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稳定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三驾马车”协调发力。近几年由于投资需求不足，特别是产业投资意愿不强，致使投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也进一步影响了居民就业、收入及消费预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初步推算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与前些年相比明显偏低。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文化、旅游、餐饮、交通运输和商品、服务等消费市场，由于复工复产延时以及疫情防控，制造业发展也受到巨大冲击。使生产经营活动全面、协调地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有不少不确定性因素。还要看到，尽管我国的疫情控制态势积极向好，但国际上的疫情蔓延态势却日趋紧张，这将使本来就显疲态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市场更加不景气。在此形势下，如若不能使经济秩序尽快恢复正常，创造市场需求，创造就业岗位，拉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快速恢复，2020年的经济局面会更加困难，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会更大，国家财政状况也会更加困难。既会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和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实现，也会影响“十四五”顺利开局。短期来看，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投资增长以拉动经济恢复增长是必要的。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相比消费拉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更直接、更明显、更迅速，它不仅可以直接拉动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还因相当部分的投资直接转化为消费资金而拉动消费市场。

二、坚持优化投资结构，努力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扩大有效投资需求必须坚持以优化投资结构为前提，立足于为更长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战略支撑，立足于推动眼下发展面临的短板供给和长远发展需要，并能较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建设。应该看到，相对于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言，因为季节气候等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较小，目前正是加紧启动、推进项目建设的有利时机。应该因势利导，贯彻新发展理念，选准投资方向，鼓励、引导、扶持、推动有社会需求潜力、有市场发展前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项目加快实施建设。

2003 年非典疫情过后的那一轮投资热潮，曾经造成经济过热、市场秩序混乱、通货膨胀高企，埋下钢铁、水泥等一些基础产业产能过剩、资源配置严重浪费的后患，应该深刻汲取这一教训，切忌再出现不科学的行政导向、盲目地拍脑瓜决策、一拥而上、乱上项目、过度重复建设的情况。

扩大有效投资需求必须继续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杜绝盲目投资、乱上建设项目的问题。最近，新浪财经等媒体搜集、汇总了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发布的项目建设投资总规模以及 2020 年的投资计划和建设领域。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各地政府安排投资建设计划以及社会投资在理念上有了巨大进步。媒体汇集起来的信息和数据反映，各地的投资计划主要包扩了以下几个领域：一是科技产业暗战、创新载体、高精尖产业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建设；二是 5G 应用与信息传输、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现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公共卫生、医疗设施、社会公共管理项目建设、民生工程建设；五是生态与环境保护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这些投资方向基本上属于补短板、强弱项、打基础和提升增长动能的建设领域，是可以加快推进建设的。

将投资计划转化为建设实践需要按照一定的投资程序进行立项、可研、施工准备和开工建设等工作。希望这些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提振市场发展信心，又能够为今后更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建设项目尽快启动，尽快开工建设，尽快形成有效的工作量。需要强调的是，在加快推进投资计划实施的时候，各方面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应该牢固树立区域协调发展和统筹协调的发展理念，减少自我封闭式发展布局和重复建设。中央投资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统筹协调，加强对地方发展规划、投资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指导，引导各地顺从、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引导形成区域间生产力合

理布局和产业分工，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分析各地的投资计划信息，感觉有些不足的是比较重视新建（包括在建）等基本建设投资，而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重视不够。诚然，技术改造投资更多是企业自己的事，但它却具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既有产业基础作用的社会性。近些年，工业投资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工业投资合理增长的短板。随着现代工业不断发展进步，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加速设备更新换代既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也是提高传统制造业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我国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与宏观需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要求各级政府在重视基本建设和新基建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问题，鼓励、引导、支持市场主体将更多的投资用到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

三、组合政策措施，有效提供建设资金供给

筹措好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是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尽早落地、有效推进的基础，需要科学筹划、组合投资来源。各地披露出来的投资计划是项目建设的投资总规模，即从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可研、立项、施工直至建成投入运营全过程的投资总额。许多项目并不是一年可以建成，发生在今年的投资额仅是项目投资总规模的一部分。但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则需要在一揽子计划下分年进行，做好统筹平衡十分重要。

筹措建设资金，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项目属性区分投资主体，分类筹措、多元化筹集。要分清哪些项目是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哪些项目可以通过政府部分投资支持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建设；哪些项目应该由市场主体自主投资建设；哪些项目可以让市场建设，政府实行购买服务或在后期分步赎回等等。这样既可以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拓宽投资渠道，避免政府过多地做市场主体的事情；又可以减轻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的压力，增加建设资金供给。目前，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应该借助对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扩大有效投资的机会，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进一步理清各级政府的投资职能，大力调整政府投资结构，改革政府投资使用分配机制，集中政府资金加大应由政府出资建设项目的投资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并强调“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下转第 110 页）

把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 企业减负相关配套安排

贾 康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讨论如何降低企业负担问题、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何改革又成为热点之一。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这一改革确应积极考虑，正确思路是将其纳入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给出的战略性指导、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配套改革。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率先启动，若干地区跟进试点后，1994 年开始全面推行。以后在制度上又有修补和细化，基本规则是由职工个人及所在单位按职工工资的 5%~12% 共同缴纳公积金，形成日后支付职工家庭购买（或自建）住房的资金来源（带有一部分强制储蓄性质），并在支付时可酌情匹配利率优惠的公积金购房贷款。应当肯定，这一制度对于提高缴存人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深化进程而暴露的该制度的问题，实也不容回避。这一制度的问题如中金公司张宇、梁红等人的研究报告所总结的，主要是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平性不足。公积金制度本应发挥重点支持中低收入职工住房支付能力、控抑乃至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实际其覆盖人群明显有偏且形成结构错配，不仅未能很好实现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支持作用，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其运行 20 余年至今，公积金实缴单位为 292 万个，实缴职工 1.44 亿人，仅占同期城镇职工总数的 33%，也大幅低于社保养老缴费职工数（约 3 亿人）。实缴职工中，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数占比高达 51%，为 7344 万人，而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职工占比为 31%，仅 4464 万人。职工收入越高的单位，公积金的缴存额和缴存比例往往越高，这首先加速了初次分配的不均衡。而高收入职工通过购房行为（不论是直接使用公积金贷款提取公积金，还是因种种原因放弃使用公积金贷款而仅提取公积金），进一步扩大了资产端的贫富差距及消费端的支付能力，在实际运行中对中低收入人群支持明显不足，

因为他们迟迟达不到购房临界点，所交纳形成的储蓄主要体现为强制性，缺乏自愿性、灵活性，所以住房公积金导致的对部分收入群体存在的误伤与误惠，也被称之为实际上有“劫贫济富”的逆调节特点。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低收入群体，有没有公积金制度都不能改变无购房支付能力的客观事实。虽然制度允许因租房等其他非购房原因申请提取公积金，但实际操作中并非易事。这类人群缴交公积金既成为其即期负担，更恶化了短期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群体，公积金于购房支付行为而言变成了一种锦上添花或可有可无的存在。有房贷的高收入职工，鉴于可以便捷地提取公积金，他们愿意多缴，因为公积金实为一种免税福利。而对于那些没有房贷的，退休前难以合法提取公积金，同样作为免税福利来缴交虽然不一定是负担，但也未必情愿。只有具备一定住房支付能力但又不是很强的中等收入群体（或言“夹心层”），是政策意愿覆盖下无偏差的主要受益人群，也可能是仍旧支持公积金制度的主要人群。然而如对这部分群体提供购房金融支持是以牺牲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群体间的公平来完成，是十分值得商榷的，无法作出充分肯定。

第二，效率性欠佳。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初衷是通过长期、稳定的住房储金的建立与积累，发挥资金互助功能，支持职工家庭住房消费。然而实际运行中不仅作用有限，还存在使用效率总体偏低、边际效率递减等问题。数据显示，缴费比例高而使用效率低，当前参与公积金体系的职工和单位平均实缴比率均已大幅超出 5% 的最低缴费率，达到了 10%（个人和单位加总高至 20%）。截至 2018 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额 8.8 万亿元，使用比例仅 60%，仍有 5.8 万亿元余额在职工个人账户上，比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5 万亿元）还多，而且仍在持续增长中。导致使用率低的原因包括：一是提取条件苛刻。公积金条例要求每月缴交金额存入受规管的个人账户，除用于购房、建房、租房等用途之外，不得提取使用。实际操作中除购房外，以建房、租房用途提取公积金难度很大（还由此催生了违规提取公积金的地下产业）。2018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人数 5196 万人，仅占实缴职工人数的 36%。低收入缴费人群因住房支付能力差，往往用不上公积金贷款；高收入群体则因公积金可贷款上限额度过低（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手续繁琐而大多放弃使用公积金贷款，倚赖于商业银行贷款。二是各地公积金贷款上限设置脱离房价事实。住房公积金基本上为各地封闭运行。出于存贷取资金匹配筹划的考虑，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个人公积金首套房贷款上限目前为 30 万元至 60 万元，家庭双职工公积金贷款总额为个人上限的 1.5 至 2 倍。北京目前 120 万元的上限为全国最高，是普通城市家庭贷款额的约 2 倍。然而，中心城市早已形成的高房价使得公积金的使用目的和支持效果大相径庭。大城市房价收入比高、住房支付能力差的人，需要但却得不到公积金的有效支持

(可得贷款只占总房价的很小部分)。相反，小城市即使没有公积金也几乎照样不影响住房支付能力。其结果就是有些城市公积金资金池告急，同时又存在不少城市钱用不完的结构性的偏差情况。三是贷款总规模小。近几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额每年基本维持在 1 万亿元左右，而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发放额已达约 6 万亿元，二者规模差距不断拉大，公积金贷款已愈发似锦上添花而不能很好体现雪中送炭。四是边际效率递减。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增速明显低于平均缴存额，贷款缴存比随着人群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降低，使用效率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第三，外部性负效应明显。现行公积金系统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形成一定的负面外部性影响。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封闭运行模式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通。我国城市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大多是地方性的，职工流动中出现异地购房时难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即使少数允许公积金异地贷款的城市，其贷款实际落地速度和便捷程度都远远不足以适应现实需要。这种各地独立封闭运行的模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客观要求的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增加了成本与阻碍。二是公积金支付能力问题。中小微企业（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支付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后者的高支付能力现阶段尚不能排除不合理垄断因素和“软预算约束”特点），相应形成的“免税福利”水平和“物质利益吸引力”，客观上表现为统一市场中上述两大不同类型企业的高低悬殊和造成对于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销蚀。

第四，资金有安全风险。一是住房公积金归集依靠缴存人按月缴存而实现，属于分散性的小额资金流入。而无论是住房公积金提取或是住房贷款，均属于集中性大额的资金流出。存贷取不对称的制度缺陷，使得公积金体系在资金头寸管理方面的风险明显高于一般银行体系。二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存贷业务一次性地委托给由管委会指定的商业银行，银行收取手续费，资金使用受益和风险都由公积金中心承担。这样，委托方和收益方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这种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发放与回收相脱节的模式，存在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受两方各自利益驱使，在资金运作中会有差异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加大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风险。公积金体系一旦出现风险，也可能传导至商业银行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三是监管机构独立性不足且机制不健全。公积金管委会是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并负有监督职责。但公积金管委会并非独立机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决策风险可能出现违规决策。部、省两级建设、财政、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多部门虽负有监管职责，但在公积金领域缺乏快速、充分、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难以形成充分的监管合力。

对住房公积金的上述问题和弊端，显然亟需正视、重视并防止它们进一步“积重难

返”。当下积极考虑推进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是有鲜明现实意义和十分必要的。尽管在黄奇帆等同志结合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减负而提出取消住房公积金的建议后，社会上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我们需认识到反对者或存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背景，或有对于公积金制度实际效应的误解。按照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来全面看待住房公积金制度，那么亟应理性地认真考虑如下相关联的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是否应落在以对其“取消”为目标？如取消，需以何种机制替代其仍应肯定的那一部分“帮助购房者提升支付能力”的功能？二是如有可行方案以其他机制来实现必要的功能替代情况下，取消住房公积金的实施步骤，可怎样进行合理设计？三是在“全面改革”总体要求下，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应怎样纳入改革深水区多轮推进的“最小一揽子”式的配套改革措施？对这三个层次的问题，笔者的认识和建议简述如下。

基本观点：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按其“取消”来设计。因为替代其肯定性功能的机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初步具备，并可进一步塑造与完善、充实。具体的改革实施步骤完全可以设计为渐进和不产生社会震动的方案。这一改革的基本特征应是按照新形势下服务于在中国的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

相关建议：第一，取消住房公积金所需的替代机制是近些年已相对成熟、规模上早已成为主导性资金力量的商业性住房消费信贷（居民住房按揭贷款），以及有一定经验、应进一步合理化匹配的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乘数、放大效应的政策性贴息与信用担保机制。于我国全局性的住房供给框架即“保障房+商品房”双轨统筹局面中，还可积极创新发展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为代表的资产证券化住房金融市场，盘活存量，助力增量，打通供需双方的投融资渠道，借鉴国际经验配之以适当的税收优惠助其发展成长。第二，取消住房公积金的具体实施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分步降低公积金缴费率至其为零，即一步或分步取消公积金的增量；还可以对存量余额让职工选择缴税后全额提取销户（可配之以个人所得税优惠措施），或全额免税并入个人社保账户。第三，取消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所应考虑的方案，亟应与“五险一金”的其他改革措施以及企业年金、职工年金等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的制度建设相呼应（配之以职工个人所得税递延等经济杠杆式引导和优惠措施）。如考虑保留培育社会成员住房支付能力方面的“自愿储蓄”机制，可研究将现行公积金中心转制为专业化住房储蓄银行的方案。特别是应积极配套推出把基本养老金缴纳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障资金“蓄水池”，提升为已提出多年却一直未实施的“全社会统筹的一个蓄水池”的境界，从而可望在提升“蓄水池”互济、共济功能的同时，依据精算而确定基本养老缴费率的降低幅度。从理论上讲，

取消住房公积金的降负（5%~12%以上的工资总额）加上基本养老降低缴费率（N%的工资总额）的降负，在企业层面的表现将是（N+5）%~（N+12）%以上。同时这种配套改革对于劳动力无壁垒流动的统一市场建设、企业真正公平竞争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环境建设，以及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创新的贡献，将功莫大焉。

2020 年疫情于二季度出现全国决定性拐点，我们现在就应加紧研究和尽快出台“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可行方案与具体操作措施，紧密结合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来切实地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负担，争取在“抗疫”之年及其后，使我国国民经济有更好的表现。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上接第 105 页）

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抑或在更长的一些时间里，应该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的实施力度，组合运用好减税降费、调整国债投向等政策措施，支持有效投资需求。为此，可以考虑 2020 年再适度增加一部分国债发行规模，主要是增加发行专项建设债券，加快国债发行，提高发行效率。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灵活运用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对有效投资的信贷供给，分步骤地降低贷款利息。可以考虑运用适度的贴息政策，将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转化为对银行发放投资贷款的贴息；通过一定的减免税政策，加速企业计提设备折旧，支持装备制造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等等。

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是为了更好地对冲疫情影响，迅速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并为今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战略基础。投资必须是有效率的、有拉动社会投资带动作用的、有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弹性的、能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后劲和新动能的。同时也要坚决抑制可能出现的不顾客观实际和远超未来财力能力搞建设、不计后果过度举债搞建设的行为。要坚持在保持杠杆率基本可控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杠杆结构债务投向，有度有效地筹集地方建设资金。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关于新冠疫情的四点思考

高尚全

2019年年尾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目前已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剧烈冲击，并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全球的经济危机。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和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当前经济工作。这次疫情的爆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此，笔者提出了关于新冠疫情的四点思考。

一、与时俱进创新开会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5G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疫情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疫情期间，大多数人基本能做到两个月不出门，发达的网络科技功不可没。网上购物从普通的日用品向米面粮油肉菜等居家必需品扩张，居家办公、线上教育等大规模落地。这样的生活场景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疫情让它加速落地，且驱使全民参与。中间虽然还存在磨合问题，但它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质上，网络科技已经完全能够支撑新的生活方式，只是较快的转变使一些还不适应网络的人士不太习惯。网络科技帮我们解除了地域、年龄、阶层的藩篱，充分利用网络科技，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更充分的市场均衡。

第二，疫情期间传统见面开会的观念已改变。在减少、避免病毒传播的同时，无论是日常工作交流，还是项目商务谈判，视频会议效果一样好且大大节约成本。为了参加一场会议，四面八方人员赶赴会场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全都节约下来。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电脑与手机功能逐步强大，很多非必须的工作会面、商业会晤必定会被视频交流代替，节约的各种成本将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和资源。中央指出，政府要过紧日子，转

变开会方式将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线下资费甚重的会议转为便捷的线上会议，在完全达到会议目标的同时，能够大量地减少会议费用。国际上二十国集团（G20）大会、东盟和中日韩视频会议，国内总书记发表讲话的万人大会等都是典型例证。不久前，基于疫情防控尚无准确日期的原因，笔者建议全国两会可以改变开会方式，从线下会议转到线上召开，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

二、信息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要素，自由流动才能创造社会价值

中央 2020 年 4 月 9 日，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之一。例如疫情期间，武汉医院缺乏防护用品的信息传播之后，各地民众乃至海外华人华侨都纷纷捐赠，大大缓解了医护用品的短缺。而武汉红十字会没有掌握、利用好哪些医院短缺医护用品的信息，工作上就出现很多纰漏。再比如，在线医疗服务平台组织全国各地的医生和专家开展在线问诊、在线会诊、心理咨询等远程服务，大大减轻实体医院压力的同时，加速推动了远程医疗的应用进程。这背后少不了信息要素的鼎力支持。

在互联网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必须把信息要素像其他要素资源一样，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对信息要素的流动进行限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只有保证信息资源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才能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发挥更大的市场价值。因此，要特别重视信息要素资源。2014 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2019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个数据要素就是信息要素。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社会数据采集规范化和标准化、数据管理和安全等。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信息要素在规范的基础上能够自由地流动。信息数据只有自由流动起来，才能创造社会价值。

三、建立合理集中、有序分散的决策机制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这个用和谋的过程中，决策是事关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现代社会，决策讲究信息透明和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特别是有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决策，更应当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能够做到积极有序参与决策。中央在指挥抗疫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月27日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人民群众是防控疫情的主体，也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就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这场战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信任群众，让群众认识到这场战役的紧迫性、重要性和严峻性，从而提高重视程度，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战役中去。

建立合理集中、有序分散的决策机制，就是要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效地结合起来，就是要有效地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片面理解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却不小。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总体上要求分散决策，但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如此，政府不但难以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尊重市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要在重要的关口战胜各种挑战，就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保障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的供给和需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之下，各国的总需求都受到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封城、社会隔离等措施使得居民消费大幅下滑，这也导致企业对上游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下降。全球疫情蔓延情况下，供给也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隔离等措施导致劳动力短缺，各行各业生产停滞和无法复工导致各国供应链中断。结合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疫情可能带来产业链条的崩断对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威胁。2020年4月9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罗德声称“不惜血本也要把美国在华企业迁至本土”。日本从其“改

革供应链”计划中拿出 235 亿美元分别资助在华日企迁回本土或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些靠当局官员的号召是违反市场规律和资本流动本性的，是不会成功的。在中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埃隆·马斯克把新能源电动汽车制造厂落户到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道理很简单，因为企业家是根据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权益的分析之后做出决策的。

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来保障供应链的稳定：

第一，充分挖掘、利用好国内市场。中国有 4 亿中产群体的巨大市场，同时广袤的农村市场如果得到有效开放和发展，那就将是具有 8 亿消费能力和意愿的超级巨大市场，美、日企业贸然撤资就意味着抛弃了这么有潜力的市场。相信一时的冲动必将服从与市场的理性。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并将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充满信心，欧美、日韩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继续看中这个发展迅速的市场。持续办好中国进口博览会，将给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建立标杆作用，最终会使出去的企业再回来。

第二，打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落地看重的除了市场之外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外资，在于稳定的政治社会生态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要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政府服务、保障国民待遇等方面的加强，打造全球最佳的营商环境，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环境，这都将对外资具有更大吸引力。

第三，打造开放、稳定、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和这次疫情的困扰，暴露出中国整体的复工复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也暴露出中国生产、供应、服务没有能够做到稳中有进、稳中有为，这对国民经济今后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既要面向世界开放，在各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欢迎外资，又要有足够的能力避免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要素的安全，更能做到生产本身的安全。即使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有关键设备、元器件的断供，也能保持我们的安全供应。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李 蕊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 变局、挑战与应对

——中改院专家网络座谈会观点综述

胡 雷 陈 薇 匡贤明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2020年3月1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专家网络座谈会。座谈会就“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选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充分估计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

疫情重创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和冲击越大，有可能导致某些产业供应链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疫情的冲击，第一波影响是导致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的中国停工停产，供应链断裂，进而导致生产运行危机和消费拉动危机；第二波是更多的国家出现疫情，短期影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市场恐慌加剧、金融风险增大，中长期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李钢指出，2008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已经在缩短，区域价值链呈现增强趋势，疫情进一步加大了这一趋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疫情全球扩散直接冲击了东亚、欧洲、北美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迟福林认为，由于人流受到限制，疫情对旅游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冲击相当严重；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生产停工，对汽车制造、电子电气、医药等行业的整体需求和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疫情对产业的冲击有可能呈现“波浪状”，一波接一波。疫情第一波冲击日韩的高技术产业，第二波冲击伊朗及中东地区等能源产业，第三波冲击可能是欧美服务业。如果美国

金融出现危机，将对全球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

疫情很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贾庆国指出，疫情不仅导致大量经济活动骤停，而且疫情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恐慌。未来一段时间内，多数国家经济继续下滑，世界经济步入衰退的可能性很大。李钢认为，对 2020 年全年来说，全球经济陷入持续性衰退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合组织（OECD）的《中期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 2.4%，若疫情在亚太、欧洲、北美地区广泛传播，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仅为 1.5%。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认为，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从 2018 年 3.6% 降到 2.9%。2020 年全球增速大概率会跌破 2.5%，这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分水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疫情中美国经济呈现“四跌四升”特征：经济增长下跌、股市债券大幅度下跌、石油黄金白银比特币价格同步下跌、美国信用大跌；疫情风险急剧上升、债务风险上升、供应链风险急剧上升以及全球脱钩风险上升。

疫情蔓延加大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指出，这次疫情百年未遇，并且呈现许多新特点。从经济层面看，有可能导致以短缺型危机为特点的世界危机新形态。即经济停摆导致产业链断裂，生产无法继续，从而出现严重供给短缺。加之经济活动停滞导致收入下降，使强需求抑制和强供给抑制并存。曹远征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远比想象的大。除了美国股市外，固定收益市场、大宗原材料市场、贵金属市场、外汇市场全部同向下跌。很可能出现全球金融系统崩溃，这个风险不能不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张明指出，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一是发达国家的股市调整尚未结束；二是全球经济可能在 2020 年上半年陷入衰退；三是金融市场上南欧国家国债、新兴经济体两个潜在风险点可能在未来爆发；四是疫情过后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五是各国政府会进一步放松国内宏观政策。总的看，疫情冲击下应对金融市场动荡的宏观政策挑战远大于 2008 年。迟福林认为，如果疫情继续一段时间，如果世界主要大国应对措施不力，如果全球性协调行动迟缓，短期内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就有可能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

二、充分估计疫情冲击对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冲击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张蕴岭指出，这次疫情扩散，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第一，很多国家的政策会转向强调内向性、内向发展、自主发展和有保障的发展等。第二，企业全球化战略开始调整。例如，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向国内退缩、缩小环节链距等。第三，疫情加快全球化结构调整，而且调整的广度和深度非常大。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认为，这次疫情将对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认识以及国际秩序重新洗牌产生巨大影响。更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紧密相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孤岛。曹远征认为，疫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逻辑。疫情与经济全球化冲突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需要互联互通，但是应对疫情又需要隔断，这给各国决策造成很大困难。张燕生认为，疫情加剧去全球化、去国际工序分工、去人际交流的冲击，可能会带来逆全球化进程，促使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李钢指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不仅对贸易、生产、投资、服务的一体化带来很大冲击，而且有可能冲击这些一体化背后的规则一体化。迟福林认为，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将导致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在合同履约、执行、融资、雇员返岗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项目将拖延甚至停滞和取消。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认为，在国际合作议程方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南海行为准则”等双多边经济及安全合作机制，会因疫情影响而出现变数。

疫情蔓延严重影响双边、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迟福林指出，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疫情暴发国无暇顾他，也使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安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中美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都有可能面临新的变数。

疫情冲击使大国经贸关系更加复杂。张燕生认为，疫情加速了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最坏场景发生的可能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要高度重视疫情对全球三大生产网络的重创，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可能出现的冲击。陈文玲指出，在处理大国经贸关系上，中国有三个“不希望”：不希望美国经济出问题；不希望美国的疫情防不住；不希望疫情之后中美贸易战升级，科技战、金融战继续打。吴士存认为，这次疫情是继“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三次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对全球经济、世界格局等的影响尚难预料。疫情对短期内中国国际形象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应有清醒估计，外宣理念和路径也要思考和适当改进。

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曹远征指出，全球联手抗疫，切断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和G20峰会紧急议题提出全球抗疫主题，形成机制讨论应对疫情的办法。要把握疫情对产业的轮动冲击，精准施策。李钢建议，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宏观调控的协调也很重要。有必要在世界贸易组织层面进行紧急磋商，协调相关边境措施的一致性。此外，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也要采取相关举措，以减少减缓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三、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的中国选择

以稳住自己作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前提。王建认为，对疫情的冲击，想得简单不如想得复杂，与其想得轻不如想得重。如果整个世界产业链断了，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即使是像中国这样全产业链的国家，也要考虑如果世界经济瘫痪自己能否站得稳。现在第一位是要保民生、保农业。陈文玲认为，要把握好中国五大经济增长点。一是新消费，二是新基建，三是新服务，四是新制造，五是新价值链。贾庆国认为，稳外贸要做，但是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恢复经济主要是靠自己，要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的力度，采取必要的措施刺激经济；对疫情中由于收入中断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要给予救济和补贴。吴士存建议，要尽快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即“生活正常化，抗疫常态化”。

倡议国际社会以积极主动的合作精神抗击疫情。贾庆国指出，中国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第一，主动对外分享抗疫经验和教训，但切忌把它做成简单宣传。第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其他国家抗疫活动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对发展中国家要以分享经验和无偿援助为主，对发达国家要以分享经验和有偿供应相关物资为主。曹远征认为，可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总结抗疫经验，特别是中国经验。要把疫情中性化，避免政治化。王辉耀建议，第一，由中国倡议在本月内就召开 G20 首脑会议。一是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各国领导人联合商讨能不能为世界提供新的经济振兴方案。第二，世界卫生组织立即召开各国卫生部长会议。第三，中国可以向世界各国出口或者援助抗疫物资，或应邀向各国派出中国专家。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张蕴岭指出，疫情暴发前，我们主要捍卫的是全球化的基本体制不变。但是现在，全球化结构的调整成为必然趋势。我们要支持和推动这些改革调整，要把国际经济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加快国内经济调整的步伐。张燕生认为，中国采取的基本对策仍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第一，加深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合作。第二，加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中欧自贸协定、“一带一路”与欧亚互通战略对接。第三，加强和美国的合作。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贸易战，要挂钩不要脱钩。贾庆国建议，利用中日韩共同抗疫的契机，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同时，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曹远征还指出，要以抗疫为中心形成新的机制安排，以区域一体化的实际行动，有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

（作者分别为中改院博士生、改革开放史中心主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沈家文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贸易组织预测 2020 年全球贸易量将下降 13%至 32%

世界贸易组织（WTO）2020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年度报告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贸易量将下降 13%~32%。考虑到“史无前例”的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2020 年全球贸易量降幅可能超过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2019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 0.1%。2020 年，全球所有地区贸易量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其中北美和亚洲的出口贸易受到的打击最大。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制造产业的贸易量下降将更为严重。2021 年全球贸易仍有可能复苏，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其最终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各国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强调，目前首要目标是控制疫情，减轻疫情对民众、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损害，但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同时开始为后疫情时期作规划。

（二）联合国预计新冠肺炎或致 2020 年全球经济下降 0.9%

联合国 2020 年 4 月 1 日发布报告预计，全球经济 2020 年可能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下降 0.9%，与疫情前作出的 2.5% 的增长预测形成大逆转。如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措施延伸至 2020 年第三季度，且财政刺激举措无法支撑收入和消费开支，全球经济下跌会进一步加深。相比之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经济下降 1.7%。报告指出：“对病毒呈指数级传播，以及各种遏制措施有效性越来越不确定的担忧冲击了全球金融市

场，市场动荡程度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峰值，股市和油价跌至多年来的低点。”经济影响的严重性是“适度或深度衰退”，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经济体限制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措施的持续时间，以及财政应对措施的规模 and 效果。财政刺激计划应该优先考虑卫生支出，以遏制病毒传播，并且应该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家庭提供收入支持。

（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疫情让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0 年 4 月 30 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布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展中国家未来两年将面临 2 万亿~3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全球需通过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其应对危机。自 2020 年年初以来，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已下跌 5%~25%，跌幅超过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的水平；另外，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 2020 年来平均已下跌 37%，重创了很多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报告建议提供总计约 2.5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危机。这一计划具体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框架下，通过调整特别提款权分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 万亿美元紧急流动性；免除贫困国家 1 万亿美元债务；由发达国家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捐助 5000 亿美元资金，用于紧急医疗服务和相关社会救助项目。

（四）IMF：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

IMF 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在遭遇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预计 2020 年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长将萎缩 3%。这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面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IMF 预计，发达经济体 2020 年经济增速为 -6.1%，2021 年复苏至 4.5%。其中，对美国 2020 年经济增速预期为 -5.9%，2021 年为 4.7%。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 年经济增速将为 -1%。其中，IMF 对中国 2020 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1.2%，2021 年为 9.2%。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在下半年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将遭遇更大的打击，2020 年全球 GDP 可能会萎缩 6%。如果疫情持续至 2021 年，2021 年全球 GDP 可能会萎缩 2.2%。

格奥尔基耶娃 2020 年 4 月 9 日在为 IMF 与世界银行远程春季会议发表揭幕演讲时称，新冠疫情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和前所未见的规模扰乱全球社会和经济秩序，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仍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IMF 预计将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仅在 3 个月前，IMF 曾预计 2020 年 IMF 成员中将有超过 160 个国家实现人

均收入正增长，而现在 IMF 预计 2020 年将有超过 170 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提出四点计划：继续实施必要防控措施，为卫生体系提供支撑；采取大规模、及时、有针对性的财政和金融部门措施，为受影响的民众和公司提供保护；减轻金融体系压力并避免风险蔓延；为疫情防控后的经济复苏做好计划。

（五）世行报告：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或降至 2.1%

世界银行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认为，东亚太平洋地区（简称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正努力走出贸易紧张局势阴霾，并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又面临全球金融冲击与经济可能衰退的前景。报告提出了基线情景和悲观情景假设。基线情景下，预计 2020 年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从 2019 年估计的 5.8% 放慢至 2.1%。但世界银行估计，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悲观情景下，这一地区经济或收缩 0.5%。遏制疫情蔓延能让东亚地区实现持续复苏，但金融市场压力对经济前景构成的风险将会居高不下。虽然大多数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依靠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的金融监管，具备应对正常波动的能力，但当前各种具有颠覆性和相互作用的事件叠加，使得所有经济体似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严重的经济阵痛；东亚各经济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包括紧急加强医疗卫生投资，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以缓解部分直接影响。

（六）非盟预测 2020 年非洲经济萎缩 0.9%

非洲联盟（非盟）2020 年 4 月 6 日公布《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影响》报告显示，根据最新宏观经济模型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非洲大陆经济将萎缩 0.9%。全球供应链中断、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以及非洲各国相关防疫措施是造成经济萎缩的主因。根据对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两种情境预测，非洲经济可能萎缩 0.8% 或 1.1%。报告据此综合计算后判断，非洲 2020 年经济将萎缩 0.9%。疫情将对非洲航空旅游和货物贸易造成严重冲击，损失将分别高达 500 亿美元和 2700 亿美元。此外，约有 2000 万个就业岗位将因疫情受到威胁。非盟表示，疫情将导致 2020 年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非洲抗击疫情将额外增加 1300 亿美元的公共支出。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社会点赞中国抗疫举措：为全球带来希望曙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依然严峻，在这场全球抗疫大行动中，中国不仅通过采取严格防控举措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疫

情防控国际合作。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中国所作努力为世界树立了优秀榜样，为全球抗疫带来了希望曙光。

希腊国际关系领域专家海尔表示，面对此次全球性危机和挑战，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疫情防控方面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反应能力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疫情蔓延之时，中国与全球科学医疗团队合作，为许多欧洲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医疗援助；还与世界各国科研团队合作，在研制新冠肺炎药物和疫苗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资深外交家格特·格勒布勒高度赞扬中国疫情防控成果，近几个月来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世卫组织、联合国、非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众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赞赏和认可。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呼吁非洲各国同中国加强合作、携手前行；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与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经验，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

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肯尼亚学者姆旺吉·瓦吉拉认为，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综合应对举措有助于稳定国内市场，消费、科技、金融、医疗等领域都存在着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展促进会会长贡杰－达卡认为：“中国经济基础雄厚并且内需市场广阔，具有显著抗风险韧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拥有坚实基础。”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评价说，“这场疫情毫无疑问证明了中国制度优势”。中国依靠自身制度成功抵御了风险，控制住疫情。中国经济活动逐步复苏，中国社会正逐步恢复常态。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鲁舍认为，“受疫情影响，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其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庞大内需市场、创新型企业蓬勃发展等因素，都将缓解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

巴拿马经济学家埃迪·塔彼罗表示，疫情期间，中国线上经济、智能经济等新业态展现出巨大潜力，“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中国经受住了考验。相信疫情过后，一些新模式和新业态将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新机遇”。

（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首次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0 年 4 月 7 日发布最新报告称，随着知识产权服务、条约和收入基础的强劲增长，2019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2019 年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合作条约》体系（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共提交了 58990 件申请（2018 年 53345 件），自 1978 年 PCT 运行以来首次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Francis Gurry）表示，“在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中，中国迅速跃升至首位。这突出表明，长期以来创新地理格局在向东方转移，亚洲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现已占全部申请的半数以上”。1999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中国收到 276 件申请，到 2019 年，这一数字飙升为 58990 件，短短 20 年增长 200 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公司已连续第三年成为提交 PCT 申请最多的企业，2019 年该公司共有 4411 件已公布的 PCT 申请。

（四）多家机构下调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中国 2020 年 1—2 月经济数据大幅弱于预期之后，多家机构开始重估疫情影响，下调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高盛 2020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 2020 年一季度 GDP 将同比下降 9%。尽管中国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疫情在中国境外的快速传播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可能会限制二季度经济反弹。高盛预计，二季度中国 GDP 增速同比或增长 1.5%；三、四季度有望达到 7.5% 和 9.8%。但即使如此，全年增速也只能达到 3%，低于此前预测 2.5 个百分点。

摩根士丹利 2020 年 3 月 17 日的报告也预计中国 2020 年一季度 GDP 同比将下降 5%，不过二季度会反弹至 3.4%，三、四季度继续升至 7.6% 和 8.1%，带动 2020 年 GDP 增速达到 4%。2 月底摩根士丹利对 2020 年经济增速的预期是 5.6%。

渣打银行测算称，中国 2020 年 1—2 月经济或同比下降 12%；随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大，预计一季度中国 GDP 将同比下降 4.2%。在政策支持和经济生产活动正常化的带动下，二季度中国经济即可出现反弹，预计后三个季度 GDP 增速分别为 6.1%、6.3% 和 6.4%，全年增长 4%，低于此前预测 1.5 个百分点。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4 月)				
世 界	3.6	2.9	-3.0	3.4
发达国家	2.2	1.7	-6.1	4.5
美 国	2.9	2.3	-5.9	4.7
欧元区	1.9	1.2	-7.5	4.7
日 本	0.3	0.7	-5.2	3.0
发展中国家	4.5	3.7	-1.0	6.6
印 度	6.1	4.2	1.9	7.4
俄罗斯	2.5	1.3	-5.5	3.5
巴 西	1.3	1.1	-5.3	2.9
世界银行(WB,2020 年 1 月)				
世 界	3.0	2.4	2.5	2.6
发达国家	2.2	1.6	1.4	1.5
发展中国家	4.3	3.5	4.1	4.3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0 年 4 月)				
世 界	3.1	2.5	-2.1	4.4
美 国	2.9	2.3	-4.0	3.9
欧元区	1.9	1.2	-5.7	5.4
日 本	0.3	0.7	-3.3	2.1
印 度	6.1	4.7	2.7	6.3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1 年 预测值
世 界	3.8	0.9	-11.0	8.4
进口				
发达国家	3.3	1.5	-11.5	7.5
发展中国家	5.1	-0.8	-8.2	9.1
出口				
发达国家	3.3	1.2	-12.8	7.4
发展中国家	4.1	0.8	-9.6	11.0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1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4 月)				
世 界				
发达国家	2.0	1.4	0.5	1.5
发展中国家	4.8	5.0	4.6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0 年 4 月)				
世 界	2.9	2.7	2.1	2.4
美 国	2.4	1.8	0.8	1.8
欧元区	1.8	1.2	0.4	1.3
日 本	1.0	0.5	-0.1	0.2
印 度	3.4	4.6	4.0	4.3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9 年		2.1	1.4	2.5
	3 月	2.2	1.8	2.8
	4 月	2.1	1.8	2.6
	5 月	2.3	1.7	2.7
	6 月	2.0	1.7	2.4
	7 月	2.0	1.5	2.2
	8 月	1.8	1.4	2.1
	9 月	1.8	1.2	2.2
	10 月	1.8	1.1	2.4
	11 月	1.8	1.1	2.7
	12 月	2.2	1.3	2.8
2020 年	1 月	2.0	1.5	2.9
	2 月	2.1	1.3	3.1
	3 月	2.0	0.7	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9 年		1.5	-0.8	3.8			
	3 月	2.4	0.0	5.3	50.5	50.3	49.9
	4 月	1.8	-0.2	3.5	50.4	50.6	50.1
	5 月	1.8	0.0	3.6	49.8	50.1	49.5
	6 月	1.2	-1.0	3.4	49.4	49.5	49.0
	7 月	1.2	-0.7	3.2	49.3	49.4	49.2
	8 月	0.6	-1.4	2.4	49.5	50.0	49.0
	9 月	1.8	-0.8	3.3	49.7	50.1	49.4
	10 月	0.0	-2.4	2.5	49.8	50.3	50.0
	11 月	1.2	-1.8	3.7	50.3	51.0	50.4
	12 月	1.2	-2.2	4.1	50.1	50.4	50.3
2020 年							
	1 月	-4.7	-1.1	-7.4	50.4	50.8	50.8
	2 月	-3.5	-1.1	-6.9	47.1	43.5	45.2
	3 月				47.6	45.4	43.8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4 季度	3.5	4.6	2.4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5	1.7	1.9
	2 季度	3.5	4.0	2.6
	3 季度	2.9	3.5	2.1
2019 年	4 季度	1.1	1.4	-0.4
		2.3	2.6	2.3
	1 季度	3.1	1.1	2.9
	2 季度	2.0	4.6	4.8
	3 季度	2.1	3.2	1.7
	4 季度	2.1	1.8	2.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2	3.5	4.7
	4 季度	8.7	10.1	14.0
2018 年		4.6	3.0	4.4
	1 季度	5.5	0.8	0.6
	2 季度	5.2	5.8	0.3
	3 季度	0.7	-6.2	8.6
2019 年	4 季度	2.7	1.5	3.5
		1.3	0.0	1.0
	1 季度	3.2	4.1	-1.5
	2 季度	-1.4	-5.7	0.0
	3 季度	-0.8	1.0	1.8
	4 季度	-0.6	2.1	-8.4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4	2.6	0.7
	4 季度	2.8	2.9	0.8
2018 年		2.9	3.0	1.7
	1 季度	2.9	2.8	1.4
	2 季度	3.2	3.2	1.7
	3 季度	3.1	3.4	2.2
2019 年	4 季度	2.5	2.6	1.5
		2.3	2.6	2.3
	1 季度	2.7	2.5	1.8
	2 季度	2.3	2.6	2.3
	3 季度	2.1	2.6	2.2
	4 季度	2.3	2.7	3.0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2	3.5	4.7
	4 季度	5.1	5.5	5.6
2018 年		4.6	3.0	4.4
	1 季度	4.6	4.1	4.7
	2 季度	5.2	5.2	3.9
	3 季度	5.0	2.4	5.7
	4 季度	3.5	0.4	3.2
2019 年		1.3	0.0	1.0
	1 季度	2.9	1.2	2.6
	2 季度	1.3	-1.7	2.6
	3 季度	0.9	0.2	0.9
	4 季度	0.1	0.3	-2.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9 年			1.7	3.7	213.3
	3 月	3.8	2.0	3.8	14.7
	4 月			3.6	21.0
	5 月			3.6	8.5
	6 月	2.6	2.1	3.7	18.2
	7 月			3.7	19.4
	8 月			3.7	20.7
	9 月	-0.3	1.6	3.5	20.8
	10 月			3.6	18.5
	11 月			3.5	26.1
	12 月	1.2	1.8	3.5	18.4
2020 年					
	1 月			3.6	21.4
	2 月			3.5	27.5
	3 月			4.4	-70.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9 年	25329		0.0	34865		1.0	-9536
2 月	2085	1.1	1.4	2597	-0.1	0.1	-513
3 月	2107	1.1	0.4	2634	1.4	2.4	-527
4 月	2065	-2.0	-1.1	2578	-2.1	0.3	-513
5 月	2115	2.4	-0.9	2663	3.3	3.3	-548
6 月	2075	-1.9	-1.7	2617	-1.7	1.3	-543
7 月	2081	0.3	-0.3	2613	-0.2	0.0	-532
8 月	2086	0.2	0.4	2625	0.5	-0.1	-539
9 月	2067	-0.9	-1.4	2580	-1.7	-2.9	-513
10 月	2065	-0.1	-1.7	2539	-1.6	-4.8	-474
11 月	2077	0.6	-0.1	2515	-1.0	-3.9	-438
12 月	2095	0.9	1.9	2581	2.6	-3.1	-486
2020 年							
1 月	2083	-0.6	1.0	2538	-1.7	-2.4	-455
2 月	2075	-0.4	-0.4	2475	-2.5	-4.7	-39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773	3004	-231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2536	-906	3442
	1 季度	528	-481	1009
	2 季度	6	-1209	1215
	3 季度	1239	560	679
	4 季度	763	224	539
2019 年		2462	1249	1213
	1 季度	817	-156	973
	2 季度	726	968	-242
	3 季度	330	145	185
	4 季度	589	291	29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5	1.7	1.3
	4 季度	0.8	0.4	0.3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0.3	0.4	0.1
	2 季度	0.4	0.2	0.5
	3 季度	0.2	0.1	0.0
	4 季度	0.4	0.4	0.5
2019 年		1.2	1.3	1.6
	1 季度	0.5	0.4	0.4
	2 季度	0.1	0.2	0.4
	3 季度	0.3	0.5	0.6
	4 季度	0.1	0.1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5	5.5	5.0
	4 季度	0.9	2.3	1.7
2018 年		2.3	3.4	2.7
	1 季度	0.7	-0.4	-0.3
	2 季度	1.0	0.9	1.2
	3 季度	1.0	0.2	1.1
	4 季度	1.2	1.0	1.0
2019 年		5.7	2.5	3.8
	1 季度	0.9	0.9	0.2
	2 季度	5.0	0.0	2.7
	3 季度	-3.8	0.6	-1.3
	4 季度	4.2	0.4	2.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9 年		0.0		7.6	1244.9
	2 月			7.8	1271.0
	3 月	0.1	-0.1	7.7	1255.8
	4 月			7.6	1249.2
	5 月			7.6	1242.2
	6 月	-0.1	-0.2	7.5	1236.8
	7 月			7.6	1242.1
	8 月			7.5	1231.1
	9 月	0.2	0.5	7.5	1231.7
	10 月			7.4	1220.5
	11 月			7.4	1218.0
	12 月	-0.2	-0.1	7.4	1213.9
2020 年					
	1 月			7.4	1213.5
	2 月			7.3	1204.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5	1.7	1.3
	4 季度	3.0	1.7	1.3
2018 年		1.9	1.4	1.1
	1 季度	2.6	1.7	1.3
	2 季度	2.2	1.5	1.4
	3 季度	1.6	1.1	0.8
	4 季度	1.2	1.2	1.0
2019 年		1.2	1.3	1.6
	1 季度	1.4	1.2	1.4
	2 季度	1.2	1.2	1.3
	3 季度	1.3	1.5	2.0
	4 季度	1.0	1.2	1.8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4	5.5	5.0
	4 季度	2.3	6.9	4.4
2018 年		2.3	3.4	2.7
	1 季度	4.2	4.6	3.5
	2 季度	-2.0	4.1	0.6
	3 季度	3.6	3.0	3.8
	4 季度	3.8	1.7	3.1
2019 年		5.7	2.5	3.8
	1 季度	4.1	3.1	3.6
	2 季度	8.3	2.2	5.2
	3 季度	3.2	2.7	2.6
	4 季度	6.3	2.0	3.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年份	月份		(%)	(%)		(%)	(%)	进口额
2019 年		23454		2.7	21197		1.5	2257
	2 月	1943	-0.8	5.9	1759	-1.2	5.8	184
	3 月	1961	0.9	3.0	1794	2.0	6.4	167
	4 月	1929	-1.6	5.4	1776	-1.0	6.6	153
	5 月	1952	1.2	6.9	1773	-0.2	5.3	179
	6 月	1936	-0.8	-5.4	1762	-0.7	-4.2	175
	7 月	1937	0.0	6.0	1771	0.5	3.0	166
	8 月	1953	0.8	-2.1	1759	-0.7	-3.5	194
	9 月	1958	0.3	5.3	1773	0.8	2.3	186
	10 月	2003	2.3	4.5	1764	-0.5	-2.3	239
	11 月	1948	-2.7	-2.6	1761	-0.2	-4.0	188
	12 月	1972	1.2	4.9	1748	-0.7	1.2	224
2020 年								
	1 月	1968	-0.2	0.1	1786	2.2	-0.5	182
	2 月	2003	1.8	1.6	1745	-2.3	-0.9	25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9 年		1168	1276	- 107
	2 月	- 87	181	- 267
	3 月	- 255	195	- 450
	4 月	503	383	120
	5 月	275	96	179
	6 月	- 735	- 1344	609
	7 月	1649	1518	131
	8 月	- 470	- 173	- 297
	9 月	338	439	- 100
	10 月	- 360	59	- 409
	11 月	526	218	308
	12 月	- 627	- 1024	397
2020 年	1 月	44	214	- 170
	2 月	113	341	- 22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2. 2	1. 3	0. 2
	4 季度	0. 4	0. 5	0. 1
2018 年		0. 3	0. 0	0. 9
	1 季度	- 0. 5	- 0. 4	0. 4
	2 季度	0. 5	0. 2	0. 1
	3 季度	- 0. 8	- 0. 2	0. 2
2019 年	4 季度	0. 6	0. 4	0. 7
		0. 7	0. 2	1. 9
	1 季度	0. 5	0. 0	- 0. 4
	2 季度	0. 6	0. 6	1. 7
	3 季度	0. 0	0. 5	0. 7
	4 季度	- 1. 8	- 2. 8	0. 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 0	6. 8	3. 4
	4 季度	0. 6	2. 2	2. 9
2018 年		0. 6	3. 4	3. 4
	1 季度	- 0. 2	1. 0	0. 5
	2 季度	1. 7	0. 7	0. 7
	3 季度	- 3. 3	- 2. 3	- 1. 4
2019 年	4 季度	2. 9	1. 6	4. 3
		1. 3	- 1. 8	- 0. 8
	1 季度	0. 3	- 1. 9	- 4. 3
	2 季度	0. 9	0. 4	2. 0
	3 季度	0. 5	- 0. 7	0. 7
	4 季度	- 3. 2	- 0. 1	- 2. 7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2. 2	1. 3	0. 2
	4 季度	2. 5	1. 4	0. 4
2018 年		0. 3	0. 0	0. 9
	1 季度	0. 9	0. 1	0. 4
	2 季度	1. 0	- 0. 3	0. 8
	3 季度	- 0. 3	0. 2	0. 9
2019 年	4 季度	- 0. 3	0. 0	1. 3
		0. 7	0. 2	1. 9
	1 季度	0. 8	0. 4	0. 5
	2 季度	0. 9	0. 7	2. 1
	3 季度	1. 7	1. 4	2. 8
	4 季度	- 0. 7	- 1. 8	2. 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 0	6. 8	3. 4
	4 季度	2. 8	6. 7	5. 1
2018 年		0. 6	3. 4	3. 4
	1 季度	1. 1	5. 2	3. 5
	2 季度	1. 8	5. 9	2. 9
	3 季度	- 1. 2	1. 7	2. 9
2019 年	4 季度	0. 7	1. 1	4. 2
		1. 3	- 1. 8	- 0. 8
	1 季度	1. 2	- 2. 1	- 1. 2
	2 季度	0. 8	- 2. 2	0. 2
	3 季度	5. 0	- 0. 5	2. 6
	4 季度	- 1. 6	- 2. 2	- 4. 4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8 年		0. 7	1. 61	2. 4
	2 月	- 2. 0	1. 63	2. 4
	3 月	- 3. 2	1. 62	2. 5
	4 月	- 0. 5	1. 63	2. 4
	5 月	0. 6	1. 62	2. 4
	6 月	- 1. 4	1. 61	2. 3
	7 月	0. 6	1. 59	2. 3
	8 月	- 3. 8	1. 59	2. 3
	9 月	1. 7	1. 58	2. 4
	10 月	- 5. 9	1. 58	2. 4
	11 月	- 4. 1	1. 57	2. 2
	12 月	- 2. 3	1. 57	2. 2
2020 年	1 月	- 4. 6	1. 49	2. 4
	2 月		1. 45	2. 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日元								单位:%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9 年	769317		-5.6	785995		-5.0	-16678	2018 年		2.7	2.1	3.0	2.8	7.1	5.2
3 月	66236	0.1	-2.4	67699	1.0	1.3	-1463	1 季度	2.8	1.6	4.6	3.2	7.5	5.1	
4 月	65728	-0.8	-2.3	67466	-0.3	6.5	-1738	2 季度	2.9	3.0	3.6	3.4	6.7	5.3	
5 月	62948	-4.2	-7.7	67751	0.4	-1.5	-4804	3 季度	2.1	2.5	2.8	2.5	6.8	5.2	
6 月	65483	4.0	-6.6	65636	-3.1	-5.2	-153	4 季度	2.9	1.4	1.1	2.0	7.3	5.2	
7 月	65124	-0.5	-1.5	66644	1.5	-1.1	-1520	2019 年	2.0	-0.1	-1.2	2.7	7.0	5.0	
8 月	63407	-2.6	-8.2	64641	-3.0	-11.8	-1235	1 季度	1.7	1.2	0.7	1.8	6.8	5.1	
9 月	64162	1.2	-5.2	64702	0.1	-1.4	-541	2 季度	2.0	-0.9	0.4	2.6	6.7	5.1	
10 月	62852	-2.0	-9.2	63616	-1.7	-14.7	-764	3 季度	2.0	-0.3	-2.8	3.0	7.5	5.0	
11 月	62488	-0.6	-7.9	63166	-0.7	-15.6	-677	4 季度	2.3	-0.5	-2.9	3.3	6.8	5.0	
12 月	62844	0.6	-6.3	63296	0.2	-4.8	-451	2020 年							
2020 年								1 季度	1.3					3.8	
1 月	60612	-3.6	-2.6	62125	-1.9	-3.6	-151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2 月	62573	3.2	-1.0	57751	-7.0	-13.9	4822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3 月	59982	-4.1	-11.7	61882	7.2	-5.0	-1900	单位:%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9 年		40593	271798	-231205					
	2 月	2503	13115	-10612					
	3 月	12461	26877	-14416					
	4 月	2810	21621	-18811					
	5 月	3773	19930	-16157					
	6 月	48	16143	-16095					
	7 月	2411	15118	-12707					
	8 月	3414	24050	-20636					
	9 月	1971	8316	-6345					
	10 月	-1349	9059	-10408					
	11 月	3426	16426	-13000					
	12 月	8065	29177	-21112					
2020 年									
	1 月	-1645	17910	-19555					
	2 月	1132	13275	-12143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3.2	1.9	1.4	1.3	6.7	1.8								
	4 季度	1.7	1.6	1.4	2.4	7.7	1.0								
2018 年		2.0	1.4	0.8	1.3	6.7	2.5								
	1 季度	2.5	1.1	0.7	1.5	7.7	2.2								
	2 季度	1.7	1.3	0.1	1.1	7.1	2.6								
	3 季度	2.0	1.6	1.3	1.5	6.2	2.5								
	4 季度	1.8	1.4	1.1	1.2	5.6	2.8								
2019 年		1.7	1.4	0.2	1.1	5.3	1.3								
	1 季度	1.5	2.0	0.0	0.6	5.8	0.4								
	2 季度	2.0	1.3	0.9	1.1	5.6	1.1								
	3 季度	1.6	1.2	0.1	1.2	5.1	1.5								
	4 季度	1.5	1.1	-0.5	1.7	4.7	2.1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8 年		2.7	2.1	3.0	2.8	7.1	5.2
	1 季度	2.8	1.6	4.6	3.2	7.5	5.1
	2 季度	2.9	3.0	3.6	3.4	6.7	5.3
	3 季度	2.1	2.5	2.8	2.5	6.8	5.2
	4 季度	2.9	1.4	1.1	2.0	7.3	5.2
2019 年		2.0	-0.1	-1.2	2.7	7.0	5.0
	1 季度	1.7	1.2	0.7	1.8	6.8	5.1
	2 季度	2.0	-0.9	0.4	2.6	6.7	5.1
	3 季度	2.0	-0.3	-2.8	3.0	7.5	5.0
	4 季度	2.3	-0.5	-2.9	3.3	6.8	5.0
2020 年							
	1 季度	1.3				3.8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9 年		5.7	3.8	28.7	11.9	7.4	4.6
	3 月	5.8	3.8	27.6	12.7	6.7	4.7
	4 月	5.7	3.8		12.5	7.4	4.7
	5 月	5.4	3.8		12.3	7.0	4.5
	6 月	5.5	3.9	29.0	12.0	7.9	4.4
	7 月	5.7	3.8		11.8	7.3	4.5
	8 月	5.7	3.9		11.8	8.2	4.3
	9 月	5.5	3.8	29.1	11.8	7.2	4.5
	10 月	5.5	3.8		11.6	8.1	4.6
	11 月	5.9	3.8		11.2	7.2	4.6
	12 月	5.6	3.8	29.1	11.0	7.6	4.6
2020 年							
	1 月	5.5	3.9		11.2	7.2	4.7
	2 月	5.6	4.0		11.6	7.8	4.6
	3 月	7.8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19 年		3.8	3.5	2.9	3.7	2.2	5.2								
	3 月	3.8	3.2	2.8	3.7	2.2	5.0								
	4 月	4.1	3.5	2.8	3.7										
	5 月	4.0	3.5	2.8	3.8										
	6 月	4.0	3.6	2.8	3.7	2.2									
	7 月	4.0	3.7	2.9	3.7										
	8 月	3.1	3.7	2.9	3.7										
	9 月	3.4	3.8	2.9	3.7	2.2	5.3								
	10 月	3.5	3.6	3.1	3.7										
	11 月	3.6	3.4	3.2	3.7										
	12 月	3.7	2.9	3.3	3.7	2.2									
2020 年															
	1 月	4.0	3.8	3.4	3.7										
	2 月	3.3	3.6	3.7	3.7										
	3 月	3.8		4.2	3.8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4469	4637	-168	4688	6918	-2230
2 月	324.6	358.5	-33.9	381.5	570.3	-188.8
3 月	388.6	409.5	-20.9	448.7	641.7	-193.0
4 月	372.5	397.8	-25.2	390.0	521.5	-131.6
5 月	412.4	412.0	0.3	403.2	526.0	-122.8
6 月	384.2	390.3	-6.1	377.5	513.8	-136.4
7 月	373.3	390.5	-17.2	375.3	605.6	-230.3
8 月	371.6	399.9	-28.3	337.1	579.7	-242.6
9 月	371.9	381.7	-9.9	382.8	621.7	-238.9
10 月	385.8	401.5	-15.7	435.5	672.9	-237.5
11 月	362.9	370.0	-7.1	384.0	566.4	-182.3
12 月	379.4	356.1	23.3	401.8	501.7	-99.9
2020 年						
1 月	354.7	355.7	-1.0	370.5	543.1	-172.6
2 月	333.3	343.1	-9.8	352.8	505.6	-152.7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900	881	19	2254	1773	481
3 月	73.1	69.7	3.3	174.3	131.3	43.0
4 月	73.2	75.7	-2.5	192.8	136.3	56.5
5 月	77.5	76.4	1.1	205.9	149.7	56.2
6 月	74.0	71.1	2.9	184.1	130.3	53.8
7 月	80.3	82.5	-2.2	201.5	177.6	23.9
8 月	80.3	76.0	4.4	196.7	155.7	41.0
9 月	74.4	70.9	3.5	203.0	165.0	38.0
10 月	82.4	80.6	1.8	195.8	170.3	25.5
11 月	78.7	74.9	3.8	177.4	141.7	35.7
12 月	71.4	61.4	10.0	185.0	125.6	59.5
2020 年						
1 月	70.1	71.6	-1.5	144.4	161.8	-17.4
2 月	72.8	63.3	9.5	163.6	132.6	31.0
3 月				192.4	145.3	47.1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3249	4782	-1533	4187	2544	1643
3 月	325.5	434.4	-108.9	370.3	209.6	160.7
4 月	260.7	414.0	-153.3	366.7	220.7	146.1
5 月	299.9	453.5	-153.6	323.9	198.9	125.0
6 月	250.1	402.9	-152.8	323.8	200.1	123.6
7 月	263.3	397.6	-134.3	334.5	223.7	110.7
8 月	261.3	395.8	-134.5	343.7	219.9	123.8
9 月	260.3	368.9	-108.6	355.5	210.1	145.4
10 月	263.8	373.9	-110.1	367.8	238.9	128.9
11 月	259.8	381.1	-121.3	354.9	232.4	122.5
12 月	273.6	386.1	-112.5	390.0	242.3	147.7
2020 年						
1 月	253.6	411.4	-157.8	300.3	169.6	130.7
2 月	276.5	375.0	-98.5	281.2	184.6	96.6
3 月	214.1	311.6	-97.5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5422	5033	389	4611	4553	58
3 月	470.0	419.9	50.1	390.2	375.3	14.9
4 月	487.8	450.5	37.3	394.5	380.8	13.7
5 月	457.0	436.2	20.8	418.3	408.0	10.3
6 月	440.1	401.1	39.0	379.5	353.9	25.6
7 月	460.8	437.6	23.2	393.0	404.2	-11.2
8 月	440.2	424.6	15.6	404.3	396.6	7.8
9 月	446.3	387.4	58.9	372.2	373.4	-1.2
10 月	466.5	414.0	52.5	407.3	414.6	-7.3
11 月	440.4	407.3	33.1	375.0	367.1	7.9
12 月	456.7	436.9	19.8	386.6	356.0	30.7
2020 年						
1 月	431.8	427.2	4.6	336.5	360.7	-24.2
2 月	411.8	372.0	39.8	366.3	337.2	29.1
3 月	469.1	418.7	50.4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5349	5778	-429	3293	2858	435
3 月	467.2	526.4	-59.2	284.8	254.4	30.4
4 月	440.6	474.3	-33.8	255.7	229.1	26.6
5 月	455.4	499.5	-44.2	275.6	230.9	44.7
6 月	408.6	473.3	-64.7	282.2	243.4	38.8
7 月	443.6	487.3	-43.7	281.2	244.6	36.5
8 月	462.4	494.9	-32.5	287.9	227.9	60.0
9 月	461.5	491.8	-30.3	281.0	249.6	31.5
10 月	465.5	490.9	-25.3	289.8	250.4	39.4
11 月	472.6	501.7	-29.2	285.7	242.8	42.8
12 月	482.4	505.4	-22.9	294.8	269.8	25.1
2020 年						
1 月	366.0	405.2	-39.2	250.7	216.1	34.6
2 月	315.9	367.7	-51.9	253.8	220.8	33.0
3 月				282.7	254.8	27.8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2624	2539	85	1685	1707	-22
3 月	227.8	211.5	16.3	141.2	134.5	6.7
4 月	185.1	209.9	-24.9	131.1	154.0	-22.9
5 月	219.1	231.9	-12.9	148.3	146.1	2.2
6 月	214.3	195.0	19.3	117.9	115.0	3.0
7 月	229.8	229.4	0.4	154.5	155.2	-0.7
8 月	258.9	224.5	34.4	142.8	141.7	0.9
9 月	233.6	217.5	16.1	141.0	142.6	-1.6
10 月	242.3	223.7	18.6	149.3	147.6	1.8
11 月	227.9	213.4	14.5	139.5	153.4	-13.9
12 月	225.6	223.0	2.6	144.7	145.0	-0.3
2020 年						
1 月	183.2	186.0	-2.8	136.3	142.7	-6.4
2 月	112.8	89.3	23.5	140.6	115.5	25.1
3 月	111.8	102.9	8.9	140.9	133.5	7.4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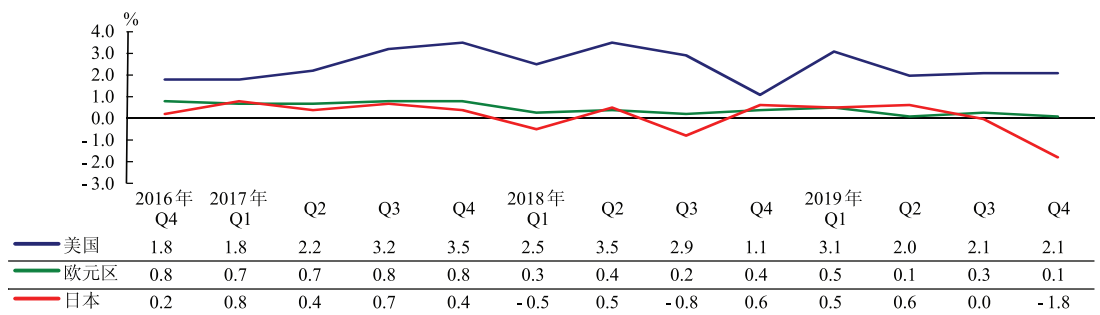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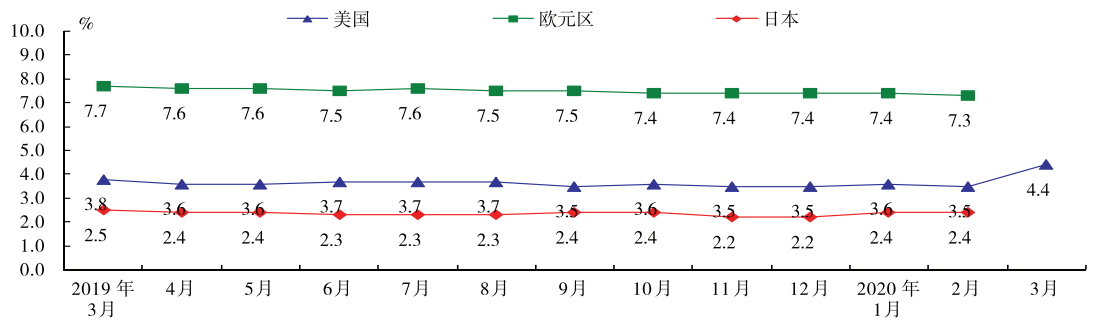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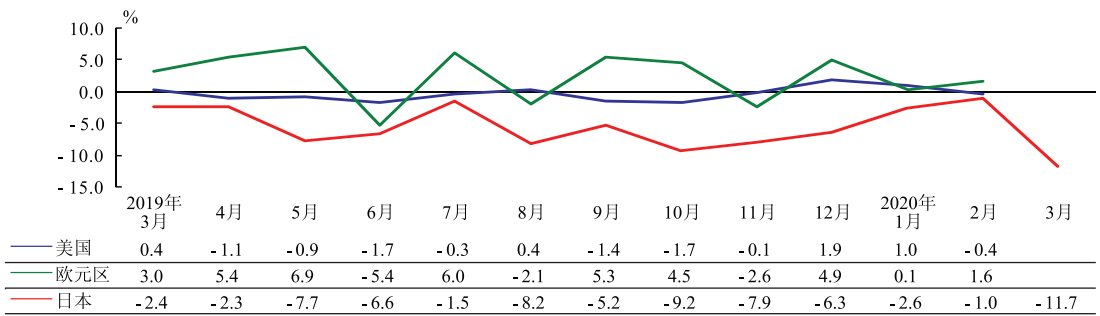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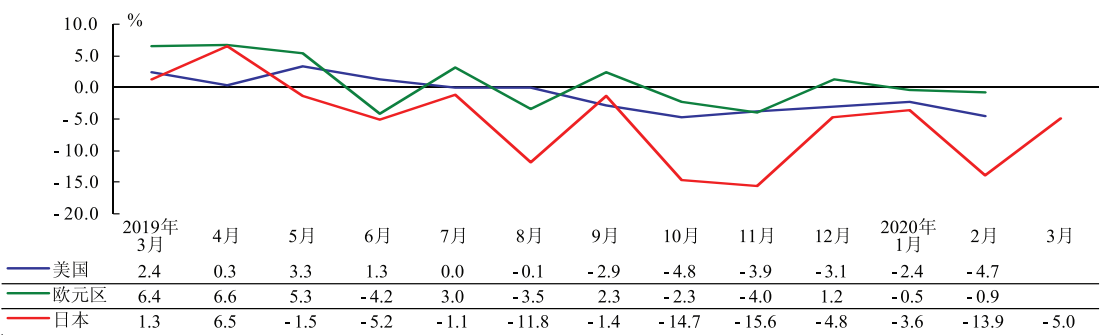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The Outlook of Prospects and Policy

Wang Yim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oduced two waves of impact. The first wave mainly impacted the Chinese economy. After the global pandemic, it formed a second wave of impact on the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pandemic not only impacted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from the demand and supply, but also halted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blocked factor flows, broke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shocked economic activity.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most likely fall into recession and have a negative feedback effect on the China's economy. China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hocks, and adjust the short-term policy of deal with the pandemic to a mid-term package. The focus of the policy should also shift from supply-side such as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and other demand-side policies.

(2) Ca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s "Preventive Rate Cut" and "Emergency Rate Cut" Save the Tide

Gu Yuany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the FED tried to prevent the economy decrease in advance through three "preventive rate cuts", but the boosting effect is limi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rapidly spread and deteri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using the originally downward economy to stall and decline. For "Bailout", the FED regained interest rate cuts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to provide the market with much-needed liquidity. This rate cuts is not to "buy insurance" or "prevent injections" for the economy, but to start an "emergency rate cut"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the rate cut was twice as large as the previous three of "preventive rate cuts". This caused investors to panic and lose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ic outlook, caused the three major stock indexes to plunge and triggering "Circuit Breaker" many times, failed to reverse the stock market's decline. After that, the FED purchased unlimited amounts of government bonds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These key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continue to alleviate the "dollar shortage", suppress the sudden drop in employment and maintain price stability. The short-term effects are unsatisfactory, the final effects and policy risks still need to be tracked and observed.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inancial War

Huang Zhiling

"Financial war" refers not only to financial sanctions launched by one economic entity

against another, but also to a currency sniper launched by a powerfu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 against a sovereign country or customs economic entity with a serious loophole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 long-term financial war will trigger a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destroy its economic system, and caus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tagnate for a long time. Reviewing at the history of recent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was very good at manipulat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war to achieve its own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its common weapon is financial sanction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launch financial sanctions at critical momen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prepared a series of legal basis. The embolden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launch a financial war lies in dollar hegemony, payment and liquidation monopoly, and irreplaceable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Taking the sample of a financial war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ome prospec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war.

(4)World Economic Slowdown and Recession Risks Should Not be Ignored

Shi Jingzu

In 2019, the growth r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further decl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 growth rate of major economies slowed down synchronously. The unilatera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prom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led to weak performance in global trade and the substantial economy, frequent geopolitical events have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e world has opened a new cycle of monetary easing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downturn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Entering 2020,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COVID-19 worldwide has added risk factors to the already weak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sev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inued spread of the epidemic will cause the world economy to fall into recession.

(5)Thinking of Building High Quality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Jinbo, Dou Yong

In recent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 support Hainan to gradually explore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key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trade port policy and system.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odel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ports such a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Hainan.

(6) Several Speculations on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Wang Weiwei, Sheng Sixi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t has also faced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overall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till ha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new crown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decline in external demand, China need to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ft infrastructure”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igital economically related “new infrastructure”, expand the opening up of the infrastructure sector, fully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ocial capital, vigorously promote policy innovation and debt disposal in China’s infrastructure field, and steadily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area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reby mak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etter serve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7) China-ASE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ilk Road: Status, Motivation and Challeng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Ren Yuna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has become a key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hina-ASE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narrowing the ASEAN digital divide, enhanc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exchange, etc., the China-ASE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In addition, the hug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needs of ASEAN, the huge digital user base, the initial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strategic deployment have provided a strong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ASEAN to jointly build the Digital Silk Roa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derdevelope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ASEAN countries, the huge digital divide and weak digital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constitut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8)China’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Li Rui

Since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growth, the scale of the industry has maintained rapid growth, and the pace of “going-ou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able, becoming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news press industry.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industry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the upgra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structure, the change in lifestyle has created new dema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ntegration has moved toward a deeper level.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o high quality ,it also needs to improve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to build a digital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to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attract and to train composite talents.

Editor:Zhao Ze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单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20年《全球化》杂志（双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210元/年（6期）	总计金额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6113